

佛光人文社會學報



佛光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院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Fo Guang University

第八期
2026 年 1 月

目次

3	錢 郁 鄭曉楓 李其昌	藝啟遊戲：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課程對國中生社會情緒學習之行動研究
24	劉蓉果	誰想結婚——又為何不想？臺灣未婚成人之婚姻意圖與性別角色態度
71	周碧香	「琉璃」詞彙競爭探究
94	楊治平	兩岸微短劇之詞彙分析與教學應用
118	宋美瑩	早期印刷史解謎—英國十八世紀印刷商約翰·懷特現存木雕版與相關印刷品
166	郭悟振	孔子之天道觀及密契經驗

Contents

3	CHIEN YU CHENG, HSIAO- FENG LI, CHYI- CHANG	Play Together: An Action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a Student-Centered Drama Education Program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4	Liu, Rong-Kou	Who Wants to Marry—and Why Not? Marriage Intentions and Gender Role Attitudes among Never-Married Adults in Taiwan
71	Chou, Pi-hsiang	A Study of Lexical Competition in the Forms of “Liúli”
94	Yang, Chih-Ping	Lexical Analysis and Teaching Applications of Micro-Short Drama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118	Sung, Mei-Ying	Solving the Mysteries of Early Printing History—Surviving woodblocks and their print of the 18th-century British printer John White
166	Kuo, Wu Chen	Confucius' View of the Dao of Heaven and His Mystical Experiences

**藝啟遊戲：
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課程對國中生社會情緒學習之
行動研究**

錢郁⁽¹⁾⁽²⁾、鄭曉楓^{(3)*}、李其昌⁽⁴⁾

摘要

本研究旨在建構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課程，探討此課程對國中生社會情緒學習的效果，以及在社會情緒學習各面向的學習內涵。參與者為新北市某一所公立中學八年級某班級學生共 34 位。採行動研究，在正規表演藝術課程中實施八週之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課程，每週一次，每次 45 分鐘。資料蒐集兼顧量化與質性，量化採準實驗之單組前後測設計，以「社會情緒學習量表」為前後測；質性資料為學生課後焦點團體訪談，佐以教學觀察省思日誌、觀察者觀察表、學生學習心得單等。結果發現，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課程在促進國中生社會情緒學習之「自我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覺察」及「人際互動」等四個面向均有顯著提升，但在「負責任的決定」面向無顯著效果。質性分析參與者之社會情緒學習各面向，「自我覺察」面向，能透過情緒表達與辨識肯認自身感受；「自我管理」面向，能在堅毅與專注中強化情緒管理與任務執行能力；「人際技巧」面向，能在合作創造中發展同理心與團隊協作能力；「社會覺察」面向，能在共事實踐中尊重團體常規並發展觀點取替，「負責任的決定」面向，在個人與團體權衡下提升公共問題與責任意識。最後依研究結果提出建議。

關鍵詞：社會情緒學習、國中生、學生中心取向戲劇教育課程

(1)本文為第一作者碩士論文之一部分。

(2)錢郁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3)鄭曉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通訊作者(E-mail) cindy6510@ntnu.edu.tw

(4)李其昌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民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收件，民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修改，民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接受)

壹、緒論

青少年成長過程常伴隨著發展適應的重要議題，如自我認同、情緒管理、人際關係等。過去兒童福利聯盟（2018）統計，近七成兒少（66.4%）有接觸校園霸凌的經驗；近年再度調查指出，被微歧視的兒少中也有高達 34.2% 遭遇霸凌問題（兒童福利聯盟，2023）。長期以來，青少年的人際互動與同儕相處能力是亟需提升的素養。此外，近年青少年自殺與自傷也是關懷的重點之一，青少年常見自殺原因包含情感問題、課業壓力、網路霸凌、校園霸凌等多重壓力，而自殺的案例中也常伴隨憂鬱症與其他情緒精神障礙（衛生福利部，2020）。即使政府或校方致力採取相關因應輔導措施，但亦應兼顧同步強化學生預防保護因子。因此，從正規既有的課程中融入覺察管理、人文情懷、關係連結等元素，可能落實青少年的正向生活實踐，減少其生活與學校適應困難。檢視目前喚起教育圈重視的，非「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莫屬，其透過五大面向培育全人的概念，為適應快速多變社會之必要。誠如劉宗幸（2021）談及，時下青少年不乏有憂鬱形成、社群媒體改變人際交往模式等現象，而社會情緒學習能協助其提升自我調節力，以因應時代背景衍伸出來的相關現象。

細究教育改革，2019 年 8 月開始推動十二年國教，此「108 課綱」以全人教育為主軸，將核心素養視為課程發展主軸，強調素養為課程發展中的過程，而非終點（歐用生，2018）。也就是，除學習應有的認知與技能外，亦強調體驗其中之情意，進而創造整體的學習效果。至此，全國各級學校挪移了發展主軸，戮力培養學生具備適應現在與面對未來所需的知識、能力及態度。同時，許佩婷與陳學志（2022）提出校園除了培育青少年知識技能之外，亦要推行社會情緒學習與正向心理健康促進的課程，關注青少年情意層面發展，強化青少年自我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覺察、人際技巧、明智抉擇，提升正向心理健康。教育部正式於 2025 年實施《社會情緒學習中長程計畫的第一期五年計畫》，融合國際間社會情緒學習發展相關理論，試圖發展本土內涵的社會情緒學習文化與環境（教育部，2025）。社會情緒學習的架構與十二年國教「108 課綱」提及的自發、互動、共好等三大目標不謀而合，自我覺察、自我管理屬於「自發」；社會覺察、人際技巧屬於「互動」；負責任的決定屬於「共好」（呂欣茹，2024）。那研究上顯示的效果如何？Li 等人（2025）針對 11 篇研究（8 篇期刊論文、3 篇論文），涵蓋 5,173 名學生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探討幼兒園至 12 年級教育情境下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對學生的影響，結果發現所有測量 SEL 工具的研究均顯示學生之社會情緒學習有顯著提升，甚至有些研究認為能小幅降低內化症狀，如焦慮、憂鬱。可推知，社會情緒學習元素融入課程的效果令人振奮，具有持續發展之潛力。

盤點國中階段學科，國、英、數、理等是學習結構較強而難以調整的學科，而表演藝術是較能彈性變化的學科。郭洛伶與張弘勳（2019）研究指出，表演藝術課程除教授內在與外在的表演知識以及肢體表達技巧外，還著重透過感官與情感的知覺，訓練增強自我表達能力與溝通技巧。此與社會情緒學習的內涵呈現高度融合，也能對齊「108 課綱」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之圭臬。本研究企圖在正規表演藝術課程中，以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強化社會情緒學習能力，包括漸進式引導國中生培養自我管理與人際互動能力；學習認識、覺察、表達自己的情緒；亦能知曉如何與他人合作，進而促進正向生活。

綜合以上，檢視臺灣當前青少年發展適應的重要議題，社會情緒學習對接「108 課綱」對素養能力的重視，以及正規表演藝術領域之創新課程可行性，故本研究目的在建

構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課程，探討此課程對國中生社會情緒學習的效果，以及在社會情緒學習各面向的學習內涵。

貳、 文獻探討

一、社會情緒學習運用於青少年

社會情緒學習理論內涵追溯至美國加州學術、社會和情緒學習協作組織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CASEL, 2020)，其將社會情緒學習定義為一個持續的發展歷程，使兒童與成人能夠透過學習理解與管理情緒、設定並實踐積極目標、展現同理心、建立與維持正向關係，並做出負責任且關懷他人的決定。發展歷程與時俱進，運作以學習者為中心，顧及學生的學習興趣，並配合學生的真實生活經驗，讓學生有機會在學校教育有效的實際練習相關技巧，整體課程發展脈絡與十二年國教的情境脈絡化課程與教學模式相符（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具體而言，社會情緒學習所構成的五大核心，自我覺察 (self-awareness)、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社會覺察 (social awareness)、人際技巧 (relationship skills)、負責任的決定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若進一步針對本研究參與者之青少年，CASEL (2017) 對於幼兒園兒童至高中學生社會情緒學習五項基本核心內涵之涵義如下：1.自我覺察是指了解自身當下的感受後，能真實評估自我能力與建立自我自信；2.自我管理是了解與理解自我情緒，堅強面對困難與挫折且謹慎行事以利當前工作進行；3.社會覺察在於了解他人感受觀點及主動積極與不同團體互動；4.人際技巧則重視人際關係相處中能掌握情緒、協調解決衝突及尋求協助，且與他人保持健全關係；5.負責任的決定是謹慎考量採取行動可能後果及與其相關因素，並且能尊重他人、為做出的決定負責。社會情緒學習教育過程涵蓋從幼稚園至高中，教育內容包含發展辨識及管理情緒能力、做負責任的決定、建立積極關係與有效處理具有挑戰的情境等。由上細述，社會情緒學習之內涵從自我到人際互動，最後是在社會脈絡中做決定與負責。

社會情緒學習為現在生活適應能力所必備，那麼其內涵是否涵蓋於我國正規課程中培育？黃絢質 (2020) 以文獻分析探討美臺中小學自我情緒探索素養課程發現，臺灣十二年國教綜合活動領域「自我與生涯發展」主題軸之「自我探索與成長」主題項目，在國中教育階段對於自我情緒探索的學習內容相對較少；其建議參照美國社會情緒學習中關於自我情緒探索的素養，例如「辨識情緒的強度、起伏狀態」、「辨識引起情緒的因素」與「辨識情緒與認知、行為之連動關係」，強化培養青少年情緒自我覺察。陳學志 (2024) 提醒，除了個體情緒調節與同儕關係成相關性，青少年的社會情緒學習應更有系統的多元合作，從班級、校園、家庭三方面得以實踐，以利支持其社會情緒學習之發展。其中，做出負責任的決定就是需要在環境中實踐，Zins 等人 (2004) 強調培養青少年做負責任的決定，可以幫助他們在面對各種情況時做出明智的選擇。教師可創造多元的活動引發學生多元性思考、自我判斷及決定，逐步培養自我責任能力。以此，社會情緒學習對於青少年成長發展有密不可分之關係，涵蓋完整的多層面尤須在社會脈絡與教育環境中實踐。

社會情緒學習的五大面向雖各自獨立，亦是整體學習，能全面推進學生正向生活與幸福感。Van De Sande 等人 (2023) 為釐清青少年社會情緒技能與心理社會健康變項之間的關聯，以作為學校社會情緒學習 (SEL) 方案設計與優化的依據，其以 796 名 14 至

18 歲的學生為樣本，結果顯示，五項社會情緒技能間高度相關 ($r > 0.5$)，整體發展具整合性，且各項技能與心理社會健康皆呈顯著關聯。類似的結果，Brill 等人 (2025) 設計 12 至 14 歲青少年「HEROES (helping everyone reflect on emotional strengths) 的社會情緒學習課程」，探討其對心理韌性(resilience)、自尊及心盛(psychological flourishing)，的影響，結果顯示學生在自尊、正向情緒與韌性均有顯著提升，其建議未來學校在推行青少年 SEL 課程時，應結合自我覺察、自我管理與人際支持的教學模組，並強調體驗式與反思式學習，以提升學生長期的心理健康與幸福感。一個大型的樣本，Kaşıkçı 與 Ögülmüş (2024) 以正向心理學與生態系統理論為基礎，探討微系統支持(如同儕關係、家長參與)與個人特質(如自我調節)如何透過社交情緒學習(SEL)影響青少年的幸福感，其以 1,110 名土耳其高中生(男生 560 人，女生 550 人，平均年齡 15.52 歲)為對象，採分層隨機抽樣以確保不同學校類型(如普通高中、職業高中、藝術高中)比例符合母群分布。Kaşıkçı 與 Ögülmüş 研究發現，同儕關係、家長參與、自我調節皆能正向預測社會情緒學習。社會情緒學習能正向預測幸福感，且社會情緒學習在同儕關係、家長參與、自我調節與幸福感之間具有顯著中介效果。由此說明社會情緒學習對於青少年的人際關係、自我調節及幸福感等都要至關的影響，也是作為相關課程融入的議題。

特別是在學校轉銜的過程，特別針對情緒技能較弱的學生進行社會情緒學習的介入，有助於維護或提升學生的同儕連結與幸福感 (Pollak et al., 2024)。另一方面，社會情緒學習在弱勢學生的推進亦為學者想嘗試的發展，如 Balter 等人 (2025) 認為許多研究證實社會情緒學習能夠促進青少年的心理與社交技能、學業表現、降低藥物濫用、行為問題與情緒困擾；但可能在資源貧乏的社區中推廣困難，故以試驗計畫 (study protocol) 開發文化敏感性的 SEL 課程，正式引入弱勢社區課後活動中心，雖然研究結果尚未出爐，但令人引頸期盼。越來越多樣的課程將社會情緒學習納入其中，並希望能有跨文化適用的推廣。

二、學生中心取向結合戲劇教育

學生中心取向的內涵源自 Rogers (1969)《自由學習》(*freedom to learn*)，主張學習應由個人主動自發進行，學習權利歸於學習者，翻轉以教師為主體的傳統講授模式。Rogers (1969, 1983) 認為，每位學習者皆具掌控自身學習的能力，教師應為學習的催化者而非主導者，並強調在學習歷程中所獲得知識與能力。張蔣耀文與施登堯 (2018) 指出，學生中心教學應讓學生主動參與學習、發展建構知識的方式，並由學生自行探尋答案，培養其成為自主學習者。具體之學生中心取向教學模式有四項原則：1.教師與學生共同建構學習環境，教師依據學生興趣與能力設定目標；2.知識建構以學生主動發現為主，透過學習活動、內容與教材促進學習 (Froyd & Simpson, 2008)；3.評量以真實性為主，著重學生對學習歷程的理解與反思，而非標準化測驗；4.透過分組與同儕互評，培養學生對自身學習的責任感。本研究依此四項原則作為學生中心取向設計依據。

「個人內在經驗統整，透過戲劇認識自己」的課程模式核心在於「人」的成長與發展，此理念受二十世紀初人本教育哲學家 Peter Slade 啟發。進一步促使 Way 於《由戲劇而成長》(*Development through Drama*, 1967) 中提出，戲劇是探索與發現內在自我的媒介，課程焦點應放在人本身而非戲劇技術。其教育目標在於透過戲劇促進學習，幫助參與者理解自我、表達情感與發展潛能。本研究課程亦以此為核心，藉由戲劇歷程理解並療癒內在自我，進而延伸至與他人合作與關懷社會，促進個體的全人發展。Way (1972)

主張戲劇教育是兒童自發性遊戲的延伸，強調以過程為主的即興活動以發展全人教育。此理念與我國十二年國教全人教育精神相符，皆重視以過程為導向的學習及舊經驗的延伸與反思，喚起學習者內在歷程的深化（林玫君，2017）。林進一步指出，此模式可分為三階段：準備階段，專注於個人經驗的回想與想像，探索自我與問題解決方式；呈現階段，以短時間的戲劇表演取代長篇演出，使學習更具彈性與參與性；最後是回顧階段，透過反思與討論，使學習經驗內化並延伸至日常生活應用。戲劇可以促進全人的發展，也可以透過經驗深度自我探詢。

在表演藝術領域之戲劇課程為實作基底，依林玫君（2000）統整之三種戲劇課程模式：1.戲劇藝術單科概念統整，學習戲劇知識（learning about drama）；2.個人內在經驗統整，透過戲劇認識自我（learning about self through drama）；3.戲劇主題統整，經由戲劇探索議題（learning through drama）。本研究採第二種「透過戲劇認識自我」之課程發展模式，並運用於增進社會情緒學習。就實際教育現場，洪琬婷（2023）以國中一年級表演藝術課程為例，將戲劇教育結合情緒教育，發現能有效促進學生的情緒理解與策略運用。薛明鑫（2019）則於中學課程中運用戲劇教育於霸凌防制方案，提升師生互動與同理心。這些研究顯示，結合戲劇與心理教育的複合式課程能促進學生的自我覺察與情緒表達，亦強化學習者的社會連結與人際理解。綜上所述，「透過戲劇認識自己」的課程模式不僅重視個體內在成長，更強調自我與他人的關聯，是促進全人發展的重要戲劇教育取向，也是本研究課程設計的理論核心，用以增進社會情緒學習。

三、學生中心取向戲劇教育與社會情緒學習之理論連結

承上，本研究首創將 Rogers 的人本學習理論與 Way 的戲劇教育理論，與 CASEL 的五大構面進行理論接合。Rogers 強調的真誠、接納與同理，提供了安全的心理環境讓學生如其所示的成為自己，直接呼應了 SEL 中所促進的「自我覺察」；當課堂教師創造無條件積極關注的氛圍時，學生能卸下防衛，真實地與人際互動，此乃體現 SEL 中所欲培養的「人際技巧」與「社會覺察」。而 Way（1967）主張透過直覺與情感開發來培育全人，強調戲劇是練習控制專注力與釋放能量的媒介，此即是 SEL「自我管理」的實踐。而在戲劇排演中，學生必須在團體中達成共識並承擔角色責任，則落實 SEL「負責任的決定」。綜上所述，本課程不僅的戲劇本身，而是透過「個人—角色—團體」的互動循環，落實社會情緒學習的五大內涵。此乃過去研究鮮少整合的觀點，本研究以跨理論的設計超越過去戲劇教育課程，並探討其在 SEL 的促進效益。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聚焦建構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課程，用以提升國中生社會情緒學習。本文第一作者於 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3 月進駐新北市某國中八年級表演藝術課程觀察，發現學生普遍「難以表達自身想法與感受」，進而影響人際關係與決策能力。由於現行學校課程多以學科導向為主，探索自我與人際互動等主題的學習比例偏低，且多僅限於輔導課程。經訪談該校表演藝術教師後，研究者遂設計以學生中心取向為核心的戲劇教育課程，期望藉由戲劇實踐促進學生的社會情緒學習，包含覺察、表達、人際互動與負責任決策等能力，以突破學科導向學習的侷限。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透過課堂中實踐、反思與修正教學策略，持續回應學生學習需求。黃光雄與蔡清田（2002）指出，行動研究乃教師於教學現場以實務探究方式解決教育問題。Kemmis 提出「計畫→行動→觀察→反思→再計畫」的循環模式，強調教師為自身教學的反思者（蔡清田，2000）。研究者作為教學現場的實踐者，透過持續的觀察學生反應與省思教學日誌，在課程初期探索、中期創作、後期展演等三個主要階段，進行動態調整回應學生學習歷程的需求，優化社會情緒學習之效果。在第一循環之初期探索，多數學生對於肢體接觸與公眾表達存有畏懼，如 S34 提及的尷尬感，故在「計畫修正」中調整為小組非口語暖身，降低表達的焦慮，提升「自我覺察」。第二循環之中期創作，聚焦於創作衝突的處理，針對學生堅持己見的狀況實施觀點轉換活動，如使學生扮演不同物件，促進「社會覺察」與「人際技巧」提升。第三循環之後期展演，面對學生排練倦怠與責任感低落的問題，漸進強化團體目標與角色承諾，深化「自我管理」與「負責任的決定」的能力。具體的行動研究循環與教學調整歷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行動研究循環歷程與教學調整表

階段與週次	循環歷程 (計畫-行動)	觀察到的問題 (觀察)	反思與教學調整策略 (反思-再計畫)	SEL 面向
第一循環 (第 1-2 週): 身心覺察與信任建立	◎計畫：透過大團體肢體活動與聲音練習，引導學生覺察自我與他人。 ◎行動：實施「大圓圈儀式」、「聲音雕塑家」。	◎觀察：學生在男女混雜的大圓圈中顯得僵硬、視線閃躲。	◎反思：青少年對同儕評價高度敏感，大團體互動造成心理負擔，阻礙覺察。 ◎調整策略：1.改採「小組」為單位的非口語活動，建立小團體安全感。2.增加「物件」作為中介如傳球，轉移對肢體的直接關注。	自我覺察 (情緒辨識、建立自信)
第二循環 (第 3-5 週): 角色扮演與衝突協商	◎計畫：進行小組故事創作與角色扮演，練習口語表達與合作。 ◎行動：實施「場景物件心聲」、「故事創作」。	◎觀察：分組討論時，部分強勢學生主導劇情，內向學生如 S06 初期，選擇沈默或被動配合。	◎反思：學生缺乏换位思考的技巧，易陷入「對錯」之爭而非「合作」。 ◎調整策略：1.「觀點轉換」機制，如扮演一張被坐的椅子，體驗他人感受。2.設立「輪流發言棒」，讓每位組員有表達機會，練習傾聽。	社會覺察、人際技巧 (同理心、團隊合作)
第三循環 (第 6-8 週): 團	◎計畫進行排練與最終呈現，強調表演技巧與故事完	◎觀察：隨著新鮮感下降，部分學生在排練	◎反思：缺乏對「團體成果」的共融感與責任心。 ◎調整策略：1.連結生活	自我管理、負責任的決定 (目標執

體展演 與責任 承擔	整性。 ◎行動：實施 「文本創作排 練」、「形中代 景」。	時出現散 漫與嬉鬧 行為。	經驗：引導學生思考劇 中角色面臨的困境與 自身生活的關聯，提升 投入度。2.強調「缺一 不可」的儀式感：在排 練前加入團隊承諾儀 式，強化團隊責任。
---------------------------	---	---------------------	--

研究設計方面，課程於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的正規表演藝術課程中實施（國二下學期），共八週，每週一次 45 分鐘，總計 360 分鐘。採準實驗設計之單組前後測方式，使用「社會情緒學習量表」蒐集資料，檢驗社會情緒學習的成效；輔以「學生課後焦點團體訪談」，及「教學觀察省思日誌」、「觀察者觀察表」及「學生學習心得單」等多元資料，理解社會情緒學習的內涵。特別補充，本研究之後測由第一位作者（即授課教師）實施，學生可能基於師生關係而高估改變；因此除了量表外，本研究佐以質性資料之三角檢證，以降低單一來源偏差。透過量化與質性資料，提供更完整與中立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場域與參與者

研究場域，本研究課程實施為新北市某一所公立中學，為升學型學校。目前全校總班級數為 66 班，全校學生人數約 1800 人，編班標準依照入學前國中學業性向測驗成績，採常態分班。依據基本教學時數原則，該校藝文領域每週授課節數為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領域各一節課。本研究之戲劇教育課程實施地點為該校地下室一樓的表演藝術教室，教室環境明亮，地板為黑膠地板且有鏡子。

參與者為國中某班級八年級學生 34 位（男 17 人、女 19 人），該班為研究者隨機挑選。本研究嚴格遵守研究倫理，在正式研究與課程實施前，研究者已向校方、學生及其家長詳細說明研究目的、流程與資料保密方式，並取得家長簽署之同意書以及學生的知情同意，確保所有參與者之權益與隱私。正式研究前，本文第一作者進入場域觀察該班表演藝術課約 10 個月，了解學生於表演藝術課堂的學習狀況與當前教學困境，依此與該班表演藝術教師持續討論本研究課程設計。

三、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課程

本研究之學生中心取向戲劇教育課程名為「藝啟遊戲，戲戲感受」，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表演藝術學習領域架構及戲劇教育理論設計自編教案，旨在透過戲劇學習提升學生之社會情緒學習能力。本課程由本文第一作者帶領，具有藝術教育碩士層級專業背景。

課程設計理念根據 Rogers 之人本主義教育思想，結合 Way 所倡導「以戲劇作為發展內在自我媒介」，融入社會情緒學習五大面向進行規劃。共分為五大主題：主題一「身心覺察，戲看你我」以多元感官與肢體活動探索自我與他人關係；主題二「遠近距離，戲說演劇」透過小組合作與媒材創作學習故事分析與自我表達；主題三「角色扮演，戲遊劇中」以肢體與語言創作角色，理解角色象徵與自身連結；主題四「悠遊探索，戲中世界」著重團隊合作與肢體創作文本；主題五「形中代景，戲劇儀式」引導學習者進行內在情感覺察與自我療癒。整體課程以連貫性主題設計貫穿戲劇教育脈絡，透過戲劇實

踐促進學生社會情緒學習發展，呼應本研究之核心目標。課程大綱如表 2。

四、研究工具

(一) 社會情緒學習量表

社會情緒學習量表由林秀玲（2022）編製，包含五個構面：自我覺察、自主管理、社會覺察、人際關係、以及負責任的決策。量表共有 51 道題目，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評分，選項包括「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和「非常同意」，分別對應 1、2、3、4、5 分。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的社會情緒學習能力越高。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以 Cronbach's α 係數表示，總量表的 α 係數為 0.96，分量表的 α 係數範圍介於 0.88 至 0.96 間，顯示具有良好的信度。透過結構模型的整體適配度及內部結構適配度進行分析，以檢驗量表的建構效度與各項適配指標與平均數均顯示良好，表明量表具備良好的建構效度。

(二) 學生課後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依研究目的設為三大主軸設計：1.簡述整體學習階段前、中、後、期的歷程與感想。2.分享印象深刻的戲劇互動經驗、自我探索與收穫。3.分析課程各單元對社會情緒學習五大面向的啟發，以及日常生活之應用。整體訪談時間，40-60 分鐘。

(三) 教學觀察省思日誌

每堂課後，研究者（教師）經由書寫教學觀察省思日誌，分析課程中所觀察的教學互動環節，從自身角度檢視教學策略運用、教學流暢度、學生反應，以及課程內容是否達到預期目標等，持續滾動式省思與調整，並作為下次教學改善依據。此外，搭配觀看錄影和攝影紀錄，捕捉全體與組內討論學習情形與學習狀況。

(四) 觀察者觀察表

本研究之觀察者為國中表演藝術教師，觀察者於教學活動中觀察整體教學互動，焦點在學習者學習表現與課堂參與氛圍等。每堂課後，觀察者與研究者進行回饋及討論，協助研究者了解課程執行、團體互動、學習效果等，作為下次教學改善依據。

(五) 學生學習心得單

透過每堂課學習心得單書寫，給予學習者於課堂後自我反思紀錄與學習歷程檢視的機會。撰寫時間為課堂結束後 10 至 15 分鐘的時間，其內容包含：課堂活動觀察到與感覺到的事件及感覺、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課堂活動嘗試使用的聲音及肢體帶給自己的感受、課堂活動與人合作完成什麼及當中自身的感受、課堂整體心得與反思。

五、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採量化與質性資料並行分析。量化部分以描述統計（平均數、標準差）呈現參與者於「社會情緒學習量表」前後測分數變化，了解課程介入後之能力提升情形，並以成對樣本 t 檢定檢驗社會情緒學習五大面向之前後差異。質性部分採三角檢證法，以教學觀察省思日誌、觀察者觀察表、學生學習心得單及課後焦點團體訪談逐字稿為等四項文本資料，透過觀察、訪談與文件資料交叉比對以確保信實度。質性資料分析依潘淑滿（2003）步驟，進行資料化約、展現與結論歸納。首先閱讀日誌、訪談、心得單等原始資料，並將重要的概念加以編碼；接著初步類似的概念歸納出次主題；經過整體脈絡之理解與回應研究目的，考量各次主題的相似性與區別性，最後統整出核心主題。為確保編碼信度，本研究採取協同檢核機制，由觀察者教師（協同研究者）針對部分關鍵

逐字稿進行獨立編碼，再與研究者進行比對與討論，直至對編碼意義取得共識，以降低單一研究者之主觀偏誤。質性資編碼代表眾分四種，教學觀察省思日誌為「誌 1」，如誌 1-1 為第一堂課觀察回顧；觀察者觀察表為「觀察 1」，如觀察表 1+日期，為觀察教師的第一堂課觀察紀錄；學生學習心得單之「S1」，S1 單 10313 為編號 1 學生 3 月 13 號的學習心得單；焦點團體訪談逐字稿之編號 1 學生為「S1 訪」，如 S1-數字，表示第幾次說話。具體編碼範例如表 3 所示。

表 2

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課程大綱：藝啟遊戲，戲戲感受

週	主題	Way 戲劇教育理論	社會情緒學習	學生中心取向教學策略	課程概要
1	身心覺察，戲看你我	想像力	自我覺察	1.學習活動與學生有關係	大圓圈儀式、空間傳球、身體姿態回應、圍圈鏡傳遞、動作事件聯想
2				1.學習活動與學生有關係 2.提升學生於學習過程的責任感	大圓圈儀式、空間遊走、雕塑家：動作雕塑家、聲音雕塑家、主題雕塑家
3	遠近距離，戲說演劇	動作與聲音使用	自我管理	1.學習活動與學生有關係	大圓圈儀式、隱形球傳遞、物景物件的心聲
4				1.學習活動與學生有關係 2.學生學習和老師教學並重	大圓圈儀式、胡言亂語、海洋大海嘯、故事外星語
5	角色扮演，戲遊劇中	即興、角色理論	人際技巧、社會覺察	1.學習活動與學生有關係	大圓圈儀式、變化多端、故事中的我
6				1.因應不同學生採行不同的、彈性的方法策略 2.學習活動與學生有關係	大圓圈儀式、心有所屬、班級光譜
7	悠遊探索，戲中世界	即興、角色理論	人際技巧、社會覺察	1.提供問題和活動促進思考，而非死背記憶 2.學生學習和老師教學並重	大圓圈儀式、動物園 文本創作排練演出

8	形中代 景，戲 劇儀式	情感與肢體 的連結	負責任 的決定	1.學習活動與學生有 關係 2.用有效學習策略支 持學生發展 3.學生學習和教師教 學並重	大圓圈儀式、觸 電、四行詩、帶禮 物
---	-------------------	--------------	------------	--	--------------------------

表 3

本研究資料編碼說明

資料類別	資料類別	編碼說明
教學觀察省 思日誌	誌 1	第一堂課實施課程教學過程中研究者的觀察及反思紀錄。誌 1-1 為第一堂課觀察回顧、誌 1-2-1 為第一堂課自我覺察的摘要敘述、誌 1-3 為第一堂課教學過程描述。
觀察者觀察 表	觀察表 1	觀察表 1+日期，為觀察教師的第一堂課觀察紀錄。觀察表 10313 為 3 月 13 號第一堂課的觀察教師觀察表。
學生學習心 得單	S1 單 1	編號 1 學生第一堂課堂紀錄與學習心得單。S1 單 10313 為編號 1 學生 3 月 13 號的學習心得單。
焦點團體訪 談逐字稿	S1 訪	編號 1 學生進行焦點團體訪談。S+數字表示訪問的學生編號。S1-數字，表示第幾次說話。 例如：S1-1 第一次說話。

肆、研究結果

一、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課程對社會情緒學習的效果

研究統計結果如表 4 所示，後測平均數均高於前測平均數。進一步檢驗研究參與者在課程前後社會情緒學習五大面向的表現是否有顯著差異，採用成對樣本 *t* 檢定進行數據分析。

表 4

社會情緒學習五大面向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

社會情緒學習 五大面向	前測 後測	<i>M</i>	<i>SD</i>	<i>t</i>	顯著性
自我覺察	前測 後測	25.71 39.85	3.34 2.18	-17.54	*
自我管理	前測 後測	24.79 34.32	2.72 2.23	-17.86	*
社會覺察	前測 後測	26.79 38.26	2.38 1.48	-27.14	*
人際技巧	前測	26.24	2.22	-27.74	*

負責任的決定	後測	38.21	1.86	1.39
	前測	27.12	1.94	
	後測	33.2	1.98	

* 表示達顯著水準 ($p < .05$.)

依據上表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自我覺察」面向，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平均差異 = -1.29, $SD = .43$ ）， $t(33) = -17.536, p < .001$ ，顯示參與者在自我覺察能力有顯著提升。「自我管理」面向，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平均差異 = -.92, $SD = .30$ ）， $t(33) = -17.86, p < .001$ ，顯示參與者在自我管理能力有顯著提升。「社會覺察」面向，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平均差異 = -1.15, $SD = .25$ ）， $t(33) = -27.14, p < .001$ ，顯示參與者在社會覺察能力有顯著提升。「人際技巧」面向，其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平均差異 = -1.20, $SD = .25$ ）， $t(33) = -27.74, p < .001$ ，顯示參與者在人際技巧能力有顯著提升。最後在「負責任的決定」面向，雖然後測平均分數略高於前測（平均差異 = .14, $SD = .58$ ）， $t(33) = 1.39, p = .174$ ，但未達顯著，顯示參與者在負責任的決定能力無顯著提升。綜合以上，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課程對國中生社會情緒學習之自我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覺察及人際互動等四個面向具有顯著提升效果，但在負責任的決定面向上無顯著提升效果。

二、在社會情緒學習各面向的學習內涵

（一）自我覺察：透過情緒表達與辨識來認可自身感受

自我覺察面向包含情緒認知、情緒表達、自我瞭解、自我認同等四個次構念。「大圓圈儀式」中，參與者首次面對彼此，開始聚焦自身的情緒反應。例如 S34 與 S06 皆表示在傳球或站位過程中，察覺到自己的尷尬或猶豫，進而意識到自己的決策模式。隨後的「聲音雕塑家」活動，則透過聲音與肢體表現激發參與者對內在感受的覺察，如 S23 發現不同音樂能引發不同創意與情緒感受。參與者於此面向之具體學習回饋摘要如表 4 所示。

此主題課程設計成功將自我探索與團體互動相結合，透過多樣化的媒介與活動引導，開始深入了解自身的情緒反應與行為模式。整體而言，參與者藉由「聲音雕塑家」及「空間傳球」等活動，深入探索情緒來源及其對行為的影響，逐步學會辨識並命名自身的情緒。進而提升參與者對自身感受的理解，也相對培養對情緒表達的敏銳度。也就是，透過課堂的音樂與肢體經驗，參與者更準確地觀察並表現內心情緒，肯認、接納自身感受，提升自我覺察。

（二）自我管理：在堅毅與專注中強化情緒管理與任務執行的能力

本課程之自我管理面向強調情緒調節、專注力與任務執行。在課程活動的情境互動中，參與者逐漸學會管理情緒並提升組織能力。例如 S36 表示能有效管理情緒並專注於任務，反映出良好的調節能力；S26 則在故事創作的意見交流中，學會冷靜表達，展現情緒波動下的自我控制。

此外，小組合作促使參與者增強任務執行的毅力。S06 初期表現較為被動，但在「場景物件心聲」活動中受同儕創意啟發，轉為積極達成教師指派的目標；S27 則透過觀察他人表演細節，提升了專注力與觀察力。這些質性發現支持了量化數據中「堅毅」與「專注」面向的提升，顯示參與者從情緒管理到自我規劃皆有顯著成長。參與者於此面向之

具體學習回饋摘要如表 4 所示。

量化分析和質性資料的結合展示課程對參與者自我管理技能的提升效果，尤其在目標設定、情緒管理及專注力上的成效尤為顯著。質性資料中發現，透過小組合作，參與者面對不同的意見與想法，反而能更冷靜沉著，因此也訓練情緒調節與管理能力，體現行為控制與任務執行，此等自我管理面向的提升附帶也讓創作與表演展現更多自主性與積極性。

（三）人際技巧：在合作創造中發展同理心與團隊協作能力

人際技巧核心聚焦於互動、衝突管理及團隊合作。透過「場景物件心聲」的換位思考練習（如：扮演椅子），參與者如 S23 開始體驗不同立場的感受，進而培養出對他人的尊重與同理心。

在進階的故事創作與分工中，參與者深刻體會到個人貢獻對團隊的重要性。S06 指出若組員不表達意見，故事將失去共同創作的意義；S30 則強調明確分工能讓團隊高效完成任務。S23 亦回饋組員間的互相聆聽與適時回應，是促進理解與尊重的基礎。這些互動經驗顯示，戲劇教育能有效促進學生在合作中發展溝通策略與團隊意識，讓溝通更加順利。參與者於此面向之具體學習回饋摘要如表 4 所示。

透過角色扮演和小組創作活動，參與者在人際互動、衝突管理、人我界線與團隊合作等層面皆有成長，發現彼此意見的價值與貢獻，並結合各自的創意和努力，實現共同目標。量化與質性數據雙重顯示，課程在提升參與者的社會認知和團隊合作意識方面，具有顯著的正面效果。一位參與者提到，他在小組創作中不僅增強自信，也更願意尊重與接納他人觀點，反映戲劇教育能促進健康人際關係發展。在人際技巧方面，研究數據顯示提升幅度最為顯著，參與者發展同理能力，使得溝通與合作更加順利，提升團隊協作的動能。

（四）社會覺察：在共事實踐中尊重團體常規並發展觀點取替

社會覺察面向著重於理解團體規範與發展觀點取替能力。質性資料顯示，參與者在小組排練中逐步內化了合作常規。S06 表示在分組過程中，不僅學會聆聽，更能敏銳觀察組員的情緒變化，並適時調整自身行為以維繫團體和諧，體現了對團體動力的覺察。

此外，角色扮演活動有效提升了觀點取替的能力。S26 指出，當戲劇內容與生活經驗產生連結時，能顯著增強對角色的認同感，進而更能理解他人的觀點與感受。透過創作與排練的歷程，參與者從自我中心視角拓展至對社會情境脈絡的理解，展現社會認知能力的提升。參與者於此面向之具體學習回饋摘要如表 4 所示。

結合量化與質性資料的分析，透過創作與排練，參與者更全面地理解社會認知脈絡的變化與細節。因此，在社會覺察面向，參與者在團體互動與自我反思中，尊重常規的運作，並發展觀點替代能力，展現社會認知能力的促進效益。

（五）負責任的決定：在個人與團體權衡下提升公共問題與責任意識

雖然本面向在量化數據上未達顯著差異，但質性分析揭示了學生在「團體責任」上的具體學習。在故事創作與演出籌備中，參與者必須在個人選擇與團隊目標間進行權衡。S06 透過創作過程體察到人生充滿抉擇，並認為做出負責任的決定是重要課題。

角色扮演亦強化了責任意識。S35 表示在分配角色後便全力以赴，展現對任務的承諾；身為組長的 S23 則強調「先思考再行動」的重要性，展現對決策後果的承擔意願。S36 更指出團隊成員需共同努力才能呈現完整故事，意識到個人行為對集體成果的影響。這些發現顯示，戲劇課程雖較少涉及生活倫理的兩難決策，但有效培養了學生在團體協

作中的責任感與公共意識。課程在公共問題的反思、責任意識的培養以及負責行為的發展方面顯示出顯著成效，在個人意見與團體共識之權衡下，能落實完成團隊目標之責任感。參與者於此面向之具體學習回饋摘要如表 5 所示。

表 5

參與者於 SEL 各面向之具體學習回饋摘要

面向	核心內涵	學生訪談與心得回饋摘要
自我覺察	透過情緒表達與辨識來認可自身感受	S34：在大圓圈儀式中感到尷尬，察覺不知如何自處。 S23：聲音雕塑家讓我仔細察覺感受，發現自己不一樣的感覺。 S06：發現自己常難以下決定，傾向參考他人意見。
自我管理	在堅毅與專注中強化情緒管理與任務執行的能力	S36：可以管理情緒並專注在任務上。 S06：從被動轉為主動，專注達成教師指派的目標。 S27：為了觀察細節，專注力變強了。
人際技巧	在合作創造中發展同理心與團隊協作能力	S23：體驗不同立場（如：扮演椅子），學會換位思考。 S06：發現若不表達，故事就不屬於整組，體認互動重要性。 S30：分工合作讓做事非常有效率。
社會覺察	在共事實踐中尊重團體常規並發展觀點取替	S06：觀察到組員情緒波動，會調整自己去配合團體。 S26：發現與生活連結能提升排練興趣，進而理解他人觀點。
負責任的決定	在個人與團體權衡下提升公共問題與責任意識	S06：人生面臨許多抉擇，學習做出負責任決定很重要。 S23：身為組長，行動前會先思考後果。 S36：學習到負責任與合作，不能只做自己的，要顧及整體呈現。

綜合以上量化與質性資料結果，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課程顯著提升參與者之「自我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覺察」及「人際技巧」等四面向之能力，但未顯著提升「負責任的決定」之能力。就社會情緒學習的五大面向獲益：「自我覺察」面向，參與者透過情緒表達與辨識來認可自身感受；「自我管理」面向，參與者在堅毅與專注中強化情緒管理與任務執行的能力；在「人際技巧」面向，參與者在合作創造中發展同理心與團隊協作能力；在「社會覺察」面向，參與者以共事實踐中尊重團體常規並發展觀點取替；最後是「負責任的決定」面向，參與者在個人與團體權衡下提升公共問題與責任意識。

伍、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一）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課程設計討論

就理論的啟示上，本研究結果與過去有關社會情緒學習運用於青少年課程之研究，如 Brill 等人（2025）、Kaşıkçı 與 Öğülmüş（2024）及 Van De Sande 等人（2023）具有類似正向效益。然上述研究多認為社會情緒學習的整體概念訓練會比單一面向訓練要來得更有效果，但本研究提醒這也視融入的學科特質或具體內涵而有所不同。而本研究的基底是表演藝術領域，本屬多元創意且開放表達，故在「負責任的決定」面向不一定能產生效果。

在教學應用上，本研究證實以 Rogers 人本心理學為基礎的戲劇課程，能提供學生安全的心理空間。透過「身心覺察」、「角色扮演」到「團體展演」的漸進歷程，學生從個人的感官覺察延伸至人際互動的連結，此與 Jones 與 Kahn（2017）強調 SEL 應包含主動參與及體驗式學習的觀點一致。特別是在東亞升學導向的教育脈絡下，表演藝術課提供了一個非評價性的場域，讓學生得以釋放情緒並重整人我關係。透過 Rogers 的接納氛圍，學生得以暫時卸下學業競爭的壓力，在角色扮演中釋放情緒並重整人我關係。此結果呼應了教育部（2025）社會情緒學習計畫的願景，證實戲劇教育可作為落實 SEL 本土化實踐的具體路徑。課程依循由淺入深的原則，分為「身心覺察」、「角色扮演與故事創作」及「團體表演與反思」三階段，循序引導參與者發展情緒調節與團體合作能力。因此在課程設計有所本的架構中，自然在社會情緒學習上多所助益。細究學習歷程，初期階段「身心覺察」活動中，參與者專注於感官覺察與情緒辨識，如「聲音雕塑家」活動中，透過對不同聲音的情緒反應探索提升情緒覺察能力。如同 Berg 等人（2017）類似的設計，有助學生辨識與理解情緒。中期「角色扮演與故事創作」階段則著重社會覺察與合作，在角色扮演與情境模擬中，學生培養同理心與社會互動理解，並透過創意故事設計以多樣化方式表達情感與觀點，促進觀點替代能力。後期「團體表演與反思」階段中，學生在演出與回饋中深化對角色情感與責任的體會，並對自身角色進行反思（Jones & Kahn, 2017）。循序漸進的推展，透過本課程之戲劇教育的想像力、動作與聲音使用、即興角色表達、情感與肢體之連結等，逐漸使參與者在創意與自在中回歸自我，而從本研究之課程設計來看，社會情緒學習五大面向能延續開展，情緒的辨識與覺察是催化關鍵，此乃本研究所對社會情緒學習之補充。

未來研究方向，本研究發現若課程設計能考量參與者背景與需求，如以戲劇做為表達的方式，以多元策略支持不同性格與能力的學生發展，特別有助於提升自我管理與協作能力。Balter 等人（2025）指出，SEL 在不同文化脈絡中需調整以適應學習者特質。本研究支持此論點，如同本研究參與者初期在情緒或想法表達上較為困難，可能源自於東方文化對於以戲劇作為表達較為內斂，透過行動研究的持續修正後，逐步引導、等待及鼓勵，終將在自我管理、社會覺察與人際技巧皆顯著提升。此外，這也體現了於戲劇教育中「角色扮演」的雙重特性，既是自己又是角色。當學生習慣以自己、以戲劇進行表達，在扮演過程中即可練習辨識角色的情緒，增進社會覺察；並在小組創作中協商衝突，提升人際技巧。質性資料亦顯示，甚至學生在排練中為了團隊目標，必須學習控自我管理，控制衝動，並學習同理他人觀點。換言之，教師以學生中心出發，參與者受鼓勵後勇敢投入，在角色扮演中發現與自身的連結，進而加深情感投入與自我認識；同時也觀察他人演出時，也能以更廣闊的視角反思自身在團體中的定位與貢獻，並於回饋環節表達對情緒共鳴與合作意義的體悟。此印證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課程在 SEL 實踐中的價值。這給未來研究相當提醒，當文化背景能被考量，微調戲劇活動的方式與進

程，在學生能接應的狀況下，戲劇是整合認知、情感與行為的有效載體。

（二）社會情緒學習的成效與內涵

量化與質性數據的分析結果顯示，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課程能有效促進國中生的社會情緒學習，尤其在「自我覺察」、「社會覺察」及「人際技巧」三個面向的提升最為明顯，而「自我管理」與「負責任的決策」的進步相對有限。其中，「自我覺察」提升幅度最大，反映學生對自身情緒與內在需求的理解加深，這與課程中透過角色扮演與情境模擬強調情緒表達與自我探索的設計相符。「人際技巧」與「社會覺察」的顯著提升則顯示，學生在課程中逐步增強了對他人情緒的敏感度，並能在互動中運用溝通與合作策略。質性資料亦顯示，學生在活動中更能理解不同觀點，體會他人情緒與需求。此發展可能來自課程設計的合作與討論活動，如小組即興演出與角色交換練習，幫助學生理解不同情境與情感，並尋找適切的行動策略，呼應量化結果中「人際技巧」與「社會覺察」的增長。

在教學應用層面，本研究揭示「自我管理」與「負責任的決策」的提升幅度較低，可能的原因為本課程重心偏向情緒表達與體驗，雖然學生普遍反映課程增進了自信與表達意願，對情緒調節或壓力管理的具體策略涉入較少，導致進步有限。進一步推論，「負責任的決策」略有提升，但仍顯平緩，顯示課程中複雜決策情境的模擬深度不足。質性資料指出，社會情緒學習各面向具相互關聯性，如「自我覺察」的提升可促進「人際技巧」與「社會覺察」的發展。當學生更能感知並表達自身情緒時，也更能理解他人並展現共情力與適應力，顯示課程並非單一能力訓練，而是透過整體性學習環境促進 SEL 全方位成長。此與許佩婷與陳學志（2022）強調的青少年非認知與情意層面發展一致，重視整體社會情緒能力與心理健康促進。

就未來研究方向，「負責任的決定」面向在量化數據上未見顯著差異，但在質性回饋中卻展現出對團體任務的責任意識。推究其原因之一，可能是評量工具與課程內涵的對應落差。在評量工具上，本研究採之「社會情緒學習量表」中，「負責任的決定」題項多偏向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判斷或個人生涯規劃的明智選擇，如我做事前會考慮安全後果。在課程內涵上，本研究之戲劇課程內容強調的責任，多是在美感合作脈絡下的團體責任，如我不遲到，避免影響團體排練；我需要把角色演好，成就整體故事。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定義權詮釋的不同，Zins 等人（2004）對於「負責任的決定」聚焦於複雜的倫理考量與社會規範評估；本課程雖有任務導向的小組決策過程，但未著重兩難情境或倫理價值判斷之辯證活動，使致進步有限。至此之提醒，未來戲劇課程可設計明確的價值澄清或道德兩難的主題與劇場，凸顯「負責任的決定」之素養。由上可得，SEL 雖有其五大面向的各自定義，但運用於教育現場之不同學科或對象，仍需在定義上給予操作型的重新調整，並對應發展適當的 SEL 相關量表。

（三）以表演藝術落實 SEL 教育政策並在東亞脈絡下建構創新課程模式

本研究以表演藝術落實 SEL 教育政策。2025 年 1 月教育部公布《社會情緒學習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2025 年至 2029 年逐步實踐幸福教育、健康臺灣、幸福學校、師生共好（教育部，2025）。教育部計畫強調，社會情緒學習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皆秉持全人教育的理念，著重學生的自主性與學習動能，學校教育應致力於幫助學生自我理解與認同，並培養溝通互動能力與同理心。本研究以 Rogers 的人本主義學習理論與 Way 的戲劇教育為核心，創造安全的表達環境，促進學生自我覺察與人際理解，與教育部發展 SEL 的理念相同，皆以學生主體性為核心，強調學習歷程中的動能

與反思。

然本研究聚焦在國中生，此計畫提及現行中課程含納社會情緒學習的理論與概念有國中小「生活課程」、「綜合活動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並無提及表演藝術的相關領域，此亦為本研究創新突破之處，揭示戲劇教育課程仍可嫁接 SEL 的學習，且有良好效果。再者，教育部計畫著重政策推動與跨系統協作，雖有提出可以結合的課程領域，但未有明確的教學範例，本研究提供學生中心取向的戲劇教育課程模式與教學歷程，示範 SEL 於教學現場的實踐路徑。提及教師研習與社群支持，但未強調教師作為研究者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法展現教師在教學中反思、修正、再行動的歷程，體現 SEL 推動中教師專業學習共同體之運作模式。以上之創發嘗試與前瞻探索，皆可作為未來表演藝術課程融入 SEL 之重要參考。

在東亞脈絡下建構創新課程模式方面，SEL 在東亞的教育脈絡下也如火如荼的發展，並在中學教育階段獲得不錯的效果。如 Teerawattanaprasit 等人（2022）以準實驗設計檢驗融合社會情緒學習的身體活動課程對於泰國國中生的心理健康與社會福祉之助益；結果顯示，實驗組在心理健康整體得分上顯著提升，特別是情緒調節與壓力管理進步最多，合作挑戰與小組任務強化了學生的溝通能力與同理心，研究最後提及 SEL 結合體育活動能讓學生在「低威脅情境」下練習人際技巧。本研究也有類似結果，以戲劇教育課程為主，無論是劇情的構思、表達，或者戲劇的排練等，多為低威脅性的合作與小組任務，亦獲得 SEL 各方面不錯的效果。

但因著文化的不同，東亞學生也可能存在 SEL 五面向上不同的差異，在設計課程實需要特別留心。Huynh 等人（2021）採用詮釋現象學理解越南國中教育在推動社會情緒學習時所面臨的挑戰，其研究發現越南文化強調尊師、服從與內斂，學生有時避免表達真實情緒以避免麻煩或失禮，例如以沉默或順從掩蓋焦慮、不安或衝突，這使得教師推動 SEL 之小組討論、情緒反思等活動較為困難。本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透過行動研究的觀察，學生在全班的大圓圈中顯得僵硬、視線閃躲，故在反思與調整上以增加「物件」作為中介如傳球，轉移對肢體的直接關注。可見，東亞的學生可能在表達上較為內斂與膽怯，不太能立刻自在的表達，此在 SEL 融入課程的推動上都需要更細膩適性的調整。另一項研究，Astuti 等人（2024）針對印尼國中生的社會情緒學習能力進行大規模量化調查發現，國中生的 SEL 能力屬於中度至中高程度，其中「自我覺察能力」最高，以「自我管理」能力最低，而「負責任的決定」變異度較大，此顯示學生在面對複雜情境時，倫理推理與行為後果評估能力仍具差異。在本研究中，「負責任的決定」也未獲得顯著的效果，一方面如上述討論，本戲劇教育課程未來可以置入更多道德倫理兩難或複雜的情境，一方面也如 Astuti 等人研究，東亞的國中生可能在「負責任的決定」之先備能力既分歧，需要更留意教學上的起點行為，以提供適切的課程內涵。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雖獲得具價值的實務發現，但仍存在以下限制，供未來研究參考：

（一）研究設計之內部效度限制

受限於學校行政編班與教學現場實務，本研究採單組前後測設計，未設置控制組。因此，雖前後測數據有顯著差異，但學理上無法完全排除學生自然成熟或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等外在變項的干擾。

（二）測量工具與課程目標的適配性

如討論所述，社會情緒學習量表可能無法精確捕捉到戲劇藝術活動所特有的「團體創作責任感」或「美感同理心」。量化工具與質性發現之間的不一致，反映出未來可能需要發展更具特定領域（domain-specific）敏感度的評量工具。

（三）推論範圍限制

本研究參與者僅為新北市某國中單一班級，且由研究者擔任授課教師，師生互動品質可能影響學習成效。故研究結果推論至其他地區或不同教學風格的場域時，需持審慎態度。

三、建議

（一）開拓倫理抉擇情境來強化決定與責任的能力

本研究在「負責任的決定」提升有限，可能因為表演藝術學科特質與戲劇需要小組合作的型態有關。未來可將兩難情境的融入。針對「負責任的決定」之提升，課程可融入過程戲劇（process drama）或論壇劇場技巧。例如，設計一個兩難的故事各節：主角撿到一筆錢，家中急需用錢但失主也正在尋找。教師可暫停戲劇，運用牆上的角色（role on the wall）或坐針氈（hot seating）等策略，邀請學生進入角色，辯證不同選擇的後果與社會責任，藉此強化倫理判斷的練習。教師應引導國中生在角色扮演中思考行為後果與責任，培養面對倫理情境的判斷力與反應能力，進而學會做出負責任的選擇。

（二）運用具體提問策略引導學生深度反思

本研究為行動研究，但對於教師在課程中引導未有清楚細膩的指引，使致學生「如何學」的描繪甚少。為了讓 SEL 的學習更被全面的理解，建議教師可根據 SEL 五大面向延伸具體提問策略並運用於活動中，如自我覺察方面，如果你是劇中的角色，在做這個決定時心裡在想什麼？同理心方面，如果你是他的朋友，看到他這樣做，你會有什麼感覺？透過層次分明的提問，引導學生從戲劇經驗連結至真實生活。

（三）整合情感與社會連結，提升情緒覺察與人際互動能力

本研究顯示角色扮演與故事創作能引發參與者的情感共鳴與自我覺察。未來課程應更強調情感與社會行為的結合。包括：1. 角色探索與情緒連結：讓國中生可透過背景分析與分組討論，理解角色的情緒與行為關聯，並延伸至現實生活情境，培養同理心與情緒感知。2. 培養情感智慧與多元包容力：設計具社會意涵的劇場活動，讓國中生在情感與價值衝突中學習適當表達與包容，以建立社會連結。

（四）社會情緒學習融入多元領域並發展適合的量表

本研究雖兼具量化與質性資料蒐集，但也僅於八年級某班級國中生之藝術領域戲劇教育課程實施，對於不同地區學校特色、學生特質、不同學科融入等皆未有探索。建議擴展研究至多元文化和社會背景的學生群體，甚至融入於不同學科領域，以助理解文化差異、社會結構對社會情緒學習之影響。此外，建議未來研究可開發更貼近戲劇教學情境的 SEL 評量工具，精確捕捉學生在藝術活動中的細微轉變。

參考文獻

呂欣茹。〈國小高年級社會情緒學習課程之運用－以 CASEL 為例〉。《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3（6），（2024）：62-68。

- 兒童福利聯盟。〈2018 臺灣校園霸凌防治現況調查〉。(2018)
https://www.children.org.tw/publication_research/research_report/2237
- 兒童福利聯盟。〈台灣兒少遭微歧視經驗與校園霸凌調查報告〉。兒童福利聯盟。
(2023) https://www.children.org.tw/publication_research/research_report/2658
- 林秀玲。《社會情緒學習在臺灣推動現況暨其對兒童社會情緒學習、學習動機、主觀
幸福感影響之研究》(未出版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2)
- 林玫君。〈從創造性戲劇談課程的統整方式〉。《國際兒童教育協會中華民國分會幼
兒教育課程統整方式面面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0):28-48。
- 林玫君。〈兒童戲劇教育之理論與實務〉。《心理》。(2017)
- 洪琬婷。〈運用戲劇教育結合情緒教育—以國中一年級表演藝術課程為例〉(未出版
碩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2023)
- 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總綱解析與實施準備〉。國家教育研究
院。(2016) <https://www.naer.edu.tw/PageSyllabus?fid=52>
- 張蔣耀文、施登堯。〈學生中心教學之概念解析〉。《臺灣教育評論月刊》，7
(7)，(2018):164-177。
- 許佩婷、陳學志。〈OECD 對 COVID-19 疫情之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政策與啟示〉。
《學生事務與輔導》，60(4)，(2022):1-6。 <https://doi.org/10.6506/>
- SAGC.202203_60(4).0001
- 郭洛伶、張弘勳。〈台南市國中生表演藝術課程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之研究〉。
《學校行政》，119，(2019):31-68。
[https://doi.org/10.6423/HHHC.201901_\(119\).0002](https://doi.org/10.6423/HHHC.201901_(119).0002)
- 陳學志。〈社會情緒學習的內涵與實踐原則〉。《師友雙月刊》，648，(2024):
13-18。
- 黃絢質。〈在同儕關係中的青少年情緒調節：美國 SEL 課程方案對當前國中綜合活動
領域教材教法之啟示〉。《台灣教育研究期刊》，16，(2020):230-253。
- 黃絢質。〈美臺中小學自我情緒探索素養課程之比較及啟示〉。《臺灣教育評論月
刊》，9(1)，(2020):127-131。
- 劉宗幸。〈實施社會情緒學習課程提升青少年自我調節能力〉。《台灣教育》，731，
(2021):83-90。
- 歐用生。〈深度的核心素養觀：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理論與實踐〉。《高等教育》。
(2018)

- 潘淑滿。《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心理。(2003)
- 蔡清田。《教育行動研究》。五南。(2000)
- 衛生福利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計畫」案 109 年度期末成果報告〉。(2020)
<https://www.tsos.org.tw/km/4849>
- 薛明鑫。《戲劇教育在霸凌防制中的師生增能－從中學表演藝術課程出發》(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2019)
- 教育部。《教育部社會情緒學習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2025)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CA99860C9634CFB0
- Astuti, B., Purwanta, E., Lidyasari, A. T., Bhakti, C. P., Lestari, R., & Amedome, S. N. (2024).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profil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Java. *Professional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Journal*, 5(1), 11-20.
<https://doi.org/10.21831/progcouns.v5i1.65755>
- Balter, A. S., Moloney, M., Ma, C., Lee, A., Pierre, S., Parkes, S., Pulat, D., Racine, N., & Andrade, B. F. (2025). A protocol of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to test the feasibility and efficacy of the EMPOWER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curriculum for youth aged 11-14 years in after-school settings. *PLoS ONE*, 20(3), 1-13.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319398>
- Berg, J., Osher, D., Same, M. R., Nolan, E., Benson, D., & Jacobs, N. (2017). Identifying, defining, and measur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ies: Final report. 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
- Brill, K., McGuinness, C., & Nordstokke, D. (2025). Relations between a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EL) program and changes in resilience, self-esteem, and psychological flourishing in a youth sample. *Discover mental health*, 5(1), 43.
<https://doi.org/10.1007/s44192-025-00173-x>
-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020, November). CASEL's SEL framework. <https://casel.org/casel-sel-framework-11-2020/>
- Froyd, J. E., & Simpson, N. (2008).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Addressing faculty questions about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Texas A&M University.
- Huynh, V.-S., Giang, T.-V., Nguyen, T.-T., & Dinh, D.-H. (2021). Exploring the challenges of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integr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A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in Vietnam.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 14, 621-635.
<https://doi.org/10.2147/PRBM.S300748>
- Jones, S. M., & Kahn, J. (2017). The evidence base for how we learn: Supporting students' social, emotional,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National Commission on Social, Emotional,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The Aspen Institute.
- Jones, S. M., & Kahn, J. (2017, September 13). The evidence base for how we learn: Supporting students' social, emotional,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Consensus

statements of evidence from the Council of Distinguished Scientists. National Commission on Social, Emotional,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The Aspen Institute.

- Kaşıkcı, F., & Öğülmüş, S. (2024). Adolescent well being: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and microsystem supports.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7(3), 1097-1114. <https://doi.org/10.1007/s11218-023-09852-5>
- Lailatussaidah, L., Isti'adah, F. N. L., & Nugraha, A. (2021). Profile of self-awarenes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roGCouns: Journal of Professionals in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2(2), 62-72. <https://doi.org/10.21831/progcouns.v2i2.41189>
- Li, A., Miller, F. G., & Williams, S. C. (2025). Cultural adaptations to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programs: A systematic review. *School Psychology*, 40(2), 108-120. <https://doi.org/10.1037/spq0000649>
- Pollak, I., Stiehl, K. A. M., Birchwood, J., Schrank, B., Zechner, K. A., Wiesner, C., & Woodcock, K. A. (2024). Promoting peer connectedness through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Evaluating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mechanisms and implementation factors of a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programme for 9 to 12-year-old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53(1), 89-116.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23-01871-x>
- Rogers, C. R. (1969). *Freedom to learn*. Charles E. Merrill.
- Rogers, C. R. (1983). *Freedom to learn for the 80's*. Charles E. Merrill.
- Tagat, A., Balaji, A., & Kapoor, H. (2025). The impact of life skills education on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school-related outcomes among adolescents in India. *BMC Public Health*, 25(1), 759.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24-21195-0>
- Teerawattanaprasit, N., Sarayuthpitak, J., Yasiersat, C., & Phroedphring, C. (2022). Effects of physical activity program by apply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to promote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well-being of lowe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Journal of Thailand National Sports University*, 15(1), 141-150.
- Van De Sande, M. C., Kocken, P. L., Diekstra, R. F., Reis, R., Gravesteyn, C., & Fekkes, M. (2023). What are the most essential social-emotional skills?: Relationships between adolescents' social-emotional skills and psychosocial health variables: An explorative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a sample of students in preparatory vocational secondary education. *Frontiers in Education*, 8, Article 1225103. <https://doi.org/10.3389/educ.2023.1225103>
- Way, B. (1967, 1972). *Develop through drama*. Humanities Press.
- Zins, J. E., Weissberg, R. P., Wang, M. C., & Walberg, H. J. (Eds.). (2004). *Building academic success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What does the research sa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Play Together: An Action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a Student-Centered Drama

Education Program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CHIEN YU ⁽¹⁾⁽²⁾, CHENG, HSIAO-FENG ², LI, CHYI-CHANG ³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develop a student-centered drama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explore its effects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 Thirty-four eighth graders from a public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participated in an eight-week program integrated into the formal performing arts curriculum, with one 45-minute session per week. Using an action research design,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A 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with the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cale assessed changes in SEL, whil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reflection journals, and observation records provided qualitative insights. Results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self-awareness, self-management, social awareness,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though no significant gains in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Qualitative findings indicated enhanced emotional expression, perseverance, empathy, and perspective-taking through collaborative crea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student-centered drama education effectively fosters students' SE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integrating arts-based approaches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school curricula.

Key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 Student-centered drama education program

(1) This research and article is the part of master thesis of the first author.

(2) Th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Instruc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3)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indy6510@ntnu.edu.tw

(4) Th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Instruc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Received 10/27, 2025; Revised 12/12, 2025; Accepted 12/12, 2026)

佛光人文社會學報 · 第八期
2026 年 1 月 24-70 頁
佛光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院

Who Wants to Marry—and Why Not? Marriage Intentions and Gender Role Attitudes among Never-Married Adults in Taiwan

Rong-Kou Liu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o Guang University, Taiwan

Running head: Marriage Intentions and Gender Role Attitudes

Corresponding Author (*):

Rong-Kou Liu (ORCID: 0000-0001-8064-4743)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o Guang University

Yunhui Building, No. 160, Linwei Road,

Jiaoxi Township, Yilan County 26247, Taiwan

Email: rongkou@gmail.com

Phone: +886-953-407-17

Abstract

Understanding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among the never-married is crucial, 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adults remain single.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individuals' gender role attitudes influence their intention to marry in Taiwan. Using data from the 2020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 we analyz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age, gender, education, relationship status, etc.) and the willingness to marry among never-married adults. The sample consisted of 1,714 never-married individuals (701 women and 1,013 men) aged 27–50 years ($M = 34.13$, $SD = 4.61$). Results showed that women, those over age 40, individuals not currently in a relationship, and those with lower education were less inclined to marry. Controlling for demographics, egalitarian attitudes toward gender roles had divergent effects on marriage intentions. Specifically, valuing a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increased willingness to marry, whereas emphasizing personal autonomy decreased the desire to marry; holding traditional beliefs about motherhood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Moreover, the impact of valuing personal autonomy on marriage intention was moderated by gender: men who placed less emphasis on personal autonomy expressed the highest desire to marry.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complex role of gender ideology in marital decision-making, with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family policy in changing societies.

Keywords: Marriage intention, gender equality, gender role attitudes,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

I. Introduction

Marriage has traditionally been a cornerstone of social structure, symbolizing stability, security, and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In recent decades, however, societal expectations around marriage have shifted dramatically, an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ndividuals no longer view marriage as a necessity. These changing attitudes have coincided with declining marriage rates in many societies, including Taiwan. According to Taiwan'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marriages has steadily declined in recent years. In 2020, only 121,702 marriages were recorded in Taiwan – then the lowest figure in over a decade. This downward trend continued in 2021 with just 114,606 marriages, but 2022 saw a rebound to 124,997 marriages. However, this upturn was short-lived: the number remained nearly flat at 125,192 in 2023 before declining again to 123,061 in 2024. The crude marriage rate likewise fell from 5.16‰ in 2020 to 4.89‰ in 2021, rose to 5.36‰ in 2022, then edged down to 5.26‰ by 2024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n.d.). Despite these year-to-year fluctuations, the broader trend indicates a gradual shift away from marriage as a social norm in Taiwan.

This shift in marriage trends has been attributed to transformations in gender roles and socio-economic structures, which have altered individuals' evaluations of marriage and its associated benefit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first proposed by Homans (1958) and later expanded by Blau (1964), offers a valuable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se trends. This theory posits that individuals evaluate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marriage, through a cost-benefit calculus, seeking to

maximize rewards while minimizing costs. Traditionally, marriage provided economic security, social status, and companionship, making it a mutually beneficial arrangement. However, as gender roles have evolved and economic independence—especially among women—has increased, while expectations around domestic labor have remained unequal, the perceived costs of marriage (e.g., financial burdens, career trade-offs, and household responsibilities) may outweigh its benefits (Becker, 1991; Bianchi et al, 2012; Goldscheider et al., 2015). As a result, more individuals, particularly highly educated women with career ambitions, may delay or opt out of marriage entirely, a pattern observed across East Asia and documented in Taiwan’s case (Cheng, 2014; Raymo et al., 2015).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shifting attitudes toward gender-roles influence marriage intentions in Taiwan. Taiwan presents a compelling case, combining progressive gains in women’s education and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with enduring familistic expectations regarding domestic roles (DGBAS, 2024; Thornton & Lin, 1994). By analyzing individual-level attitudes toward gender roles and marriag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broader literature on marital decision-making in transitional East Asian societies (Kaufman, 2000; Raymo et al., 2015; Tsuya, 2015).

A. The Changing Perceived Utility of Marriage

Marriage has long been understood as an institution shaped by gender-role specialization, where men and women engage in mutually beneficial exchanges of economic and domestic contributions (Becker, 1991). However, as gender

roles have been redefined in both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household, marriage patterns have shifted, leading to lower marriage rates, declining fertility, and increased marital instability across industrialized societies (Esping-Andersen & Billari, 2015). Social exchange theory provides an additional micro-level perspective: individuals assess marriage relative to alternative lifestyles through a cost–benefit calculus, weighing expected rewards (e.g., economic security, social status, companionship) against anticipated costs (e.g., opportunity costs, time, and role conflict) (Blau, 1964; Homans, 1958).

Empirical research broadly supports the prediction that as gender roles become less specialized, the perceived benefits of marriage decline—especially for women who no longer rely on marriage for financial security. In contexts with low levels of gender equality in the domestic sphere (e.g., parts of Southern Europe), family formation is often postponed and unions are less stable (Rindfuss et al., 2016); at the attitudinal level, cross-national survey evidence shows that more egalitarian gender-role attitudes are associated with lower marital centrality and slower transitions into marriage (Kolpashnikova et al., 2020). By contrast, in societies with high levels of gender egalitarianism (e.g., Scandinavian countries), marriage and family formation have rebounded as egalitarian norms and policy supports reduce the private-sphere costs of partnership (Esping-Andersen & Billari, 2015; Goldscheider et al., 2015; Jalovaara et al., 2019; McDonald, 200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egalitarianism and marital decisions is dynamic rather than linear. According to the gender revolution framework, societies transition from a traditional male breadwinner model to more gender-

symmetric partnerships in distinct phases, and family behavior responds differently at each stage (Esping-Andersen & Billari, 2015; Goldscheider et al., 2015). In early transitional phases, women's expanding participation in paid work collides with slow change in domestic roles, producing role conflict and higher opportunity costs that discourage marriage, thereby raising rates of singlehood (Kolpashnikova et al., 2020; McDonald, 2000). Consistent with this view, Bellani, Esping-Andersen, and Nedoluzhko (2017) identify a curvilinear pattern: lifelong singlehood peaks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 and is lower in both highly traditional and highly egalitarian contexts, implying a U-shaped association between gender-role change and marriage rate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helps clarify the mechanism: when the perceived costs associated with marriage (e.g., role conflict, economic burdens, unequal division of domestic labor) outweigh the expected benefits, many individuals choose alternatives such as remaining single or cohabiting (Blau, 1964).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female revolution, where women gain economic independence but men's contributions to household labor remain limited, normative uncertainty and unequal expectations depress the perceived utility of marriage, especially for highly educated, career-oriented women (Becker, 1991; Esping-Andersen & Billari, 2015; Goldscheider et al., 2015). Conversely, as societies move toward complete gender egalitarianism—with more equal sharing of care and earnings—the net benefits of marriage rise, and family formation tends to stabilize at moderate fertility rates (Goldscheider et al., 2015; Esping-Andersen & Billari, 2015; McDonald, 2000; Jalovaara et al., 2019).

Much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s cross-national and macro-comparative, but fewer studies probe how individual gender-role attitudes interact with structural change to shape marital decisions. This micro–macro linkage is particularly salient in Taiwan, where traditional family expectations coexist with modern gender norms. Examining how individuals in transitional settings assess marriage amid competing expectations, in Taiwan and East Asia more broadly, the rise in women’s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has not been matched by fully egalitarian domestic arrangements (Raymo et al., 2015; Takeuchi & Tsutsui, 2016). Taiwan-specific evidence also reveals shifting educational gradients in partnering and increasingly selective marriage (Cheng, 2014), while East Asian syntheses document persistent tensions between rapid socioeconomic change and slower changes in family norms (Raymo et al., 2015; Tsuya, 2015). These conditions heighten the cost side of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calculus for some groups, resulting in heterogeneous marriage intentions and family formation patterns.

To understand the declining perceived utility of marriage, it is therefore essential to examine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gender ideology, encompassing beliefs about household labor division and caregiving, as well as views on financial provision and autonomy, and how these dimensions interact with institutional supports (McHugh & Frieze, 1997). The following section examines how distinct facets of gender ideology influence individual marital pre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 dynamics within Taiwan’s evolving gender regime (Cheng, 2014; Raymo et al., 2015; Takeuchi & Tsutsui, 2016).

B. Multidimensionality of Gender-Role Attitudes and Marriage Decisions

Gender-role attitudes shape how individuals perceive marriage,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nd career aspirations, thereby influencing whether to marry, when to marry, and how to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life. Traditionally, these attitudes were conceptualized along a single continuum from traditionalism to egalitarianism—with male breadwinner–female caregiver norms at one end and full gender equality at the other (Fuwa, 2004; McDaniel, 2008). However, recent research challenges this linear model, arguing that gender-role attitudes are multidimensional and context-dependent, requiring a more nuanced framework (England, 2010; Knight & Brinton, 2017).

Gender-role attitudes spa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domains. Public-domain attitudes concern equality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leadership; private-domain attitudes concern household labor, caregiving, and familial expectations (McDaniel, 2008). While workforce equality has advanced, expectations about domestic roles often lag—especially where traditional family norms persist alongside modern gender ideologies (Bolzendahl & Myers, 2004; Davis & Greenstein, 2009; Raymo et al., 2015). This public–private gap helps explain why similar levels of equality at work can coexist with unequal divisions of labor at home.

To capture this complexity, scholars distinguish distinct types of egalitarianism rather than a single traditional egalitarian axis. Knight and Brinton (2017) propose three variants: (a) liberal egalitarianism, which advocates for equal responsibilities in both market work and family care. (b) Egalitarian familism, endorsing shared financial duties while retaining more traditional

caregiving roles. (c) Flexible egalitarianism, emphasizing individualized choice in balancing career and family. These variants underscore that attitudes do not evolve uniformly; instead, they interact with cultural and economic contexts to shape diverse marital decisions.

In traditional settings, gender norms have historically made marriage a practical necessity for women, given their reliance on male financial support (Thornton & Lin, 1994). As gender roles evolve, however, individuals increasingly value equality in both domestic and professional spheres, contributing to lower marriage rates in societies where public-sphere change outpaces private-sphere change, particularly in those undergoing gender transition (Goldscheider et al., 2015; Esping-Andersen & Billari, 2015). Empirically, egalitarian attitudes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lower marriage intentions when traditional household expectations persist (Davis & Greenstein, 2009; Takeuchi & Tsutsui, 2016). Women who anticipate unequal housework or career sacrifices tend to delay or forgo marriage (Brinton, 2001; Lomazzi & Seddig, 2020; Takeuchi & Tsutsui, 2016).

During periods of gender-role transition, conflicting norms generate uncertainty about marital expectations, increasing the likelihood of delayed marriage or singlehood (Brinton, 2001). Where women adopt egalitarian values but men's domestic contributions remain low, dissatisfaction with traditional marital arrangements increases, reinforcing hesitation to marry (Takeuchi & Tsutsui, 2016; Raymo et al., 2015). In such context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predicts that higher expected costs (role conflict, economic burdens, unequal

labor division) reduce the net benefits of marriage, making singlehood or cohabitation more attractive (Fukuda, 2020; Thibaut & Kelley, 1959; Blau, 1964).

The comparison level for alternatives clarifies why individuals may opt for alternatives when career advancement,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personal fulfillment are attainable outside marriage (Thibaut & Kelley, 1959; Oppenheimer, 1994). Recent studies indicate that cohabitation, prolonged singlehood, and career prioritization are increasingly viable options—especially for highly educated, career-oriented individuals (Raymo et al., 2015; Yu & Xie, 2015). Where economic instability or workplace gender bias persists, marriage becomes less attractive as individuals seek greater control over life trajectories (Yu & Xie, 2015; Brinton, 2001).

Beyond intentions, gender-role attitudes also shape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relationships.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 couples often struggle to reconcile modern expectations with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thereby escalating conflict (Kolpashnikova et al., 2020). Even as explicit support for male primacy wanes, gender essentialist beliefs—that men and women possess inherently different traits—persist, fueling disputes over caregiving and housework (Hochschild, 2012; England, 2010). This tension is particularly salient in East Asia, where high female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coexists with traditional caregiving expectations, contributing to relationship dissatisfaction and, in some contexts, rising divorce rates (Knight & Brinton, 2017; Raymo et al.,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role attitudes and marriage decisions is complex, shaped by cultural traditions,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evolving norms. While equality i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has advanced, expectations around domestic responsibilities continue to condition marriage decisions. In gender-transitioning societies, individuals navigate the competing demands of career aspirations, family expectations, and relationship equity, producing diverse marital trajectories. These dynamics are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Taiwan, where progressive changes in the public sphere coexist with deeply rooted norms in the private sphere. The following section examines gender equality and role attitudes in Taiwan, tracing how labor-market conditions,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policy interventions, and shifting social attitudes interact to shape marriage decisions.

C. Egalitarian Role Attitude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Taiwan has undergone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especially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ncreased women’s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that have reshaped family structures and marriage trends. As in many Western contexts, Taiwan has moved toward greater gender egalitarianism, as reflected in policy advances, shifting social attitudes, and rising female employment rates. However, despite these progressive changes, traditional family expectations and gender norms continue to influence decisions about marriage and family formation (Goldscheider et al., 2015; Inglehart & Norris, 2003; Thornton & Young-DeMarco, 2001).

According to the Executive Yuan’s Department of Gender Equality, using

the UNDP 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 methodology and 2019 data, Taiwan would rank sixth globally and first in Asia (Executive Yuan, Department of Gender Equality, 2021). This same report documents the immediate uptake of marriage equality: from legalization on May 24, 2019, to the end of May 2020, Taiwan registered 4,087 same-sex marriages (1,257 male couples; 2,830 female couple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Departmen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n.d.). These indicators show that formal equality has advanced in Taiwan's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However, private-sphere inequalities persist, especially in household labor and caregiving. Official time-use statistics indicate that women continue to perform the majority of routine household work, even in dual-earner households.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s Survey on Social Development Trends reports that women undertake roughly three-quarters of routine housework on both weekdays and weekends; complementary indicators show that among partnered adults, women's daily unpaid care time (e.g., cooking, cleaning, childcare) is multiple times that of their partners (Executive Yuan,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n.d.). These patterns align with earlier Taiwanese studies documenting unbalanced domestic expectations (Lee et al., 2000; Lu, 2011; Mason & Lu, 1988).

The coexistence of progressive ideologies and deeply rooted norms also creates sex-differentiated expectation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many Taiwanese men endorse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yet are less willing to assume equal shares of household labor, contributing to frustration among women who

seek egalitarian partnerships (Lu, 2011; Takeuchi & Tsutsui, 2016; Xu & Lai, 2002). Workplace structures can reinforce these dynamics by penalizing family-related interruptions and affording men greater career continuity, further disincentivizing marriage among career-oriented women (Brinton, 2001; Yang et al., 2020; Yu & Xie, 2015).

Taiwan's gender landscape reflects a duality of progress and persistence, as robust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inclusive policies coexist with enduring private-sphere expectations surrounding caregiving and marriage timing. As norms continue to evolve, marriage is increasingly treated as a lifestyle choice rather than a universal milestone, and heterogeneous gender-role attitudes (spanning public and private domains) generate diverse marital trajectories (Davis & Greenstein, 2009; Fuwa, 2004; Hochschild, 2012; Knight & Brinton, 2017; Kolpashnikova et al., 2020; McDaniel, 2008).

D.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Marriage extends beyond a private partnership; it is tightly interwoven with childbearing, caregiving, and broader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the decision to marry is no longer viewed as an obligatory life event, but rather as a discretionary choice shaped by economic conditions, social norms, and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Guided by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the gender revolution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gender-role attitudes relate to individuals' intentions to marry in a context where progressive public sphere changes coexist with enduring private sphere norms. We raise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a) Are more egalitarian gender-role attitudes regarding marriage and

family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intention to marry in Taiwan? (b) Does this association vary across distinct domains of gender-role attitudes—specifically, expectations about household labor,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and caregiving roles? (c) Do these relationships differ for women and men, indicating gendered opportunity costs and expectations?

By addressing these questions,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nuanced account of how multidimensional gender ideologies influence marriage choices in Taiwan. Substantively, it (a) disaggregates gender-role attitudes into private- and public-sphere components to identify which domains matter most for marriage intentions; (b) tests for gender heterogeneity consistent with differential costs and rewards of marriage; and (c) situates Taiwan within broader theoretical debates about why marriage is increasingly treated as a lifestyle choice rather than a universal milestone.

II.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Participants

We analyzed data from the 2020 follow-up of the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multi-cohort longitudinal survey launched in 1999 b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The PSFD adopts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tratified multi-stage probability sampling design. For each cohort, the first-wave sample frame is drawn from the nation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based on eligible birth cohorts. Within each stratum, township/districts are selected using probability-proportional-to-size (PPS) systematic sampling, followed by PPS selection of villages/wards within sampled townships, and

finally systematic sel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in villages. Most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by trained field interviewers. Although panel attrition has accumulated across waves, retention rates have remained within acceptable bounds and fieldwork protocols were designed to minimize selective loss. The PSFD established five baseline cohorts in 1999, 2000, 2003, 2009, and 2016, followed respondents annually through 2011 and biennially (every two years) since 2012. The 2020 wave included $N = 5,692$ respondents across multiple birth cohorts.

For the present study, we applied three inclusion criteria. First, we restricted the sample to never-married respondents ($n = 1,946$; 34.4%), whose ages in 2020 ranged from 27 to 84 years. Second, to focus on individuals for whom marriage remains a salient life-course option, we limited the age range to 50 years or younger, excluding 55 never-married respondents older than 50 (2.8% of the never-married subsample). This conventional restriction reduces bias from respondents who are likely past the active stage of the marriage decision. Third, we required complete data on key study variables (gender-role attitudes, marriage intention, and covariates), employing listwise deletion for missing data. We examined the resulting missing-data pattern and found that 177 never-married respondents (9.1% of the never-married subsample) were excluded due to incomplete information on at least one of the analytic variables.

After applying these criteria, the analytic sample consisted of 1,714 never-married adults (1,013 men and 701 women), with a mean age of 34.13 years ($SD = 4.61$). To assess potential selection bias arising from the age restriction and listwise deletion, we compared the analytic sample with the full never-married

PSFD subsample on key demographic variables (gender, age group, education, and relationship status). The two samples exhibited highly similar distributions, with differences generally below one percentage point, indicating that exclusions due to missing data did not materially distort the demographic composition of the analytic sample (Table 1).

B. Measurement

Gender Role Attitudes. Gender role attitudes were assessed with 10 statements on gender, family, and work adapted from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urveys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The items capture beliefs about gender roles in both the private (household and caregiving) and public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spheres, ensuring comparability with prior research on gender ideology. Respondents rated each item on a five-point Likert scale (1 = strongly disagree, 5 = strongly agree). The set covered expectations about domestic responsibilities and caregiving, perceptions of workplace gender equality, and beliefs about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within households. Higher scores indicate stronger agreement with the statement as worded.

Marriage Intention. Marriage intention was measured with a single item: “Do you want to get married someday?” Response options were Yes (1), No (2), and I do not know (3). This measure captures respondents’ general willingness to marry in the future, encompassing both firm intentions and uncertainty.

Demographic Variables. We included several single-item demographic measures to profile participants and serve as covariates: age, gender, education, financial satisfaction, and current relationship status. Gender was coded male (1) and female (2). Age was categorized to facilitate comparisons: 27–30 years (1), 31–40 years (2), and 41–50 years (3). Education was classified into five levels: junior high school and below (1), senior high school (2), junior college (3),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4), and university and above (5). Financial satisfaction was measured with the item “Are you satisfied with your personal financial status?” on a four-point scale: very dissatisfied (1), dissatisfied (2), satisfied (3), very satisfied (4). The relationship history/status was coded as 'never in a relationship' (1), 'had a relationship in the past' (2), or 'currently in a relationship' (3).

C. *Statistical Analyses*

Analyses proceeded in three stages. First, we examined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gender-role attitude items using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with principal axis factoring and Promax (oblique) rotation. Factor retention was guided by eigenvalues (>1), scree plots, and interpretability. For each retained factor, we computed scale scores (mean of constituent items).

Second, we conducted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continuous variables and Pearson χ^2 tests with Cramer’s V as an effect size for categorical variables to describe sampl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e zero-order associations with marriage intention. These comparisons contrasted respondents’ marital

intention, and also summarized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rriage intention.

Third, we modeled predictors of marriage intention using a sequential logistic-regression framework. The primary model contrasted willingness to marry vs. unwillingness to marry; respondents answering “I do not know” were excluded from this primary analysis¹. (a) Model 1 included the factor-based gender-role attitude indices (Motherhood Responsibility, Individual Autonomy, Work–Family Balance). (b) Model 2 added demographic covariates (gender, age group, education, financial satisfaction, and current relationship status). (c) Model 3 added interaction terms between gender and each attitude index to test moderation.

Al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in IBM SPSS Statistics 27. Unless noted otherwise, tests were two-tailed with $\alpha = .05$. We used listwise deletion for missing data on analysis variables. Multicollinearity was assessed via variance-inflation factors (all VIFs < 3).

III. Results

A. *Factor Analysis*

We conducted a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using principal axis factoring with Promax (Kaiser-normalized) rotation to examine the latent

¹ **Footnote.** As a robustness check, we estimated a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reating marriage intention as a three-category outcome (“Yes,” “Not sure,” “No”). The *Not sure* category displayed patterns largely similar to the *No* group. Due to the small size of the *Not sure* group and sparse cases in several demographic categories—which produced convergence and stability issues—these results are not reported in the main tables but were consistent in substantive interpretation.

structure of the 10 gender-role items. A three-factor solution emerged, accounting for 54.1% of the total variance, which indicates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variance explained. Because an oblique rotation was used, factor intercorrelations were permitted. Factor loadings and variance details are reported in Table 2.

Motherhood Responsibility. This factor captures traditional beliefs about women's essential roles as mothers and caregivers and the perceived costs of maternal employment for children and family life. Illustrative items include: "A preschool child is likely to suffer if his or her mother works," "All in all, family life suffers when the woman has a full-time job," and "A job is all right, but what most women really want is a home and children."

Individual Autonomy. This factor reflects endorsement of personal agency and gender equality, emphasizing women's self-sufficiency through employment and an equitabl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Representative items include: "The best way for a woman to achieve independence is through employment" and "If both spouses are employed, household chores should be shared equally."

Work–Family Balance. This factor assesses attitudes regarding the compatibility of paid work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s well as the feasibility of balancing both roles. Example items include: "A working mother can establish just as warm and secure a relationship with her children as a mother who does not work," and "Being a housewife is just as fulfilling as working for pay."

Together, Motherhood Responsibility,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Work–Family Balance represent distinct dimensions of gender-role attitude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the first aligns with traditional views of domestic roles, the second with egalitarian autonomy and role symmetry, and the third with integrative perspectives on reconciling work and family.

B.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Marriage Intention

We used cross-tabulations with Pearson’s χ^2 tests (and Cramer’s V as an effect size)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gender, age, relationship status, education, and marriage intention (Yes, No, Not sure). Ns vary across tests due to item-level missingness.

Gender.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gender and marriage intention, $\chi^2(2, N = 1,714) = 61.87, p < .001$. Men were more likely than women to express a willingness to marry.

Age. Marriage intention also varied by age (Cramer’s $V = .11, N = 1,714, p < .001$), indicating a small-to-moderate association: willingness to marry declined with age, whereas reluctance increased.

Education. Education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marriage intention (Cramer’s $V = .12, N = 1,714, p < .001$),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associated with a greater willingness to marry compared to low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Relationship status. Relationship status showed the strongest association with marriage intention (Cramer’s $V = .17, N = 1,714, p < .001$). Individuals

currently in a relationship were substantially more likely to report a willingness to marry than those who had never been in a relationship or had only had past romantic experiences.

Financial satisfaction. A one-way ANOVA tested whether financial satisfaction differed across the three intention groups.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2, 1,711) = 1.54, p > .05$, indicating comparable levels of financial satisfaction across groups.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en exhibit a greater willingness to marry, whereas women report higher levels of reluctance and uncertainty. Younger respondents are more open to the idea of marriage than older respondents. Current romantic involvement is strongly linked to a willingness to marry, and higher educ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openness to marriage. These patterns highlight the interplay between gender norms, life-course stage, relationship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shaping contemporary marriage intentions. (See Table 3 for detailed distributions.)

C.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Marriage Intention

A set of one-way ANOVAs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three marriage-intention groups (Yes, No, Not sure) on each gender-role attitude. Scores on Motherhood Responsibility differed significantly, $F(2, 1711) = 6.59, p < .01$, with a small effect: the *Not sure* group reported the lowest endorsement of motherhood-centric beliefs ($M = 2.06, SD = 0.67$), whereas the *Yes* ($M = 2.26, SD = 0.69$) and *No* ($M = 2.21, SD = 0.70$) groups were relatively similar. Beliefs in Work–Family Balance also varied by intention, $F(2, 1711) = 3.38, p$

< .05, again with a small effect: respondents willing to marry scored highest ($M = 4.05$, $SD = 0.65$), while those unwilling ($M = 3.97$, $SD = 0.66$) and those unsure ($M = 3.98$, $SD = 0.66$) scored slightly lower. Finally, Individual Autonomy scores differed across groups, $F(2, 1711) = 5.82$, $p < .01$, with a small effect: the *No* group showed the highest autonomy ($M = 4.12$, $SD = 0.70$), the *Yes* group the lowest ($M = 4.00$, $SD = 0.69$), and the *Not sure* group fell in between ($M = 4.07$, $SD = 0.67$). Taken together, these patterns suggest that stronger beliefs that work and family can be reconciled are associated with a greater willingness to marry. In contrast, a stronger emphasis on personal autonomy is associated with unwillingness to marry, and differences in traditional motherhood views are most evident among respondents who remain uncertain about marriage. Although the omnibus test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effects are minor; formal post-hoc comparisons (e.g., Tukey or Games–Howell) would clarify which specific group contrasts account for these findings.

We estimated sequential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s to identify predictor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willingness to marry (Yes) and unwillingness to marry (No), excluding the "Not sure" category from these models.²

² In line with the reviewer's suggestion, we additionally estimated gender-stratified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financial satisfaction, and relationship status were generally similar for men and women. A notable gender difference emerged only for Individual Autonomy, which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willingness to marry among men but not among women,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bserved in the pooled model used in the main analyses.

Model 1 (attitudes only). Valuing work–family balance was associated with lower odds of unwillingness to marry ($OR = 0.80, p < .01$), whereas emphasizing individual autonomy wa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odds of unwillingness ($OR = 1.32, p < .001$). Motherhood responsibility was not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Model fit was modest (Nagelkerke $R^2 = .10$).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was 88.5% for the “willing” group and 80.9% for the “unwilling” group.

Model 2 (adding demographics). The effects of work–family balance (protective) and individual autonomy (risk) attenuated slightly but remained significant. Net of attitudes, women had higher odds of unwillingness than men ($OR = 2.11, p < .001$). Lower educ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a greater unwillingness, especially among junior high ($OR = 3.01$) and senior high ($OR = 1.88$) students, compared to those with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above. Older age was associated with a markedly increased unwillingness (41–50 years: $OR = 2.51$). Compared with those currently in a relationship, respondents who had never partnered ($OR = 3.60$) or had only a past relationship ($OR = 2.97$) were more likely to report an unwillingness to marry. Financial satisfac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Model 3 (gender \times attitude interactions). Of the interaction terms, gender \times individual autonomy was significant. As illustrated in Figure 1,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tonomy and unwillingness was stronger for men: men with lower emphasis on personal autonomy showed the highest desire to marry (i.e., the lowest predicted probability of unwillingness), whereas men who

highly valued autonomy were least inclined to marry. For women, the slope was comparatively weaker.

Net of demographics, two attitudinal dimensions showed divergent links with marriage intention: endorsing work–family balance is associated with a greater willingness to marry, while prioritizing individual autonomy i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willingness. These effects are moderated by gender for autonomy, with the strongest marriage inclination observed among men who place less emphasis on personal autonomy.

IV. Discuss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lluminate how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gender-roles shape marriage intentions. Our results examine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gender-role attitudes and disentangle their distinct associations with willingness to marry. Specifically, valuing work–family balanc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marriage intentions for both women and men. By contrast, a stronger emphasis on personal autonomy i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intention to marry; an exception is that single men who place less value on individual autonomy report a higher willingness to marry. Additionally, holding traditional views about the centrality of motherhood is not associated with marriage intentions.

Becker (1991) posits that traditional specialization encourages marriage, and much prior work links traditional views to more stable family life. Othe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egalitarian attitudes, when they clash with traditional family expectations, may undermine conventional family processes (Haggqvist

et al., 2017). Oppenheimer and Lew (1995) argue, however, that specialization can be costly for both spouses because it burdens each with rigid provider/caregiver roles. These mixed findings likely reflect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prevailing normative contexts. In our data, participants generally disagreed with restrictive norms surrounding the centrality of motherhood and a rigid division of labor, suggesting that support for the “male-breadwinner/female-homemaker” model has declined in Taiwan, consistent with the absence of a positive effect of motherhood centrality on marriage intentions.

McDonald (2000) distinguishes gender equity in individual-oriented institutions (e.g., political rights, education, employment) from equity in family-oriented institutions (e.g., inheritance, fertility decisions, housework). Equity in the public sphere has expanded rapidly, whereas change in the private sphere has been slower. Given faster change in women’s work roles than in men’s domestic roles, work–family balance may carry different meanings by gender (Goldscheider & Goldscheider, 1992): egalitarian women may view “balance” as reducing disproportionate home responsibilities, while egalitarian men may view it as actively sharing child- and family-centered tasks. In this light, endorsing work–family balance appears to function as a pro-family orientation among men, aligning with our finding that it raises men’s marriage intentions.

McDonald (2000) distinguishes gender equity in individual-oriented institutions (e.g., political rights, education, employment) from equity in

family-oriented institutions (e.g., inheritance, fertility decisions, housework). Although progress toward gender equity in the public sphere has been relatively rapid, change in the private sphere of the family has been slower and more uneven. Given that women's work roles have changed more quickly than men's domestic roles, work–family balance may be interpreted in somewhat different ways by women and men (Goldscheider & Goldscheider, 1992): egalitarian women may view “balance” as alleviating a disproportionate burden of unpaid care and housework, whereas egalitarian men may view it as greater involvement in child- and family-centered tasks. In our data, however, endorsement of work–family balance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odds of reporting intention to marry,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ork–family balance and gender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aken together, this pattern suggests that, in contemporary Taiwan, valuing work–family balance functions as a generally pro-family orientation rather than a distinctly gender-specific driver of marriage intentions.

Figure 1 offers additional insight into how individual autonomy is linked to marriage intentions by gender. Among women, the predicted probability of unwillingness to marry is relatively high and remains fairly stable across levels of individual autonomy, suggesting that structural and normative constraints surrounding marriage and caregiving may depress women's willingness to marry regardless of their personal endorsement of egalitarian values. Among men, by contrast, unwillingness to marry increases markedly as individual autonomy rises. In other words, when men hold more egalitarian and

autonomy-oriented gender attitudes similar to those of women, their reluctance to marry converges toward women's level.

Rather than contradicting McDonald's (2000) gender equity framework or the gender revolution perspective, this pattern appears consistent with a context of "incongruent" or incomplete gender equity: equality has advanced more rapidly i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than in the gendered organization of family life. In Taiwan, men still confront strong expectations to be the primary economic providers, to conform to long and inflexible working hours, and to assume obligations toward both natal parents and in-laws. For autonomy-oriented men, entering marriage may therefore be perceived as locking them into a demanding provider role that is difficult to reconcile with their desire for self-direction and work-life control. For women, anticipated concentration of housework and care responsibilities, potential career penalties, and the need to manage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duties make marriage appear structurally costly across autonomy levels. Under such conditions, men and women who strongly endorse egalitarian ideals may view the current marriage institution as mismatched with their expectations for a fair division of paid and unpaid work and intergenerational obligations, and therefore be less inclined to enter marriage. Our findings thus align more closely with the notion of a stalled or incomplete gender revolution in the family sphere than with the optimistic expectation that more egalitarian attitudes will straightforwardly reinvigorate marriage.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k-family balance findings point to potential

policy levers. If marriage is perceived as a setting where equality and autonomy are hard to realize, reforms that lower the structural costs of combining paid work and family care become crucial. Expanding affordable, high-quality childcare, strengthening parental leave schemes with meaningful incentives for fathers' uptake, and promoting workplace flexibility and reasonable working-time regulations would reduce the perceived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egalitarian values and actual family arrangements. Such policies could ease women's anticipated care burden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e it more feasible for autonomy-oriented men to envisage an egalitarian partnership within marriage. In the long run, these changes may help transform egalitarian and autonomy-oriented attitudes from forces that currently discourage marriage into resources that support more sustainable and mutually supportive unions.

Under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ibaut & Kelley, 1959; Blau, 1964), individuals compare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marriage against available alternatives. Where gender norms still assign women a larger share of housework and caregiving, the *cost side* of marriage remains salient, particularly for women seeking continued career development—helping explain why higher autonomy predicts lower marriage intentions. Social exchange theory's comparison level for alternatives further clarifies why some respondents prefer singlehood or cohabitation: when career advancement, financial security, and personal fulfillment are attainable outside marriage, the relative utility of marriage declines (Oppenheimer, 1994).

Our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 that female careers and family formation are not inherently incompatible, provided that institutions support work–family reconciliation (McDonald, 2000). At the same time, male adaptation to women’s new roles remains essential for aligning partnership, parenthood, and employment (Esping-Andersen & Billari, 2015; Goldscheider et al., 2015).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dapt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well-educated and employed women are more likely to delay marriage or remain unmarried.

As Ridgeway and Correll (2004) note, persistent patriarchal norms, unequal resource distributions, and cultural beliefs produce gendered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consistent with prior research, women typically exhibit more egalitarian views than men (Baber & Tucker, 2006; Glick & Fiske, 2001). In our study, men express higher agreement with motherhood centrality, gender-role segregation, and work–family balance than women, whereas women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individual autonomy. Divergence in attitudes may reduce the perceived feasibility of equitable marriages and thereby discourage family formation; conversely, convergence could facilitate what some have called a “second wave” of the gender revolution within families. Although we did not directly test whether discrepant marital expectations drive Taiwanese women’s reluctance to marry, this remains a promising avenue for future research.

Despite the study’s contributions, several limitations merit note. First, the cross-sectional design precludes strong causal inference regarding the effects of gender-role attitudes on marriage intentions, and reverse causality is plausible (e.g., individuals already inclined to marry may subsequently adjust their attitudes), thereby raising endogeneity concern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dopt longitudinal designs—such as population panel surveys, cross-lagged structural models, or natural experiments (e.g., policy shocks)—to establish temporal ordering and strengthen causal claims. Second, period-specific shocks in the survey year (e.g., COVID-19, shifts in labor demand, or policy reforms) may influence both attitudes and intentions. Incorporating period

controls or analyzing repeated cross-sections would help disentangle period effects from cohort effects. Third, our focus on “marriage intention” may understate the salience of cohabitation and prolonged singlehood as viable alternatives; subsequent studies should explicitly model competing risks (marriage vs. cohabitation vs. continued singlehood) and assess the perceived attractiveness of these alternatives. Fourth, the analysis relies on a binary view of gender and conventional family forms; future work should incorporate gender diversity and plural family arrangements to mov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male-breadwinner/female-homemaker model. Finally, intentions do not always translate into behavior; linking survey responses to administrative marriage registrations or conducting follow-up waves would enable assessment of intention realization and the timing of transitions.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between genders

Variable	Full never-married subsample n (%)	Analytic sample n (%)	Difference (%)
Gender			
Male	1104 (58.3%)	1013 (59.1%)	+0.8
Female	790 (41.7%)	701 (40.9%)	−0.8
Age group			
27–30	514 (27.1%)	466 (27.2%)	+0.1
31–40	1175 (62.0%)	1062 (61.9%)	−0.1
41–50	205 (10.8%)	186 (10.9%)	+0.1
Relational status			
Never in a relationship	530 (28.5%)	483 (28.2%)	−0.3
Once had a relationship	728 (39.1%)	659 (38.4%)	−0.7
Now have a relationship	604 (32.4%)	572 (33.4%)	+1.0
Educatio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below	34 (1.8%)	34 (2.0%)	+0.2
Senior high school	317 (16.8%)	298 (17.4%)	+0.6
Junior college	126 (6.7%)	113 (6.6%)	−0.1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534 (28.3%)	485 (28.3%)	0.0
College and above	876 (46.4%)	784 (45.8%)	−0.6

Table 2. Factor analysis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Item	Factor loading		
	Motherhood responsibility	Individual autonomy	Balance of work-family
b. Having a working mother may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young children who have not yet started elementary school.	.626	.167	-.271
c. Overall, a wife having a full-time job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family life.	.679	.049	-.254
d. Having a job is beneficial, but most women ultimately aspire to have a home and children.	.728	.042	.355
i. During economic downturns, female employees should be dismissed before male employees.	.635	-.084	-.025
j. The husband's primary responsibility is to earn a living, while the wife's role is to manage the household.	.771	-.080	.160
f. The best way for a woman to achieve independence is through employment.	.092	.832	-.007
g. If both spouses are employed, household chores should be shared equally.	-.210	.763	.081
h. A man can be well-suited for managing household responsibilities instead of working outside the home.	-.446	.622	.045
a. A working mother can establish a warm and secure relationship with her child, just as a stay-at-home mother can.	-.188	-.003	.676
e. Being a homemaker is just as fulfilling as having a paid job.	.158	.062	.767

Table 3. Marriage intentions by gender, age, relationship status, and education

	Marriage intention			Total
	Yes	No	Not sure	
Gender				
male	593 (58.5%)	334 (33.0%)	86 (8.5%)	1,013
female	282 (40.2%)	311 (44.4%)	108 (15.4%)	701
Age				
27-30	264 (56.7%)	144 (30.9%)	58 (12.4%)	466
31-40	549 (51.7%)	391 (36.8%)	122 (11.5%)	1,076
41-50	63 (33.7%)	110 (58.8%)	14 (7.5%)	187
Relational status				
Never in a relationship	191 (39.5%)	224 (46.4%)	68 (14.1%)	483
Once had a relationship	299 (45.4%)	293 (44.5%)	67 (10.2%)	659
Now have a relationship	385 (67.3%)	128 (22.4%)	59 (10.3%)	572
Education				
Junior high school -	12 (35.3%)	22 (64.7%)	0 (0.0%)	34
Senior high school	139 (46.6%)	140 (47.0%)	19 (6.4%)	298
Junior college	50 (44.2%)	55 (48.7%)	8 (7.1%)	114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42 (49.9%)	177 (36.5%)	66 (13.6%)	489
College+	432 (55.1%)	251 (32.0%)	101 (12.9%)	799
Total	875 (51.1%)	645 (37.6%)	194 (11.3%)	1,714

Table 4. The t-tests of the gender role attitudes for marriage intention

	Marriage intention			<i>F (df)</i>
	Yes	No	Not sure	
	<i>M (SD)</i>	<i>M (SD)</i>	<i>M (SD)</i>	
Motherhood responsibility	2.26 (.69)	2.21 (.70)	2.06 (.67)	6.59 (2, 1711)**
Balance of family-work	4.05 (.65)	3.97 (.66)	3.98 (.66)	3.38 (2, 1711)*
Individual autonomy	4.00 (.69)	4.12 (.70)	4.07 (.67)	5.82 (2, 1711)**

	Marriage intention OR (95% CI for OR)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Gender role attitudes			
Motherhood responsibility	1.00 (.87-1.16)	0.99 (0.64-1.09)	0.96 (0.59-0.94)
Balance of work-family	0.80 (.69-.93)**	0.82 (0.73-0.92)*	0.81 (0.64-1.03)
Individual autonomy	1.32 (1.14-1.53)***	1.28 (1.11-1.31)*	1.21 (0.97-1.50)
Gender (ref: male)			
Female		2.11 (1.64-2.72)***	3.31 (0.35-31.15)
Education (ref: college+)			
Junior high school -		3.01 (1.43-6.34)**	3.04 (1.44-6.43)**
Senior high school		1.83 (1.33-2.53)***	1.84 (1.34-2.55)***
Junior college		1.58 (1.02-2.51)	1.59 (1.01-2.53)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35 (1.03-1.77)	1.36 (1.04-1.78)
Age (ref: 27-30 years)			
31-40 years		1.14 (0.84-1.55)	1.14 (0.84-1.55)
41-50 years		2.51 (1.67-3.76)***	2.50 (1.66-3.75)***
Financial satisfaction			
		0.96 (0.83-1.12)	0.96 (0.83-1.12)
Relational status (ref: in a relationship now)			
Never		3.60 (2.69-4.82)***	3.61 (2.69-4.83)***
Before		2.97 (2.27-3.89)***	2.97 (2.27-3.88)***
Interaction			
Motherhood responsibility by gender			1.04 (0.73-1.48)
Balance of work-family by gender			1.12 (0.80-1.57)
Individual autonomy by gender			0.79 (0.54-1.14)*
Constant	0.62	0.36	0.35
-2Log-likelihood	2068.63	1883.88	1881.92
χ^2	200.54 (<i>df</i> =3)***	265.11 (<i>df</i> =15)***	267.07 (<i>df</i> =18)***
Nagelkerke R^2	.10	.21	.21

Table 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ender role attitudes, demographic profiles, and marriage intention

Note. OR > 1 indicates higher odds of being in the focal category (“Yes” or “Not sure”) relative to “No.”

CI = confidence interval; OR = odds ratio.

Model 1 = gender-role-attitude variables only. Model 2 = Model 1 + financial satisfaction, education, age, and relationship status. Education reference category = university and above. Age reference category = 41–50 years. Relationship-status reference category = currently in a relationship.

† $p < .10$; $p < .05$; ** $p < .01$; *** $p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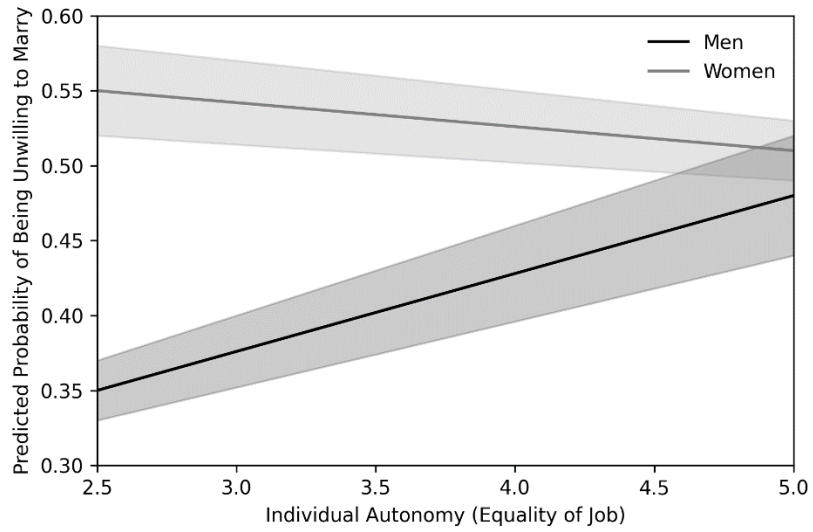


Figure 1. Interaction of gender and attitude toward individual autonomy

Author Contributions: The author confirms being the sole contributor of this work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Statement: The analyses reported here use secondary, de-identified data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 Wave 2020. The original data collection was approved by the Academia Sinica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AS-IRB) AS-IRB-HS-15014_v.10 (2020).

Data Availability Statement: The data supporting this study's findings are available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 (https://psfd.sinica.edu.tw/V2/?page_id=955&lang=en).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Baber, K. M., & Tucker, C. J. (2006). The Social Roles Questionnaire: A new approach to measuring attitudes toward gender. *Sex Roles*, 54(7–8), 459–467.
<https://doi.org/10.1007/s11199-006-9018-y>
- Becker, G. S. (199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Enlarge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llani, D., Esping-Andersen, G., & Nedoluzhko, L. (2017). Never partnered: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lifelong singlehood. *Demographic Research*, 37, 53–100.
<https://doi.org/10.4054/DemRes.2017.37.4>
- Bianchi, S. M., Sayer, L. C., Milkie, M. A., & Robinson, J. P. (2012). Housework: Who did, does or will do it, and how much does it matter? *Social Forces*, 91(1), 55–63.
- Blau, P. M. (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Wiley.
- Bolzendahl, C. I., & Myers, D. J. (2004). Feminist Attitudes and Support for Gender Equality: Opinion Change in Women and Men, 1974-1998. *Social Forces*, 83(2), 759–790. <https://doi.org/10.1353/sof.2005.0005>
- Brinton, M. C. (Ed.). (2001). *Women's working lives in East As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eng, Y. H. A. (2014). Changing partner choice and marriage propensities by education in post-industrial Taiwan, 2000–2010. *Demographic Research*, 31(33), 1007–1042. <https://doi.org/10.4054/DemRes.2014.31.33>

Davis, S. N., & Greenstein, T. N. (2009). Gender ideology: Components, predictors, and consequ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5, 87–105.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070308-115920>

England, P. (2010). The gender revolution: Uneven and stalled. *Gender & Society*, 24(2), 149–166. <https://doi.org/10.1177/0891243210361475>

Esping-Andersen, G., & Billari, F. C. (2015). Re-theorizing family demograph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1(1), 1–31. <https://doi.org/10.1111/j.1728-4457.2015.00024.x>

Executive Yuan, Department of Gender Equality. (2021). *Gender at a glance 2021*. Retrieved November 5, 2025, from <https://gec.ey.gov.tw/File/EDE239884E64EA13>

Executive Yuan,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GBAS). (n.d.). *Survey on social development trends: Housework sharing*.

Retrieved November 5, 2025, from

https://ws.dgbas.gov.tw/win/dgbas03/ca/eng_social/analysis93.htm

Fuwa, M. (2004). Macro-level Gender Inequality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in 22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6), 751–

767. <https://doi.org/10.1177/000312240406900601>

Glick, P., & Fiske, S. T. (2001). An ambivalent alliance: Hostile and benevolent

sexism as complementary justifications for gender inequ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2), 109–118.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6.2.109>

Goldscheider, F., Bernhardt, E., & Lappegård, T. (2015). The gender revolution: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hanging family and demographic behavi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1(2), 207–239.

<https://doi.org/10.1111/j.1728-4457.2015.00045.x>

Goldscheider, F. K., & Goldscheider, C. (1992). Gender roles, marriage, and

residential independence. *Sociological Forum*, 7(4), 679–

696. <https://doi.org/10.1007/BF01112321>

Hagqvist, E., Gillander Gådin, K., & Nordenmark, M. (2017).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well-being across Europe: The role of gender context.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32(2), 785–797.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16-1301-x>

Hochschild, A. (2012).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Rev. ed.). Penguin.

Homans, G. C. (1958). 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3(6), 597–606.

Inglehart, R., & Norris, P. (2003). *Rising tide: Gender equality and cultural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550362>

Jalovaara, M., Neyer, G., Andersson, G., Dahlberg, J., Dommermuth, L., Fallesen, P., & Lappegård, T. (2019). Education, gender, and cohort fertility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35(3), 563–586.

<https://doi.org/10.1007/s10680-018-9492-2>

Kaufman, G. (2000). Do gender role attitudes matter? Family formation and dissolution among traditional and egalitarian men and wome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1(1), 128–144.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00021001006>

Knight, C. R., & Brinton, M. C. (2017). One egalitarianism or several? Two decades of gender-role attitude change in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2(5), 1485–1532. <https://doi.org/10.1086/689814>

Kolpashnikova, K., Zhou, M., & Kan, M.-Y. (2020). Country differences in the link between gender-role attitudes and marital centrality: Evidence from 24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61(5), 291–309. <https://doi.org/10.1177/0020715220985922> JSTOR

Lee, M.-L., Yang, Y.-C., & Yi, C.-C. (2000).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Employment reality or egalitarian ideology.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4, 59–99.

Lomazzi, V., & Seddig, D. (2020). Gender role attitud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Cross-national comparability and relationships to cultural value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54(4), 398–431. <https://doi.org/10.1177/1069397120915454>

Lu, Y.-H. (2011). Changes in gender-role attitudes in Taiwan, 1991–2001.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8, 51–94.

Mason, K. O., & Lu, Y. H. (1988). Attitudes toward women's familial roles: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5. *Gender & Society*, 2(1), 39-57.

McDaniel, A. (2008). Measuring gender egalitarianism: The attitudinal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38(1), 58–80.

<https://doi.org/10.2753/IJS0020-7659380103>

McDonald, P. (2000). Gender equity in theorie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6(3), 427–439. <https://doi.org/10.1111/j.1728-4457.2000.00427.x>

McHugh, M. C., & Frieze, I. H. (1997). The measurement of gender-role attitudes: A review and commentary.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1(1), 1–16. <https://doi.org/10.1111/j.1471-6402.1997.tb00097.x>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Departmen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istics data analysis*. Retrieved November 5, 2025, from <https://www.ris.gov.tw/app/en/>

Oppenheimer, V. K. (1994). Women's rising employ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famil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2), 293–342. <https://doi.org/10.2307/2137521>

Oppenheimer, V. K., & Lew, V. (1995). Marriage formation in the eighties: How important was women's economic independence? In K. O. Mason & A.-M. Jensen (Eds.), *Gender and famil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pp. 105–

138). Clarendon Press.

Raymo, J. M., Park, H., Xie, Y., & Yeung, W. J. J.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471–492.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073014-112428>

Raymo, J. M., Park, H., Xie, Y., & Yeung, W.-J. J.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471–492.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073014-112428>

Ridgeway, C. L., & Correll, S. J. (2004). Unpacking the gender syste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gender beliefs and social relations. *Gender & Society*, 18(4), 510–531. <https://doi.org/10.1177/0891243204265269>

Rindfuss, R. R., Choe, M. K., & Brauner-Otto, S. R. (2016). The emergence of two distinct fertility regimes in economically advanced countrie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5(3), 287–304. <https://doi.org/10.1007/s11113-016-9387-z> paa2015.populationassociation.org

Takeuchi, M., & Tsutsui, J. (2016). Combining egalitarian working lives with traditional attitudes: Gender role attitudes in Taiwan, Japan, and Ko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25(1), 100–116.

<https://doi.org/10.1111/ijjs.12039>

Thibaut, J. W., & Kelley, H. H. (1959).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roups*. Wiley.

Thornton, A., & Lin, H.-S. (1994).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in Taiw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rnton, A., & Young-DeMarco, L. (2001). Four decades of trends in attitudes toward family iss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1960s through the 1990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3(4), 1009–1037.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1.01009.x>

Tsuya, N. O. (2015). Below-replacement fertility in Japan: Patterns, factor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 R. R. Rindfuss & M. K. Choe (Eds.), *Low and lower fertility: Variations across developed countries* (pp. 87–106).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21482-5_5

Xu, X., & Lai, S.-C. (2002). Resources, gender ideologies, and marital power: The case of Taiwa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3(2), 209–245.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X02023002003>

Yang, C., Weng, K., & Renn, S. (2020). Does Taiwan have a gender revolution? Assessment based on gender role attitude, housework division and marriage

matching. *Athen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7(3), 165–184.

<https://doi.org/10.30958/ajss.7-3-2>

Yu, J., & Xie, Y. (2015). Changes in the determinants of marriage entry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 *Demography*, 52(6), 1869–1892.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5-0432-z>

「琉璃」詞彙競爭探究

周碧香^{3*}

摘要

本文以漢語外來詞「琉璃」為研究對象，結合語言生態學與詞彙競爭理論，探討其在漢語中由多重譯名並存走向單一詞形定型的歷時演變機制。研究採用「雙典平行分析法」(Dual-Canon Parallel Analysis)，以漢文佛典與中土傳世文獻為兩套功能有別而相互滲透的語料系統，透過文本計量分析，系統檢索並統計歷代「琉璃」相關異形詞的用例數與典籍數，建構詞形密度與使用強度等指標，量化比較其在不同語體與歷史時段中的分布與競爭態勢。

研究結果，「琉璃」詞彙演變呈現清晰的歷時分工：佛典語體在魏晉隋唐時期扮演詞形創新的主要場域，衍生出大量多音節新音譯詞，形成高度多樣且競爭激烈的詞彙生態；中土文獻則自較早階段即展現詞形收斂趨勢，長期以「琉璃」與「瑠璃」為核心，並最終確立「琉璃」為主流形式。密度與強度指標顯示，佛典之高峰出現較早，而中土文獻於宋元以降在使用集中度與優勢程度上反超佛典，標誌該詞由宗教專門語轉化為世俗通用詞彙，完成語體擴散與詞彙標準化。

進一步分析，「琉璃」之所以在競爭中勝出，關鍵不在音譯精確度，而在其高度的形—音—義整合：雙音節結構符合漢語韻律，「玉」部構形清楚標示珍寶語義，兼具語義透明度與文化象徵性，因而在漢字系統的過濾機制中取得優勢。本文證實，「琉璃」的定型歷程具體展現外來詞在漢語中「多重補位—競爭—篩選—定型」的演化模式，並顯示語體分工與書寫系統在詞彙演變中的關鍵作用，為漢語外來詞研究提供可複製的量化分析範式。

關鍵詞：琉璃、詞彙競爭、雙典平行分析、外來詞、漢字過濾機制

³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通訊作者(E-mail: jilljbs@mail.ntcu.edu.tw)(民國 114 年 11 月 5 日收件，民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修改，民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接受)

壹、前言

詞彙之歷時演變深刻反映了語言接觸與互動的複雜機制；其中，外來詞的譯介、適應及其競爭動態，尤具學術探究價值。其語形變異往往經歷從多重譯名並存競爭，最終趨向單一詞形穩定化或定型的歷時過程，不同詞彙的興衰起伏反映著語言社群對外來概念的認知與定位。詞彙選擇受語音傳譯便利性等內部因素，以及文化認知和社會需求等外部因素共同制約。考察漢語外來詞的詞彙競爭動態，有助於揭示漢語如何通過內部語用與外部文化調適，最終實現語詞系統的穩定與整合。

「琉璃」即是典型的研究個案。需先敘明的是，本文所探討之『琉璃』，在古漢語語境中多指涉青色寶石或不透明之彩釉意象（Polychrome Glazed Pottery），與現代漢語中指稱透明矽酸鹽材質的『玻璃』概念雖有交涉，但核心語義與指涉範疇存有顯著差異。本研究聚焦於『琉璃』一詞及其異形詞群在歷史語境下的演變，而非材料學上的物質考證。受限於漢譯佛典之底本來源、譯師方言背景及音譯策略之多元性，『琉璃』一詞在譯介過程中衍生了數量龐大且形式紛呈的異形詞。

本文聚焦於「琉璃」的研究，思考如下問題：（一）雙典詞形分布差異，詞形在佛典與中土文獻中的分布有何差異？（二）歷時競爭態勢，不同詞形的競爭態勢如何隨歷史時期演變？（三）音譯策略與漢字構形，音譯策略如何影響詞形的產生與存續？漢字的形義特徵在競爭中扮演何種角色？（四）社會文化因素，如佛教影響力變遷、中外交流狀況、世俗物質文化的發展等，如何作用於「琉璃」詞彙的競爭格局？凡此諸多問題，亟待深入探討。

貳、理論與文獻回顧

本章旨在闡述外來詞譯名、詞彙競爭與語言生態學之理論基礎，並梳理「琉璃」相關之既有研究成果。

一、外來詞譯名與詞彙競爭、語言生態理論外來事物之傳入，往往衍生「異名同實」（Synonyms）的多重譯名現象，即以相異的語言形式指稱同一概念。譯名興衰變化，既反映語言使用者對外來事物的認知與評價差異，揭示語言系統的篩選邏輯及整合機制。因此，考察漢語外來詞的詞彙競爭動態，有助於揭示漢語經由語用與文化調適，最終實現語詞系統的穩定與整合。例如，唐代「茶」兼有「荼」、「茗」等異名，最終「茶」成為主流（汪鋒、魏久喬 2017）；同樣，「葡萄」曾與「蒲陶」等異譯形式並存同行。

佛教的傳入是漢語大量借入外來詞彙的重要契機。自東漢至唐宋時期，梵漢對音譯語的創造極大豐富漢語詞彙。許多外來詞在佛典與世俗文獻並行出現，形成獨特的語料

來源。然而，對於同義譯名間的競爭歷程與語體差異所引發的詞彙偏好轉變，以及譯名競爭過程的量化分析，目前仍較為缺乏具體的個案研究。

劉善濤（2017）提出了「外來異名同實概念詞分佈」的研究框架，然其主要關注近現代外來詞。就佛典譯名競爭與語體差異導致的詞彙偏好轉變而言，相關研究仍顯不足。

詞彙競爭理論指出同一概念不同詞形在傳播時彼此競爭，最終確立語言系的主流詞彙；其過程中受到語言內部結構與文化外部因素雙重影響，共同決定詞形的競爭優勢與存活能力。劉善濤（2017）「多重補位」理論，指出當漢語缺乏對應詞彙時，不同譯者基於個人理解與文化視角，以音譯、意譯等多方式進行補位命名。這些詞形在相互競爭，最終可能僅存一種形式成為主流。曾進興等（2006）將此現象界定為「詞彙競爭」（lexical competition），即多種語詞形式在語言理解與產出時同時被激活，發生競爭與被選擇的過程。

汪鋒（2020, 2021）指出詞彙競爭的結果與語體使用及文化期待密切相關，提出「漢字過濾機制」，指漢語書寫系統對外來詞具有選擇與淘汰功能。譯名的字形若能表義清晰、符合文化審美習慣，更具有競爭優勢。

Einar Haugen（1972）「語言生態學」（Language Ecology），探討語言與社會、文化及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視語言為生態系統，不僅是溝通工具，更是文化傳承與身份建構的重要媒介。強調語言多樣性對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了解語言競爭中強勢語言對弱勢語言的壓制，解釋了語言消亡的動因。

Sarah G. Thomason & Terrence Kaufman（1988）以歷史語言學視角分析語言接觸對語言演化的影響。將接觸誘發的語言變化劃分為詞彙借用、結構借用及語音改變三類。強調語言接觸結果受社會因素影響，包括權力結構、語言使用頻率及雙語者的中介作用。語言演化的非線性特徵，語言接觸能改變語言的演化路徑。

Salikoko S. Mufwene（2017）探討語言接觸、生態適應與語言選擇的作用，提出語言演化的生態學理論（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volution），主張語言變化受到文化、經濟及社會因素等外在生態，與語言體系即內在生態交互作用；即語言變化是語言使用者依著社會與文化需求選擇的結果。

這些理論提供分析「琉璃」不同譯名的競爭的框架，值得關注的問題包括多種譯名在語音忠實性、語義透明度及文化意涵等方面的差異，以及漢字構形影響競爭結果。

二、「琉璃」相關研究成果

學界對「琉璃」與「玻璃」的討論，主要聚焦於詞源考辨、指稱演變與工藝特質。多數研究認為，兩者皆源自梵文：前者多對應 *vaidūrya*（青色寶石），後者及其前身「頗黎」、「玻瓈」，對應 *sphatika*（水晶類透明寶石）（趙永 2013；柯亞先 2015；邱韻如 2022）。漢代文獻中所見「璧流離」以及《說文》所收「珎」，多被視為經絲路自西亞、中亞傳入的早期音譯痕跡（趙永 2013；孟暉 2021）。佛典語境下，為七寶中性質有別的兩種寶物，呈現相對嚴格的對譯意識。

然而，中土文獻用語中，兩者的指稱長期存在「錯位」與「混用」現象。漢唐以降「琉璃」兼指天然寶石與人造仿玉（趙永 2013）；唐代考古物證如何家村窖藏，顯示人造器皿多稱「琉璃」，而天然寶石則多歸為「頗黎」（孟暉 2021）。兩宋之後語義日益重疊，優質者趨向稱「玻璃」（邱韻如 2022）。同時，隨建築釉陶工藝發展，「琉璃」的概念外延至施釉陶瓷領域（任允鵬 2020）。直至清康熙設立「玻璃廠」與「琉璃廠」以區隔器物與建材，官方體系才形成明確的分野（柯亞先 2015）。

綜上所述，既有研究已對「琉璃」作為外來寶石、玻璃器與釉陶建材的性質有詳盡考證，但其指稱物界定仍因文獻混淆（如與「琅玕」之辨）而存有模糊空間。本文立基於前述成果，不再重複材料學考證，而是改從「詞彙競爭」與「雙典對比」視角切入，聚焦於同一概念下 59 種異形詞在佛典與中土文獻歷時分布與競爭軌跡，藉此補充既有研究在「同一詞彙、不同詞形」演化機制與實證上的缺口。

參、研究方法與語料來源

本研究採行「雙典平行分析法」，運用文本計量分析（textual quantitative analysis），以「漢文佛典」與「中土傳世文獻」兩套異質語料庫為平行樣本，進行歷時與語體的量化對比，以探討「同一概念、異詞形」之詞彙競爭機制。茲將具體步驟與技術細節說明如下。

一、語料來源與資料庫版本

佛典語料採用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發行之《CBETA 電子佛典集成》（2016 年版），涵蓋大正藏、續藏經等主要漢譯佛典。

中土文獻則以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為主要檢索平臺，輔以「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等開放文本庫，涵蓋經、史、子、集各類歷代傳世典籍。

二、數據處理流程與技術工具

本研究先綜合理據書、佛經音義書、相關辭書與預備檢索結果，彙整出同指「琉璃」概念之 59 種異形詞（佛典 57 種、中土文獻 19 種，部分重疊），作為檢索詞目。其後依序進行下列步驟：

（一）檢索與判讀：利用 CBETA 與「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之關鍵詞檢索功能，視需要輔以批次檢索腳本，擷取各詞形在兩大語料庫中的所有用例。為確保數據信度，研究者人工判讀檢索結果，排除如「流離失所」中之「流離」等非指涉寶石或玻璃語義之同形異義項。排除重複與異文：剔除因版本重刊、彙編重複收錄所致之冗餘數據。

(二)時代劃分：參照通行的歷史分期，將每一典籍及其用例依原資料庫標記，歸入「漢魏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四個歷史時段，以觀察各詞形在宏觀歷時軸上的分布與變化。

(三)定量指標計算：運用 Excel 樞紐分析及統計函數，分別計算各詞形在不同時段、不同語體中的「用例數」（例數）與「典籍數」（文獻覆蓋率），並進一步推算兩項核心指標：（1）密度＝同一時段內某語體之用例數 / 典籍數，用以衡量該詞形在該語體中的使用集中度；（2）強度＝某詞形用例數 / 同時段、同語體中所有「琉璃」相關詞形之總用例數，用以衡量其在整體詞形系統中的相對優勢。本文據此評估各詞形在雙典中的詞彙競爭態勢與優勢程度。

(四)數據視覺化：將上述結構化數據繪製為統計圖表，包括典籍數與用例數變化圖、詞形分布圖及歷時比例圖（見圖 1-圖 5），以視覺化方式呈現「雙典」在詞彙選擇上的分布差異與競爭演變。

三、統計規模與樣本概況

經檢索與清理後，佛典語料共計 57 種詞形、1,289 部典籍、9,491 例用例；中土文獻則為 19 種詞形、733 部典籍、5,222 例用例。兩者合計涵蓋 59 種詞形、2,022 部典籍、14,713 例用例。此一樣本規模，為探討「同一詞彙、不同詞形」在佛典與中土文獻中之歷時競爭與標準化機制，提供了相對穩固且可量化的實證基礎。

肆、「琉璃」於雙典之總體表現

本節概述「琉璃」在雙典中的整體分布與使用趨勢，並提出綜合觀察。

一、從佛典主導到世俗繁榮

圖 1 具體呈現「琉璃」在雙典分布上之典籍數與用例數總體趨勢。歷時維度呈現出清晰的動態轉變：

魏晉至唐五代堪稱佛典之「黃金時代」，用例數達到峰值（單時期超過 2000 例）遠超中土文獻。

宋元明佛典用量趨於平穩或略降，而中土文獻的典籍數和用例數開始持續增長。明清兩代，中土文獻之典籍數首度超越佛典，反映宋代以降佛教社會影響力之消長與調整，以及大規模譯經活動之趨緩；「琉璃」逐漸滲透到世俗文化中而增加用例。

清代中土文獻用例數激增（2427 例），首次大幅超越佛典（1201 例），標誌著「琉璃」已從主要作為宗教詞彙轉向世俗常用詞彙。此一趨勢與清代社會經濟發展、物質文化繁榮以及文學創作的世俗化趨勢密切相關。

二、集中度與擴散度的變遷

本文以「詞形密度」指標（用例數 / 典籍數），衡量詞形之使用集中程度；採用「使用強度」指標（用例數 / 總詞形數），衡量某一詞形在整體系統中的相對優勢，雙典詞形之歷代密度與強度數據，彙整如表 1 所示。

（一）密度

中土文獻密度變化趨勢，基本上維持平穩且持續上升，反映詞彙被接受與吸收的進程。兩漢的 5 詞全是古音譯，密度僅為 3.2，侷限於零星文獻；魏晉南北朝時期詞目不多，但仍均為古譯詞，密度已升至 5.0。隨後至隋唐五代（6.7）及宋遼金（6.0），中土文獻漸次接納新音譯詞，密度逐步追近佛典，反映出佛教詞彙在中土語體已具有穩定傳播力。明清，分別上升至 7.1 與 8.1，超越了佛典，標誌著「琉璃」詞形等已完成高度內化與標準化，進入詞彙定型階段。

佛典密度變化方面，東漢時擇用 3 個漢語原有的古音譯詞，密度為 5.3；該密度值在魏晉南北朝達到高峰（9.9），顯示此一時期譯經活動最為頻繁，詞彙使用集中且典籍數量相對充足。隋唐五代至宋遼金，密度略降至 6.5 與 6.2，顯示儘管詞形大量出現，但分布較為分散；元代以後密度趨於穩定，明代再度上升至 9.0，反映詞彙重複使用率增加，清代則略降至 7.9。佛典之詞形密度呈現「高峰—調整—回穩」之三階段演變格局，體現了譯經活動由創新轉向內部化與定型的過程。

雙典密度的歷時對比，顯示佛典主導接納古音譯詞，再創新構成多樣詞形，漸趨於中土主導與語體融合的動態演變過程。密度指標的變化，不僅揭示了佛教詞彙的歷時擴散軌跡，反映語言系統內部的過濾與定型，促成語言共時形態穩定。

（二）強度

佛典方面，魏晉南北朝達到最高點（131.8），譯經語體於該階段雖已出現 19 種詞形，用例高度集中於部分核心詞，尚未形成全面擴散。隋唐五代詞目數（37）進入音譯詞形多樣化的歷史之最，用例分散導致強度下降（62.7）。宋遼金至清代呈現穩定發展趨勢，強度維持在 60 上下，反映譯詞運用逐漸收斂於少數較具文化辨識度與語音穩定性的詞形。佛典語體呈現「創新初期集中—中期多樣分化—後期穩定收斂」的演變軌跡，語言功能上著重於翻譯與音譯實驗，詞形較為多樣。

中土文獻強度變化更具指標性地揭示了語體標準化進程。兩漢至隋唐時期的強度值均低於 50，顯示佛典詞彙僅零星進入漢語語體系。然而，自宋遼金以後，清代強度更高達 186.7，為歷代之最。此數據說明，中土語體已完成對佛典詞形的擇選與內化過程，僅保留少數語音通順、文化適應度高者作為語言常項。中土語體則展現出「早期稀疏—中期採納—後期定型」的歷程，詞彙強度隨時代累積而日益上升，體現出文化過濾與語言內化的趨勢。

雙典對比顯示，佛典的密度與強度高峰皆偏早，主導了詞形的創造與早期擴散；中土文獻則在後期密度與強度相繼超越佛典，成為詞彙穩定與社會接受的主要場域。佛典可視為創新輸出者（innovator），中土文獻則為篩選過濾者（selector），其發展模型可概括為「多樣創新→語體篩選→詞彙定型」。

三、雙典詞形歷時傳播

漢代以來「琉璃」相關譯名計 59 個，包括 21 個古音譯詞和 38 個新音譯詞。古音譯詞指佛經正式大規模譯介之前漢語已使用的譯名，或以仿此而造的譯名，以雙音節、三音節為主；新音譯詞則指翻譯佛典而衍生的多音節新譯名。琉璃 59 種詞形運用於雙典的歷時分布，請參見附錄一：雙典「琉璃」詞形時代分布表，歸納大體有如下趨勢：

（一）核心詞形的早期出現：核心詞「瑠璃」、「琉璃」、「流離」為核心，七個歷史時期（兩漢至清）皆見於佛典與中土文獻。「琉璃」（首見於《西京雜記》）和「瑠璃」（首見於《鹽鐵論》）在西漢晚期幾乎同時出現於中土文獻，稍晚也在東漢早期譯經中出現。可知，「琉璃」類物質及其稱謂在佛教大規模傳入前，已通過早期中外交流進入漢地，在漢代已被賦予這兩種寫法。中土採用偏多者如「璧流離」、「琉璆」、「琉離」等詞中土使用穩定，代表其詞義已廣為接受並脫離原始音譯語境。

（二）新音譯詞的集中湧現：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佛典出現，大量的異形詞，例如：「毘留離」、「嚧吠瑠璃耶」、「吠琉璃」、「吠瑠璃」、「毘琉璃」、「鞞琉璃」、「波流離」、「毗琉璃」、「毗琉璃」、「波瑠璃」、「薜琉璃」、「鞞頭梨」等等，顯示佛典扮演詞彙創新主導角色，佛經翻譯活動是「琉璃」詞形多樣性的主要來源。還存在大量以「毘」、「吠」、「鞞」、「波」等表音字符開頭的多音節詞形，這些詞形往往更為貼近源語言，其中有 40 個為佛教專用，甚至有 18 個僅見於一部佛典，此現象乃譯師的嘗試手法，同時突顯若干詞流傳受限困境。

總體而言，新創詞數量以佛典佔優，而詞形在語體間的接納度則以中土文獻較強：佛典中共出現 50 個首次創制詞形，如「毘流勒」、「毗流離」、「鞞瑠璃」、「普毘琉璃」、「鞞頭梨」、「鞞稠利夜」等，這些詞形帶有明顯的譯音痕跡；另有模仿古音譯詞而來的雙音節詞，如「流璃、溜璃、留離、瑠離、琉離、琉璆」，以及「璃琉、璃璆、璃瑠」的易序詞和重疊詞「璃璃」等，充分展現譯師在語言上的創造和調整。中土文獻衍生了 9 個新詞，其中 7 個被佛典接納運用，換言之，中土文獻所創詞有 77% 被接納，尤其以兩漢所創的「琉璃、瑠璃、流離」3 詞為代表。中土文獻接納來自佛典的「吠琉璃、餘琉璃、璃璃」等 10 詞，佔佛典所創詞總數的 20%。由此可見，佛典的創造力強，而中土文獻的詞形被接納度高。

古音譯詞歷時性廣泛、使用穩定，是中土語體語彙吸納的主力；新音譯詞則顯示佛教語體高度詞形創造能力，亦反映翻譯時代之語言策略與宗教需求。

四、雙典詞形匯整

歸納雙典運用「琉璃」59 個詞形，以下先依運用的文獻分類，同類中再依音節數由少而多排列，並統計同音節數者標示數量於括弧（）之內，對照於表 2：

佛典共有 57 個詞形、中土文獻運用 19 個詞形，合計 59 個詞形。其中，僅用於佛典者有 40 詞，佔總數 67.8%；中土獨有者 2 詞，佔 3.4%；雙典共用者 17 詞，佔 28.8%。雙典共用詞形中，有 7 詞被標註底線（6 個雙音節、1 個三音節），這些詞形是中土文獻新生而佛典繼承者；其餘 10 個則為佛典新創而中土文獻襲用者。

從音節數來看，雙音節計 15 詞佔總數 25.4%，其中 5 詞佛典獨用、10 詞共用於雙典；三音節計 34 詞佔總數 57.6%，包含 25 詞獨有於佛典、7 詞雙典皆用、2 詞僅用於中土文獻；四音節共 8 詞佔 13.6%，只見於佛典；五音節 2 詞佔 3.4%，單用於佛典。可知雙典「琉璃」整體以三音節為主體、雙音節者次之，四音節、五音節詞並未被中土文獻接納。

從文獻類型觀之，佛典 57 個詞形，雙音節 15 個、三音節 32 個、四音節 8 個、五音節詞 2 個，以三音節主體；中土文獻 19 個詞形，雙音節 10 個、三音節 9 個，平分秋色。佛典獨用類以多音節詞為主，25 個三音節詞居冠、8 個四音詞次之、5 個雙音節詞列三、2 個五音節居末，合計 40 詞，是「琉璃」詞形最豐富的區塊，顯示佛經翻譯時對應原始梵語（或巴利語）詞的多種音譯，如字形替代「琉璃」有時寫作「瑠璃」，又有「流離」、「瑠離」、「留璃」等書寫詞形。

茲分析 59 個詞形所使用的漢字結構，其中連用三個「玉」部字者有「玼琉璃」、「碧琉璃」、「碧瑠璃」及「璧琉璃」4 詞；運用兩個「玉」部字 30 詞，如「琉璃」、「琉璣」、「琉璫」、「瑠璃」、「瑠璣」、「璃瑠」、「璃琉」、「璃璃」、「璃璣」等；單用「玉」部字者 10 詞，如「琉離」、「毗留璃」、「毗琉離」、「瑠離」等，合計含「玉」部字者 44 詞。含「水」部字者 16 詞，連用者有「波流離」、「波流黎」、「波流梨」3 詞；單用者 13 詞，如「流離」、「毗流勒」等，其中 7 詞乃「水」、「玉」部字字連用，如「溜璃」、「吠琉璃」、「波瑠璃」、「碧流離」、「璧流離」等。而如「留離」、「留黎耶」、「毗留離」、「毗頭梨」、「鞞稠利夜」等 6 詞既無「玉」又無「水」。

綜上所述，「玉」部字詞形佔 74.57%，尤其是含有兩個（含）以上「玉」部字者佔總詞數 57.63%。因此，「玉」部字是記錄「琉璃」此物的用字主幹，代表著漢語對此物的接納，並將之與「玉」相比而重新標識。

總而言之，佛典是「琉璃」詞彙創生的主要源地，其音譯自由度高、詞形變異幅度大，反映了宗教翻譯語體的特殊語用學需求。中土文獻則透過文化與語言體系的過濾機制，逐步收斂詞形，以少數詞形構成語體常模。雙典對比清晰揭示了語體間的功能分工：佛典為創新語料的輸出者，中土文獻則為詞彙的擇選者，此種語言演化過程體現了「創新一競爭—篩選—定型」的動態模型。

伍、「琉璃」詞形的歷時競爭

詞彙競爭是動態歷程，非一蹴可幾。本文透過分析「琉璃」詞形在雙典中跨越不同朝代的比例變化，以及不同語體的歷時變化，以觀察詞彙競爭的具體軌跡。

一、核心詞在雙典運用比例

嘗試將圖 2 與圖 3 並列呈現，可清晰展示競爭的結果：佛典內部呈現「琉璃」與「瑠璃」雙雄並立、眾多小詞形環繞的局面；中土則呈現「琉璃」一統天下、「瑠璃」成為重要備選的格局。

佛典中「琉璃」(52%)與「瑠璃」(34%)合計佔總數約 85%，居於主導地位，但未達絕對優勢。其他重要詞形，如「毘琉璃」(5%)等，佔比極小。這再次表明佛典對音譯詞形的包容度較高，是音譯實驗的場域。

中土文獻「琉璃」以 83%一枝獨秀，「瑠璃」以 13%居次，兩者合計高達 96%；其他詞形如「碧琉璃」(2%)及更少見的變體(合計 2%)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表明在中土的實際語用中，對「琉璃」的稱呼高度統一於「琉璃」，其次是「瑠璃」。顯示在中土的實際語言運用中，詞形選擇趨於收斂和統一。

綜合來看，雙典的表現呈現出顯著差異，「琉璃」佛典 52% 對比中土 83%，在都過半的格局之中，佛典呈現較高的多樣性，中土文獻則表現出強烈的標準化。

佛典作為外來文化的主要載體，是「琉璃」多樣詞形的孵化器和早期主要使用場域；中土文獻則對詞形進行了篩選與過濾，最終使「琉璃」成為絕對主流。

二、佛典核心詞形的歷時競爭

圖 4 為「琉璃」核心詞不同時期，於佛典內競爭情形；不同色塊代表不同詞形運用的比例，比例變化，映射出譯經策略和語言接觸的內部動態。歸納重點如下：

(一) 秦漢的單一：僅見「琉璃」、「瑠璃」、「流離」3 詞，反映譯經早期如安世高、支婁迦讖等譯師傾向於選擇簡潔、已初具雛形的古音譯詞。

(二) 魏晉-隋唐的多樣化高峰：「瑠璃」的崛起：與「琉璃」形成激烈競爭，二者比例此消彼長。這可能與不同譯經流派重意譯與簡潔，玄奘的偏好有關，也可能反映了對源語言 *vaiḍūrya* 不同音節或音素的側重捕捉不同。音譯變體的湧現，如「毘琉璃」(可能對應 *vai-* 的聲母)、「吠琉璃」(可能對應 *vai-* 或 *ve-* 不同擬音)、「鞞琉璃」等。多樣化的詞形是譯師們努力貼近梵音的直接證據，但造成了用詞上的混亂，此時期可謂是詞形競爭的「戰國時代」。

(三) 宋元明清的整合：「琉璃」地位穩固回升，「瑠璃」穩定為第二選擇，其他音譯變體比例顯著下降。顯示隨著佛經翻譯事業的標準化、本土化以及漢語自身詞彙系統的演變，佛典內部出現詞形整合的趨勢。或許是後期佛典的創作與註疏更傾向於遵循既定用法；漢語雙音節詞的主導地位強化；逐漸確立「玉」部首詞形的文化優勢。

總體而言，佛典內部的詞形競爭，呈現「早期相對單一 → 中期（魏晉-唐）極度多樣化、競爭激烈 → 後期逐漸整合，核心詞形地位穩固，同時也保留部分多樣性」的演變路徑。

三、中土文獻核心詞形的歷時競爭

圖 5 為「琉璃」核心詞於中土文獻內競爭情形。歸納重點如下：

（一）「琉璃」絕對優勢：從漢代至清代，比例秦漢魏晉南北朝 65%，隋唐到宋遼金 70%，元明大於 75%，清朝達 90%，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和通用性。這種穩定性可能源於其早期（西漢）即被接受，可能被權威文獻（如《漢書》）採用，形成了強大的依憑。

（二）「瑠璃」的配角角色：作為結構最相似的變體，穩定佔據 10%-15%，證明其也被廣泛接受，始終未能挑戰「琉璃」的主流地位。兩者在雙典被視為可以互換的異體字，或許是「琉」字比「瑠」字，筆畫更簡便等原因，「琉璃」更受青睞。

（三）其他詞形的邊緣化：絕大多數源於佛典的音譯詞，在中土文獻中幾乎絕跡。如此，清晰地體現了中土語用環境對外來詞的篩選機制，過於冗長、使用生僻字、缺乏漢字文化意蘊（如無「玉」）的詞形，難以獲得社會性的廣泛認可。

中土文獻的詞形演變顯示出高度的穩定性和收斂性。「琉璃」的霸主地位從未受到實質性挑戰，「瑠璃」作為其最接近的「姊妹詞」伴隨左右，而其他源於佛典音譯的複雜詞形則很難進入主流的世俗語用。

四、核心詞用例舉隅

（一）琉璃

現今之標準詞形，最早見於《西京雜記》。

1.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腦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西漢·劉歆《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屬雜記體，記西漢宮廷軼事。此處描寫身毒國進獻的奢華馬具，以白玉、瑪瑙與「白光琉璃」組成，展現異域華麗感。顯示西漢時，人們視「琉璃」為珍稀的實物。「琉璃」於中土文獻總計運用 671 部典籍 4329 例。

東漢桓帝建和元年（西元 147）支婁迦讖首先擇此詞形。

2.其剎以三寶為梯陛——一者金，二者銀，三者琉璃——從忉利天下至閻浮利地。」（東漢·支婁迦讖譯《阿閼佛國經》）

《阿閼佛國經》描述阿閼佛淨土莊嚴景象的佛典經文，琉璃位列為「三寶」之一，描述佛國世界階梯的構造。語義上，「琉璃」脫離單純的裝飾物，轉化為構成「佛國莊嚴」的要素，象徵神聖空間的純淨與華美。

「琉璃」運用於 820 部佛典 4900 例。雙典總計共有 1491 部典籍 9229 例，典籍數

多、用例多，各朝代使用率最高，故是最強勢的詞形，最終成為此物的代表詞形。

（二）瑠璃

雙典最早的詞形，《鹽鐵論》最早運用。

1. 鼯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為國之寶。（西漢·桓寬《鹽鐵論》）

《鹽鐵論》是政論性文獻，記述漢代鹽鐵會議之辯論。文中將「瑠璃」與璧玉、珊瑚同列為「國之寶」，反映了在西漢官員眼中，琉璃屬於奢侈性外來商品，是社會階級與國家財富的符號，而非抽象比喻。

「瑠璃」運於中土文獻計 144 部 668 例。建和二年（西元 148）安世高至洛陽，譯經擇用之：

2. 闍維以竟，便於空中於四流泉來下灌身，水清且涼，其色如水精瑠璃之色。（東漢·安世高譯《阿那邠邸化七子》）

《阿那邠邸化七子》述佛教因緣故事，此例描寫火化後從空中湧出的清涼甘露之水。以「水精瑠璃之色」形容泉水的清澈透明與青藍光澤，營造超凡淨潔的視覺意象。藉由瑠璃透明、清澈的視覺特徵，傳達宗教上的清淨感與光明感。

「瑠璃」佛典計 681 部典籍 3194 例。雙典合計 825 部典籍 3862 例，各朝代均用，是為第二大詞形，最常見之異形詞。

（三）毘琉璃

1.（復次八十種小相）七十七者、髮青毘琉璃色。（後秦·鳩摩羅什《坐禪三昧經》）

《坐禪三昧經》列舉佛身「八十種小相」，屬格義化、條列式的教義說明。「毘琉璃」用以描寫佛陀髮色「青毘琉璃色」，指涉近似青藍寶玉的光澤標準，強調佛身相的超凡莊嚴與超出凡俗的色相規格，體現佛教詞彙對色彩描述的精細化。

毗琉璃，計用 65 部佛典 466 例，從魏晉南北朝至清各朝均運用，中土文獻未見，是佛典第三大詞形。

（四）碧琉璃

1. 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唐·鄭還古《博異志·陰隱客》）

《博異志》為志怪小說。以「碧琉璃色」形容仙境山石，指涉近乎透明、泛碧光的寶石般色彩，用以渲染仙境般的異界景觀。「碧琉璃」指涉對象從器物延伸至自然景觀的詩意描寫，反映唐代文學中琉璃詞彙的世俗化與文學化。

2. 師云：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唐·慧然集《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

《臨濟語錄》為臨濟宗祖師之機鋒語。此例語義高度抽象化與禪意化，「衝破碧琉璃」象徵澄淨無塵的定境或某種束縛，透過「衝破」之舉，展現禪宗破除執著、活潑生機的修行境界。

「碧琉璃」81 部中土文獻典籍 116 例、37 部佛典 48 例，雙典總計 118 部典籍 164 例，從隋唐至清雙典皆運用，是中土文獻的第三大詞形。

（五）流離

最早見於《漢書》。

1. 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東漢·班固《漢書·西域傳·罽賓國》）

孟康注解，提供語義線索：流離具體寶石名稱，特徵是青綠色澤與玉石般的質感。此語境顯示在漢代，試圖透過與漢地熟悉的「玉」類比，確刻劃物理屬性，而非後世「流離失所」等抽象義。

2. 爾時流離王起四種兵，伐舍維國。（東漢·失譯《大方便佛報恩經》）

《大方便佛報恩經》講述諸王因緣與報恩事跡，句中「流離王」是敘事中的君王名號，因「生時與琉璃寶俱，故號毘琉璃。」（丁福保 1984：798）開啟相關的人名用詞。顯示珍寶指稱功能之外，隨音譯需求而被借用為專有名詞，體現了該詞彙在漢語化的多重語法功能，佛典語境兼具「寶名」與「王名 / 人格化」語義角色。

「流離」用於 10 部中土文獻 18 例，僅漢、魏晉、宋三個時代運用。「流離」用於 60 部佛典 239 例，雙典合計 70 部典籍 257 例。佛典歷朝均運用，中土文獻除東漢外，僅魏晉南北朝、宋遼金時出現，顯然佛典運用更為頻繁。本詞雖缺乏「玉」旁，仍在佛典維持少量（約 2%）且持續的使用，推測可能因素是：「流離」能代之為寶石，許是由「璧流離」縮節，東漢雙典因「流離」與「琉璃」音近之故，易於混用或作為通假。先秦漢語已見「流離」，如《詩經·邶風·旄丘》云：「瑱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褻如充耳。」此處「流離」指人行蹤飄忽、漂泊無定之義，暗合佛教「無常」教義；然因構詞簡單、語音形式的便利，使「流離」得以保留一席之地。因此，「流離」像是「音近致誤」或「早期簡化形式」的殘留。

陸、詞形演變機制探討

以下由語體風格與功能適應、漢字構形與語義類屬、音譯策略的權衡、文化象徵與宗教認知、社會文化驅動等方面，探討「琉璃」詞形的演變機制。

一、語體風格與功能適應

佛典早期選用古音譯詞形如「琉璃」、「瑠璃」、「流離」等廣泛使用。自魏晉南北朝起重視對梵語音節的忠實轉寫而生多音節的新音譯詞，如「茆瑠璃、壁瑠璃耶、波流黎、吠流離耶」等諸詞，因音義不明、語義模糊而難以滲透至中土語體系統。相較之下，中土文獻僅採用雙音節、三音節詞，講求語義清晰、語感自然與構詞規整，對音譯詞接受程度有限。「琉璃」一詞形式穩定、結構對稱、偏旁識別度高，契合漢語構詞習慣，更滿足語義透明度與書寫可讀性的要求。

佛典作為翻譯文本，提供大量詞形創新場域；而中土文獻則憑藉文化心理與語用需求，發揮詞彙篩選與過濾的功能。此種「創新源」與「過濾器」的角色分工，構成語言接觸中兩種語體的互動邏輯。

二、漢字構形與語義類屬

依據汪鋒（2021）之「漢字過濾機制」，漢語在吸納外來詞時，傾向選擇構形清晰且具語義預設效應的字詞，促進語義指向建構與詞彙接受度之提升。

「琉璃」詞形，「琉」、「璃」二字皆以「玉」部構成，明確標誌其作為珍寶類物的語義範疇，提供明確的語義提示並賦予強烈的文化聯想。相比之下，「瑠璃」雖為早期音譯形式，但「瑠」字書寫較為繁複；而「流離」與寶石概念相去甚遠，易致歧解；故二詞皆不如「琉璃」流通廣泛。「琉璃」由漢字而來的理解與記憶雙重優勢，使其在競爭中逐步取代缺乏形義連結的其他詞形。

如此，核心詞形地位的確立，與漢字構形契合度密切相關，進而在詞彙選擇發揮關鍵作用。

三、音譯策略的權衡

佛經翻譯過程中，譯者在音譯策略上面臨音準與可接受度之間的抉擇。例如，玄奘等譯師重視音準，產生如「吠琉璃」等更貼近原音（*Vaiḍūrya*）的新音譯詞詞形。然而，此類詞形因形式複雜、生僻或缺乏文化連結，難以在漢語社會中廣泛流通。相對而言，古音譯詞「琉璃」、「瑠璃」等詞形雖在音譯上有所簡化，卻在形音義整合、文化適配與語用習慣間取得最佳平衡。

即便後世出現如「毗頭利、鞞稠利夜、毗琉璃耶」等更精確的新音譯詞，仍未能撼動「琉璃」、「瑠璃」的主流地位，顯示詞彙競爭的關鍵不在於音譯的精確度，而是能否有效融合於目標語言的構詞機制與文化語境。又如日語「瑠璃 / るり」仍指寶石、韓語

「유리」泛指「玻璃」、英譯多採意譯（如 *lapis lazuli*）等，顯示不同語言在音譯策略與語義延伸的差異，因而，顯示漢語在漢字構形與文化象徵支主導下走出獨特路徑。

四、文化象徵與宗教認知

「琉璃」在佛教語境不僅為實體寶石，更具高度象徵意涵，作為七寶之一，常見於「琉璃世界」、「藥師琉璃光如來」等語境中，象徵清淨、通透與圓滿等佛教核心理念。此文化象徵性賦予「琉璃」高度的語義凝聚力。

反觀「流離」帶有強烈情感色彩，與佛教「諸行無常」觀念相符，但其負面語義與佛教寶石象徵之積極意涵相悖，最終未能成為通用譯名。故詞形所具備的文化象徵效應，亦為競爭之中的關鍵篩選條件。

進入明清時期，「琉璃」逐漸轉型為世俗通用名詞，廣泛應用於建築（如「琉璃瓦」）、

器皿（如「琉璃瓶」）與工藝領域。語義擴展，進一步鞏固「琉璃」作為固定詞形的主流地位。

詞彙競爭進入穩定化階段時，高頻詞形憑藉語用慣性與傳播廣度佔據優勢，逐步邊緣化其他異形詞。儘管佛典中仍可見傳統音譯詞形，但其用例已大幅減少，反映出詞彙系統在經濟性原則下的自然選擇傾向。

五、社會文化驅動

語體風格與構詞規範之外，佛教發展、中外交流與文化政策等宏觀因素深刻影響「琉璃」詞形的競爭結果。

中外交流與物質文化變遷，早期絲路貿易與唐代外交繁盛，有助於詞形擴散；明清本土玻璃技術成熟，使「琉璃」一詞語義趨向物質化、日常化，促進其通用化發展。

佛教興衰與譯經活動頻率，魏晉至唐代佛教盛行，詞形多樣性達高峰；宋元以後，儒學復興與佛教世俗化，促使異形詞逐步退出語用主流。

語言規範與書寫制度影響，隨印刷術普及與科舉制度成熟，語言使用趨向標準化，異體詞形在官方文書與學術語境中逐漸被淘汰，主流詞形趨於固定。

綜上所述，從語言生態學角度觀之，佛典語體與中土語體、宗教與世俗文化、共同構成詞形競爭的生態環境，「琉璃」詞形的成功並非偶然，語體適應、構形理據、文化意涵與語用頻率等多重因素長期作用的結果，因此是構成可供觀察漢語外來詞標準化與詞彙競爭機制的典範個案。

柒、結論

本研究透過「雙典平行分析法」(Dual-Canon Parallel Analysis)，結合歷代文獻梳理與文本計量手段，具體廓清了「琉璃」一詞在漢語中歷時兩千年的演變軌跡。從東漢初傳時的相對沉寂，到魏晉隋唐因佛教興盛而在佛典語體中高度活躍，形成詞形激烈競逐與異體雜呈的高峰；及至宋元以降頻率趨於穩定，明清時期「琉璃」於世俗文獻之使用量大幅攀升並反超佛典。此一進程顯示，該詞已由宗教專門術語轉化為跨語體、跨領域的通用詞彙，完成語體擴散（genre diffusion）。

在詞形演變層面，「琉璃」個案呈現出典型的「多重補位」(multiple filling) 格局。於外來概念引入初期，「琉璃」「瑠璃」「流離」乃至「毘琉璃」等多種音譯與異寫形式並存，暫時共同填補同一語義空缺。研究證實，佛典語體作為外來詞的「試驗場」，承載著最多樣的補位形式；中土文獻則較早完成詞形收斂與規約，長期僅保留「琉璃」一形。此一歷程具體展現了「詞彙競爭」(lexical competition) 的動態機制：隨著語體分工的明確化、使用頻率的消長與功能負載的差異，語言系統在多重補位之後逐步篩選出穩定的優勢形式。

針對勝出詞形的形成邏輯，「漢字過濾機制」(Chinese-character filtering mechanism)

提供了關鍵的理論視角。量化數據與語境分析顯示，「琉璃」之所以能從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關鍵在於其具備高度的「形—音—義整合度」：雙音節結構符合漢語常用詞的韻律節奏，且以「玉」部構字，預設「寶石、珍寶」之語義範疇。這種符合漢文化物質想像、價值預期的構形優勢，使其在漢字系統的過濾與再詮釋中取得決定性地位；相對地，「流離」易與既有「流離失所」義混淆，「吠琉璃」等音譯形式則因構形冗長、語義透明度低，而在競爭中逐步被邊緣化。

「雙典平行分析法」的運用，亦為本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實質貢獻。藉由將「漢文佛典」與「中土傳世文獻」視為功能有別而又相互滲透的語料系統，本文得以量化比較同一詞彙在宗教語體與世俗語體中的密度與強度，描繪出詞形於雙典之間的轉移、擴散與定型路徑。結果表明「琉璃」的標準化並非單一語體內部的自發調整，而是佛典翻譯、文人書寫與物質文化交互作用的結果，充分印證語體風格與社會功能在詞彙競爭中的關鍵角色。

綜上所述，「琉璃」一詞由多形並存走向高度規範、由佛典語體走入世俗應用，其歷時變遷完整體現了外來詞在漢語中「多重補位—競爭—過濾—定型」的演化過程。本文不僅為詞彙競爭理論與漢字過濾機制提供了大規模歷時語料的實證支持，亦確立「雙典平行分析法」在解析語體差異與語言變遷方向上的解釋力。未來若能將此方法推廣至「琥珀」「玻璃」「瑪瑙」等相關詞群，將有助於建構一套兼顧語言結構與文化轉譯的漢語外來詞演化通則。

誌謝

本文承蒙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計畫補助（NTCU113103「漢文佛典古音譯詞詞彙競爭的多維度探析」）經費挹注，敬致 謝忱。

參考文獻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Salikoko S. Mufwene。《語言演化生態學》。郭嘉、胡蓉、阿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原著出版於 2001 年）

Thomason, S. G., & Kaufman, T.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汪鋒。〈語義演變、詞彙競爭與詞彙分層——以「茗」「茶」的興替為例〉。《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13(2)，(2020)：378–389。

汪鋒。〈茶的別稱「葭」的起源與消亡——兼論漢字的過濾機制〉。《民族語文》，1，(2021)：107–113。

汪鋒、魏久喬。〈語義演變、詞彙競爭與詞彙傳播——*la「茶」的起源與傳播〉。《民族語文》，5，(2017)：61–77。

邱韻如。〈玻璃與琉璃：名詞溯源與概念演變〉。《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7，(2022)：55–73。

柯亞先。〈中國琉璃起源與玻璃科學考古：從文創企業琉璃工房與琉園談起〉。《亞東學報》，35，(2015)：115–135。

曾進興、陳振宇、林月仙。〈國語口語語詞辨識中的語詞競爭〉。《中華心理學刊》，48(4)，(2006)：347–368。

趙永。琉璃名稱考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5，(2013)：64–72。

劉善濤。漢語外來異名同實概念詞的詞彙分布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4，(2017)：87–96。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檢索日期：2025 年 12 月 14 日。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Chinese Text Project。檢索日期：2025 年 12 月 14 日。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16)。《CBETA 電子佛典集成》。臺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法鼓文理學院。佛學規範資料庫 Buddhist Authority Database。檢索日期：2025 年 12 月 14 日。

表 1 琉璃雙典密度、強度歷代對照

Table 1. Diachronic comparison of dual-canon density and intensity of *liuli*

時代	佛典					中土文獻				
	用例 數	典籍 數	密度	詞目 數	強度	用例 數	典籍 數	密度	詞目 數	強度
兩漢	112	21	5.3	3	37.3	46	14	3.2	5	9.2
魏晉南北	2505	253	9.9	19	131.8	141	28	5.0	4	5.0
隋唐五代	2320	355	6.5	37	62.7	304	45	6.7	7	43.4
宋遼金	1367	221	6.2	18	75.9	787	130	6.0	15	52.4
元	294	49	6.0	12	24.5	197	35	5.6	4	49.2
明	1513	168	9.0	23	65.7	1320	184	7.1	10	132.0
清	1201	152	7.9	20	60.0	2427	297	8.1	13	186.6
	9491	1289	7.3	57	166.5	5222	733	7.1	19	274.8

註：本研究整理

表 2 琉璃詞形雙典運用對照

Table 2. Dual-canon comparison of *liuli* word-form usage

佛典獨有	雙典共有	中土獨有
溜璃、留離、琉瑠、瑠離、璃璿(5) 毘琉璃、毘琉離、毘留璃、毘留離、 毘流離、毘頭梨、毘流勒、毘瑠瑠、 毘瑠璃、鞞琉璃、鞞瑠璃、鞞頭梨、 波瑠璃、波琉璃、波流離、波流黎、 波流黎、毗琉璃、吠瑠璃、吠流璃、 吠瑠瑠、筏瑠璃、餘瑠璃、薛瑠璃、 留黎耶(25) 毘琉璃耶、毘流勒叉、吠琉璃耶、 吠流離耶、吠瑠璃耶、璧瑠璃耶、 普毘琉璃、鞞稠利夜(8) 嚧吠瑠璃耶、吠疏璃唎耶(2)	琉璃、琉離、 琉璿、瑠璃、 瑠璿、流璃、 流離、璃璃、 璃琉、璃瑠 (10) 碧琉璃、 碧瑠璃、 碧流離、 吠琉璃、 璧琉璃、 餘琉璃、 薛琉璃(7)	壁流離、 壁流離 (2)

註：本研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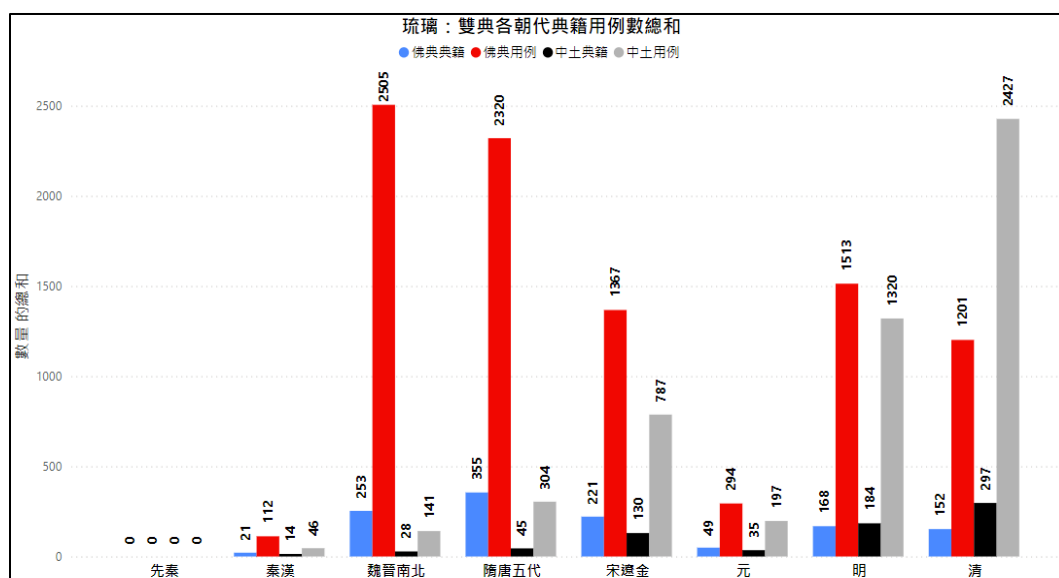


圖 1 雙典琉璃歷代典籍數、用例數統計 註：本研究整理

Fig. 1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texts and tokens of *liuli* in the dual canon across dynas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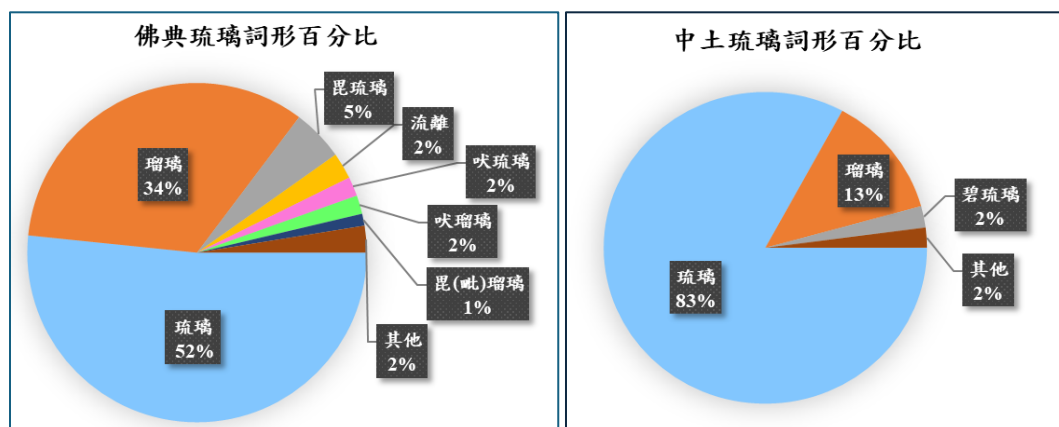


圖 2 佛典琉璃詞形分布

圖 3 中土文獻琉璃詞形分布

註：本研究整理

Fig. 2 Distribution of *liuli* word forms in Buddhist scriptures

Fig.3 Distribution of *liuli* word forms in Chinese secular tex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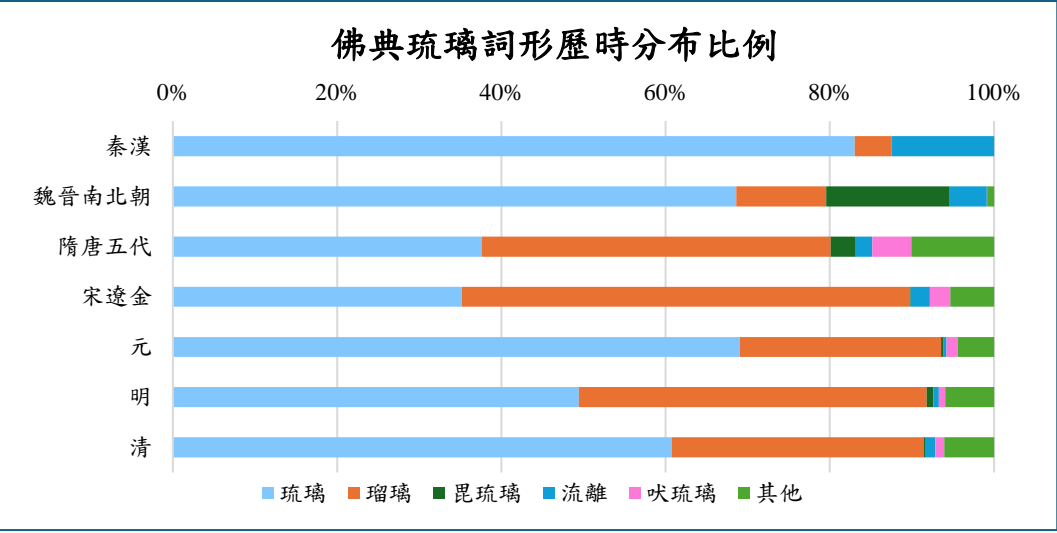


圖 4 佛典琉璃詞形歷時分布比例 註：本研究整理

Fig. 4 Diachronic proportional distribution of *liuli* word forms in Buddhist scriptu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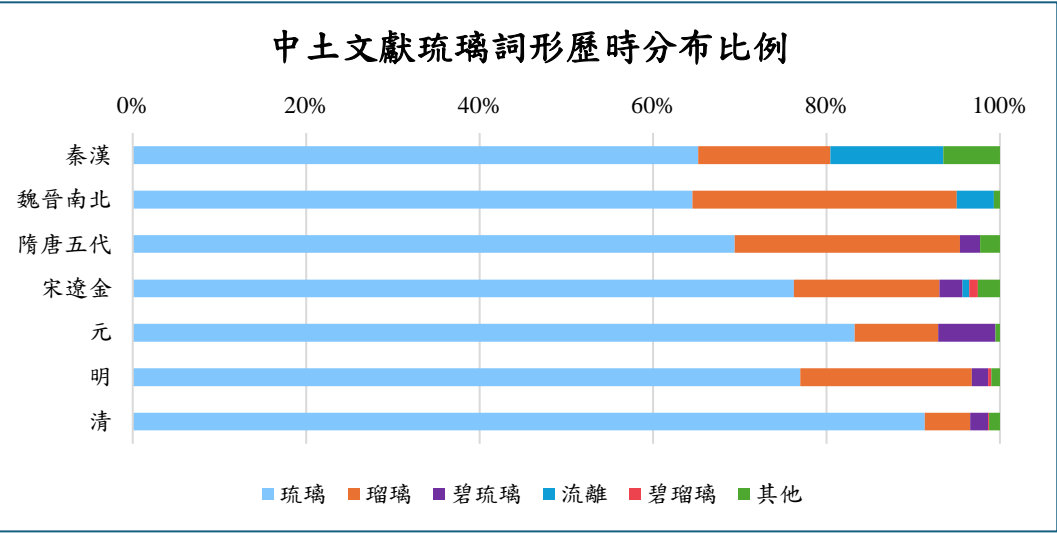


圖 5 中土文獻琉璃詞形歷時分布比例 註：本研究整理

Fig. 5 Diachronic proportional distribution of *liuli* word forms in Chinese secular texts

附錄 雙典「琉璃」詞形時代分布表

圖例 ◆：中土文獻 ▲：漢文佛典

詞目 \ 時代	兩漢	魏晉南北	隋唐五代	宋遼金	元	明	清	佛▲	中◆

1. 瑠璃	◆▲	▲◆	▲◆	▲◆	▲◆	▲◆	▲◆	7	7
2. 琉璃	◆▲	▲◆	▲◆	▲◆	▲◆	▲◆	▲◆	7	7
3. 流離	◆▲	▲◆	▲	▲◆	▲	▲	▲	7	3
4. 壁流離	◆	◆		◆			◆	0	4
5. 琉璣	◆			◆		◆	▲◆	1	4
6. 流璃		▲	▲◆	▲◆		◆	◆	3	4
7. 琉離		▲	▲	◆		▲		3	1
8. 留離			▲					1	0
9. 璃瑠			▲	▲		▲◆	▲	4	1
10. 璃璃			▲			▲◆	◆	2	2
11. 瑠離			▲			▲		2	0
12. 瑠璣			◆	◆			▲◆	1	3
13. 璃琉				◆		▲	▲◆	2	2
14. 碧琉璃			◆▲	▲◆	▲◆	▲◆	▲◆	5	5
15. 碧瑠璃			▲	▲◆	▲	▲◆	▲◆	5	3
16. 壁琉璃			▲◆	◆	◆	◆		1	4
17. 碧流離			▲	◆			◆	1	2
18. 壁流離				◆				0	1
19. 琉瑠					▲			1	0
20. 璃璣							▲	1	0
21. 溜璃							▲	1	0
22. 毘留離		▲	▲					2	0
23. 噓吠瑠璃耶		▲						1	0
24. 毘流勒		▲						1	0
25. 毘琉璃		▲	▲	▲	▲	▲	▲	6	0
26. 毘流離		▲	▲	▲		▲	▲	5	0
27. 餘琉璃		▲		◆		▲		2	1
28. 玼琉璃		▲						1	0
29. 毘瑠璃		▲	▲	▲		▲		4	0
30. 波流離		▲						1	0
31. 鞞琉璃		▲	▲					2	0
32. 毘流勒叉		▲						1	0
33. 普毘琉璃		▲						1	0
34. 吠琉璃		▲	▲◆	▲	▲	▲◆	▲◆	6	3
35. 吠瑠璃		▲	▲	▲		▲	▲	5	0
36. 留黎耶			▲	▲				2	0
37. 毘琉離			▲			▲		2	0
38. 波瑠璃			▲			▲	▲	3	0
39. 薛琉璃			▲				▲◆	2	1
40. 吠疏璃唎耶			▲					1	0
41. 薛瑠璃			▲			▲	▲	3	0
42. 壁瑠璃耶			▲					1	0
43. 吠流璃			▲					1	0
44. 吠璃瑠			▲					1	0
45. 吠琉璃耶			▲		▲	▲	▲	4	0
46. 鞞瑠璃			▲					1	0
47. 筏瑠璃			▲					1	0
48. 餘瑠璃			▲					1	0
49. 毘留璃			▲	▲				2	0
50. 鞞頭梨			▲					1	0
51. 鞞稠利夜			▲					1	0

52. 毘頭梨			▲	▲		▲		3	0
53. 波流梨				▲	▲			2	0
54. 吠瑠璃耶				▲				1	0
55. 吠流離耶				▲				1	0
56. 毘琉璃耶					▲			1	0
57. 波流梨					▲			1	0
58. 毘璃瑠						▲		1	0
59. 波琉璃						▲	▲	2	0
古音譯/新創	5/5	6/16	10/2 6	11/5	4/3	10/2	11/2	57	19
新音譯/沿用	0/0	14/4	28/1 2	16/22	9/10	16/2 4	12/21		

A Study of Lexical Competition in the Forms of “Liúli”

Pi-hsiang Chou^{1 *}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Chinese loanword *liuli* (琉璃), drawing on theories of language ecology and lexical competition to examine how multiple competing transliterated forms gradually converged into a single dominant lexical form. Adopting a **Dual-Canon Parallel Analysis** approach, the research treats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secular Chinese transmitted texts** as two functionally distinct yet interacting corpora. Through large-scale textual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s and counts all historically attested word forms referring to *liuli*, and constructs quantitative indices—specifically **lexical density** and **usage intensity**—to compare their distribution and competitive dynamics across genres and historical periods.

The results reveal a clear diachronic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the two canons. During the Wei–Jin and Sui–Tang periods, Buddhist scriptures functioned as the primary site of lexical innovation, generating a wide range of multi-syllabic phonetic transliterations and forming a highly diversified and competitive lexical ecology. In contrast, secular texts exhibited an early tendency toward convergence, consistently favoring a small set of core forms—primarily *liuli* (琉璃) and *luli* (瑠璃)—and ultimately establishing *liuli* as the dominant standard. Quantitative evidence shows that while Buddhist texts reached their peaks of density and intensity earlier, secular literature surpassed them from the Song–Yuan period onward, mark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uli* from a specialized religious term into a broadly used secular lexeme and completing its genre diffusion and lexical standardization.

Furthe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success of *liuli* cannot be attributed to phonetic accuracy alone. Rather,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lies in its high degree of **form–sound–meaning integration**: its disyllabic structure conforms to common Chinese prosodic patterns, and its characters—both bearing the jade radical—clearly signal the semantic category of precious materials, thereby enhancing semantic transparency and cultural resonance. Operating through what may be termed a **Chinese-character filtering mechanism**, the writing system favored forms that aligned with entrenched cultural expectations and graphic conventions, gradually marginalizing competing variants such as *liuli* (流離) or more complex phonetic transliterations.

By documenting the full trajectory of *liuli* from multiplicity to standardiz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a dynamic model of loanword evolution in Chinese characterized by **multiple filling, competition, filtering, and stabilization**. Methodologically, it demonstrat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Dual-Canon Parallel Analysis for capturing genre-based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action in lexical change, offering a replicable quantitative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hinese loanwords.

Keywords: Liúli (琉璃) ; lexical competition;; Dual-Canon Parallel Analysis; loanwords ; Chinese-character filtering mechanism

1 Department of Language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 jilljbs@mail.ntcu.edu.tw)

(Received 11/5, 2025; Revised 12/15, 2025; Accepted 12/15, 2025)

兩岸微短劇之詞彙分析與教學應用

楊治平⁴

摘要

在網路與多媒體世代的華語教學實務中，除課堂中的程式化教材外，學習者自行透過網路影音內容習得華語，也愈來愈常見。微短劇於2023年在中國網域興起，隨即受到閱聽大眾的喜愛而風行。外語者在學習華語的過程，經常能接觸到微短劇，並以此驗證自身的華語理解能力。快速推出的海量微短劇，可說是未來華語教學的重要輔助工具。在相關研究未臻成熟之際，本文嘗試選取兩岸微短劇各一部（《穿越黑暗擁抱你》（臺灣）與《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中國））作初步的語料分析，檢視微短劇的語言特質，評估其作為補充教材之可行性。結論顯示：除少數與劇情相關的詞彙，難度落於基礎二～三級以外，兩劇高頻詞多落於《臺灣華語文能力基準》基礎第一級核心詞；由於高頻詞對於理解劇情未必有幫助，故復以TF-IDF方法，逆向呈現出凸顯情節推進所需之場景關鍵詞，分析其難度，以確認適用的教學方法。此外，在兩岸用語比較上，差異詞不多，且集中於生活詞彙與語氣用法，對理解影響有限，挑選部分常見詞彙解說，引入文化識讀，為較合宜的教學策略。基於「可理解輸入—語境推論—互動輸出」的任務化教學流程，本文設計了將微短劇集引入課堂的教學環節，以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

關鍵字：微短劇 聽力理解 口語詞彙 華語教學 跨文化理解

⁴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民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收件，民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修改，民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接受)

壹、前言

近年華語學習需求快速增加，在結構式教材如《當代中文》、《時代華語》、《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等等之外，運用多媒體導入真實語料，將使教材設計更貼合自然的語境，更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結構式教材作為培養聽、說、讀、寫四技能訓練的基礎，另外適當選用影視素材如電視劇、電影與網路視頻作為教學資源，可使課堂的學習更為全面。無論是二語習得或外語習得環境中的學習，都能夠加速學生理解目標語的文化意蘊，增加跨文化溝通能力。隨著短影音平台如抖音、臉書 Reels、小紅書的崛起，微短劇逐漸成為年輕世代日常接觸的重要媒介，其篇幅短小、語言口語化、題材貼近日常生活，深具華語教學之應用潛力。然而，目前對於微短劇在華語教學上的研究仍相對有限，值得深入探討。本文將在補充真實語料的教學需求上，選取兩岸微短劇各一部，作為分析素材，評估微短劇在華語教學應用上的可能性。

貳、文獻回顧

所謂微短劇，通常指每集時長僅數分鐘至二十分鐘不等的劇集，常以豎屏形式播出，節奏明快、情節緊湊，貼合使用者在零碎時間觀看的習慣。由於市場定位，微短劇製作成本相對低廉，通常一部作品的製作時間約為 1 至 2 個月。在涵蓋都市、古裝、愛情、懸疑、奇幻、喜劇各方面的多元題材中，以愛情題材最為常見且佔主導地位。多數微短劇來自於熱門網路小說、漫畫或遊戲 IP 改編，並於抖音、快手、Bilibili 等短影音平台播放，受到年輕用戶及女性觀眾的歡迎。相較於傳統電視劇與電影，微短劇各集長度相對短，語言表達也更口語化，展現了大眾文化的流行特色。

微短劇興起於 2024 年，屬於相當新的劇種，在目前學界的相關研究中，主要在傳播及商管領域，前者多關心其內容對閱聽大眾的影響，例如羅曉榮、張小琴探討微短劇《當歸》如何敏銳捕捉時代脈搏，以擬人化臺灣為獨特視角，聚焦「臺灣回歸」話題，提升公眾關注度⁵；董晨宇、熊芳則探討平台經濟模式下，微短劇如何形成了特殊的敘事風格。⁶商管領域研究著重探討微短劇的行銷模式與經濟效益，如蔡旻螢在 IP 商業模式的視野下，探討微短劇文化內容在未來產業中扮演的角色。⁷在華語教學面向，目前

⁵ 羅曉榮，張小琴。〈微短劇《當歸》中“臺灣回歸”話題的多模態話語分析〉。《傳播前沿》5 卷 3 期 (2024)：19-28

⁶ 董晨宇，熊芳。〈微短劇敘事：平臺願景、內容演化與風格形塑〉。《編輯之友》第 5 期 (2025)：22-28，DOI：<https://doi-org.libers.fgu.edu.tw/8443/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5.5.003>

⁷ 蔡旻螢。〈文化內容改編之跨域 IP 發展模式〉。《臺灣經濟研究月刊》，46 卷 6 期 (2023)：22-30，

則尚未有相關研究，筆者認為微短劇廣受年輕世代喜愛，作為輔助的補充教材，能提升學習興趣並培養語感，在「多媒體」與「真實語料」教學的視角下，可作為教學環節加以研究。以下分別就這兩方面做簡單的文獻回顧。

一、多媒體華語教學之發展：

隨著全球華語學習需求持續增加，科技融入華語教學已逐漸成為不可或缺的趨勢。二十一世紀初，歐美多國的中小學與大學相繼開設中文課程，但師資不足與分佈不均的問題相當突出。⁸在此背景下，教育科技被視為突破限制的重要途徑。鄭豔群指出，網路教學因其「不受時空限制、容量大、速度快」的特性，成為「史無前例的教育工具和極易使用的信息資源庫」，能有效提升教育資源的利用率。⁹

事實上，自 1970 年代萌芽以來，教育科技已被引入華語教學，並於 1990 年代中後期快速發展。應用的形式十分多樣，包括多媒體平台、線上課程與行動學習工具。以臺灣為例，僑務委員會於 2007 年建設「全球華文網」，整合教學資源、師資社群與雲端課程¹⁰（2016）；中國大陸則由「網路孔子學院」推出點播與直播課程，並提供 HSK 模擬測驗；海外也有 BBC 中文學習網、Rosetta Stone、Busuu 等平台。另一方面，行動應用程式如 ChinesePod、Skritter 以及「秧秧教中文」系列視頻，提供生活化的學習素材，其中「秧秧教中文」截至 2016 年已累積超過千萬次點擊。數位閱讀工具與擴增實境（AR）等技術則進一步提升了互動性，學者也開始設計並開發 SELL 系統（Smartphone Enhanced Language Learning），研究能否將課本教材與行動裝置結合，轉化為多媒體學習平台。¹¹

在師生對科技整合的態度上，已有研究顯示學生普遍持高度正向立場。調查指出，超過九成的學生支持課堂使用科技，並認為科技能幫助教師完成傳統方式無法達成的任務。¹²教師的接受度則受到「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顯著影響。部分教師認為數位工具能減輕備課負擔，並提升學生自主性，但年長教師對電腦與行動設備的陌生，

DOI： [https://doi-org.libers.fgu.edu.tw:8443/10.29656/TERM.202306_46\(6\).0004](https://doi-org.libers.fgu.edu.tw:8443/10.29656/TERM.202306_46(6).0004)

⁸ 鄭琇仁。〈應用華語文學教學系學生對多媒體運用於華語教學的觀感〉。《中原華語文學報》，第 1 卷，(2008)：173～184，DOI： <http://dx.doi.org/10.30107/CYJTCSL.200804.0009>

⁹ 劉士娟。〈《多媒體華語教學》書評〉。《華語文教學研究》第 11 卷第 1 期，(2014)：151-154，DOI： [https://doi.org/10.6393/JCLT.201403_11\(1\).0006](https://doi.org/10.6393/JCLT.201403_11(1).0006)

¹⁰ 梁慧敏。〈華語網路教學發展述評〉。《華文學刊》卷十四，第一期(2016)：33-44。

¹¹ 連育仁。〈華語教材行動互動系統發展與教師科技接受度研究〉。《華文學刊》122 期（2018）：32-45。

¹² 〈應用華語文學教學系學生對多媒體運用於華語教學的觀感〉。

往往成為推廣的阻力。¹³此外，地區差異亦不容忽視，例如印尼華語教師受限於設備不足與培訓缺乏，導致多媒體教學推展成效有限。¹⁴

雖然師生的接受度因個體而略有差異，地區數位設備也有落差，但多媒體在華語教學的優勢仍然受到廣泛認可。學者指出，它能增加教學互動性、改善教學法並提供穩定的重複練習環境。¹⁵影視資源則進一步突顯了趣味性與文化潛力。王韋傑認為，電視劇具有生活化與娛樂性雙重特質，能讓學習者接觸多樣化的口音、以及即時性的口語表達方式。透過角色模仿與重複回放，更能增強聽力與口語能力。同時，劇情也自然引入文化課題，適合用於比較與討論，有助於突破傳統教材的侷限。¹⁶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媒體教材益發成熟的情況下，早期的線上課程，雖能提供大量輸入，但在口語與寫作等輸出技能的訓練上較為不足。由於大部分課程為預錄內容，學習者往往缺乏即時糾正與評估。此外，教材更新速度緩慢，新興詞彙與語言現象常無法及時反映；教材品質亦參差不齊，部分資源缺乏專業教師參與，導致設計與教學脫節。再加上資源分佈不均，初級教材數量龐大，而中高級課程則明顯不足。因此，隨著網路的普及與科技快速發展，整合各種多媒體資源具開始成為趨勢，例如將網路資源與課堂活動結合，以促進聽、說、讀、寫四項技能的均衡發展。¹⁷梁慧敏也建議在教材中加入新聞、社交媒體與流行文化元素，以提升學習者的參與度。¹⁸由此可知，影音平台內容蓬勃發展之後，網路劇、微短劇、短影音成為華語學習者在課堂外文化輸入的主要來源，在當前的學習環境中，確實是可加以探討的素材。

二、真實語料教學：

真實語料在商務及法律領域的專業華語教學特別重要，在這些領域中，學習者除了需要掌握一般語言知識外，更需處理專業文書的讀寫，以及專門用語的口語交流。這些

¹³ 〈華語教材行動互動系統發展與教師科技接受度研究〉。

¹⁴ 〈應用華語文學教學系學生對多媒體運用於華語教學的觀感〉。

¹⁵ 〈應用華語文學教學系學生對多媒體運用於華語教學的觀感〉。

¹⁶ 王韋傑：〈看電視學華語－以電視劇為教材的教學設計〉。《臺大華語文教學研究》第 1 卷（2013）：225-247，DOI：10.6664/NTUTCSL.201308_(1).0008

¹⁷ 陳亮光。〈運用直觀式 Scratch 軟體輔助對外華語文創意教材與教學設計〉。《國民教育》52 卷 1 期（2011）：71-81，DOI：https://doi-org.libers.fgu.edu.tw:8443/10.6476/JNE.201110.0071

¹⁸ 〈華語網路教學發展述評〉。

需求往往超出通用教材所能涵蓋的範圍，因此必須依賴真實語料的補充，以幫助學習者熟悉目標語的實際運用情境。¹⁹

在商務華語教學中，師資培育與課程設計的挑戰格外顯著。彭妮絲指出，商務華語具有針對性、個別化與情境化的特徵，學習者多帶有強烈的工具型動機，往往強調「急用先學」。因此，教師需具備課程客製化與教材編纂的能力，同時具備專業知識，以設計符合需求的學習內容。為回應這一挑戰，內容導向教學（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CBI/CLIL）與數據驅動學習（Data-Driven Learning, DDL）被提出作為解決方案。²⁰前者強調語言與專業內容的並重，後者則透過語料庫提供大量真實語言，讓學生以自主探索的方式歸納語言規律。兩者的結合，使師資生不僅能提升語言教學能力，也能培養蒐集與運用真實語料設計教材的素養。

在商務、法律等專業領域之外，特定的語法及語用教學，真實語料也可扮演要角。王季香認為，若能將報章新聞、廣告台詞、歌詞與日常言談引入課堂，語法學習便能擺脫傳統教材的侷限，讓學生直接觀察，體驗語言在生活情境中的實際運作。透過幽默笑話，示範詞序差異對詞性和語義的影響，或利用流行歌曲名稱分析詞組結構，都能幫助學習者在真實脈絡中形成語感。此外，真實語料能讓學生從大量實例中，辨識詞類與語義的多樣性，如「了」字在不同句位的語法功能，或副詞「才」的多重語義。²¹這些方法均顯示，真實語料能將理論知識與生活經驗相連結，增強學習的意義與深度。

另外，華語具有高語境文化語言的特點，雙關語在日常運用中十分常見。在課堂中適度引入真實語料中的雙關語，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陳雅芳以臺灣電視廣告為例，分析了語音、語意與語法三類雙關語，指出其在廣告中既承載幽默與創意，又強化文化意涵。研究顯示，高達 76% 的案例屬於語音雙關，語意雙關與語法雙關則分別佔 21% 與 3%。這些語料若能運用於課堂，不僅能引導高階學習者體會語言的多義性與修辭趣味，也有助於其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養成。陳雅芳同時提出了教學流程，包括廣告播放、語境解說、雙關語辨識與課堂創作練習，顯示真實語料不僅是學習材料，更能轉化為互動性的教學活動。²²

¹⁹ 彭妮絲。〈內容導向教學融合數據驅動學習模式應用於商務華語師資培育研究〉。《臺灣華語教學研究》23 期，（2021）：43-72，DOI：10.29748/TJCSL.202112_(23).0002 43

²⁰ 〈內容導向教學融合數據驅動學習模式應用於商務華語師資培育研究〉。

²¹ 王季香。〈看似平常最奇絕－真實材料在華語語法學的教學應用〉。《應華學報》11 期，（2012）：62-80，DOI: 10.6391/JAC.201206.0062

²² 陳雅芳。〈臺灣華語電視廣告雙關語分析及教學應用〉。《華語學刊》31 期（2021）：44-61

綜上所述，真實語料在商務法律專業語彙教學、一般語法知識活化，乃至語用理解各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教學價值，能補充結構式教材的不足。然而，在專業領域華語教學上，教師需具備該領域的基本知識，才能正確地解讀並教授真實語料。而在一般口語的情境上，真實語料包羅萬象的內容，以及極為靈活的口語特徵，已不易令初學者理解，文化隔閡更容易使學習者產生「有聽沒有懂」的困惑，在教學應用上，不可不慎。謹慎地評估語料作為教材的難易度，對應學生程度設計教學單元，才能達到「可理解輸入」的習得效果。

多媒體具有創造情境、增加互動的優勢，而真實語料則能反映語言的生活性與專業性。微短劇在二者的交集上，具備很高的教學價值。然而日常口語並不一定比專業語料容易，高度依賴語境與文化默契的特性，往往增加理解難度，與系統化、結構式的教材也不易銜接。由於「真實性」與「可理解性」之間存在張力，若能找到兼具真實脈絡，同時操作便利的素材，將有助於彌補現行教學的不足。在這個脈絡下，微短劇具有篇幅短小、題材多元、語言口語化等特質，值得進一步探討其在華語教學中的應用可能。

參、研究方法及工具

一、研究方法：

本文希望分析微短劇語料，以評估其輔助教學的可能。華語微短劇數量極多，皆為中國媒體製播，臺灣在 2025 年加入市場後，目前僅見一部由米奧繁星製作的《穿越黑暗擁抱你》，是探討臺灣華語多媒體教學資源的重要材料。²³本文亦在海量的中國微短劇中，選取初學華語者較易理解的青春校園題材，以熱播微短劇《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2023）²⁴為例，對照兩岸微短劇用語的差異。前者涵蓋商業、愛情與都市語境，後者則展現校園、家庭與人際互動，呼應年輕學習者關注的主題。字幕文本則來自 Youtube 網站自動產生之中文字幕，經過 jieba 斷詞與人工清理，去除非語言符號，並依標點符號分句，整理為可供詞彙與句法分析的小型語料庫。

在分析設計上，本研究採取兩個層次：首先，透過詞頻統計方法，檢視高頻詞分布，並與國家教育研究院《華語八千詞表》比對，以掌握詞彙難度，對應課堂教材進度。由於高頻詞往往為代詞或連詞，雖然辨識容易，卻對劇情脈絡的掌握有限，因此進一步採

²³ 寇乃馨。《穿越黑暗擁抱你》。Youtube。米奧繁星，檢索日期：2025 年 11 月 11 日。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Ly1p52Bxz4>

²⁴ 姜好。《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Youtube。快手星芒短劇，2023 年 8 月 30 日。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PLNUwG1kv8>。

用 TF-IDF 方法，將全劇字幕依情節大致分為 14 至 15 段，計算相對於全劇的專屬高頻詞，以呈現各段情節的核心詞彙。筆者再依觀劇經驗加以篩選，排除人名、場景等無助於理解的詞項。經由上述兩層檢測，可以勾勒出微短劇語料的難度，評估其作為補充教材時，對學習者的負荷程度，以進一步設計出合適的教學單元。

二、研究工具：

本文所使用的工具主要包括現成語料庫資源，以及文本處理分析軟體。採用的語料庫為國家教育研究院所建置之《華語文語料庫》（Corpus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Mandarin, COCT），涵蓋書面語約四億一千萬字、口語約二千五百三十萬字，並整合分級標準與語料庫技術，發展出詞彙索引、語義場關聯查詢與作文自動批改等系統。²⁵在教學實踐上，華語文語料庫可以讓教師快速地確認測驗題目、補充教材的詞彙語法難度，是十分重要的工具。

《華語文語料庫》也建置了詞彙、語法點的分級系統，並依聽、說、讀、寫、譯五項能力，設計三等七級能力指標，即「臺灣華語文能力基準」（Taiwan Benchmarks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TBCL）。TBCL 之設計理念係以「能力導向」為核心，並參考國際語言標準（如 CEFR）建構出三等七級之架構，旨在為華語教學提供具標準化且科學化的詞彙與語法分級指引。其適用範圍廣泛涵蓋教材編撰、教學評量及課程規劃，是目前臺灣華語教學界最具權威性的衡量標準。

TBCL 為臺灣華語而設置，分析臺灣微短劇《穿越黑暗擁抱你》具有優勢，但在評估大陸微短劇《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的語料時，適配度則有所限制。部分大陸用語如「對象」（指男/女朋友）、「飯盒」（指便當）或「地鐵」（指捷運）等，在 TBCL 系統中，可能因地域用語習慣不同，而產生分級的誤差。因此在呈現該劇高頻詞的分級時，需要筆者進一步的檢視與比對，以彌補 TBCL 無法完全覆蓋的大陸用語的缺點。

在斷詞工具部分，目前常用的中文斷詞工具，有由中央研究院中文詞知識庫小組（Chinese Knowled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Group，簡稱 CKIP）研發的中文斷詞系統，及結巴（Jieba）中文斷詞系統。²⁶前者在處理繁體中文文本上有優勢，後者則在簡體中文文本的分析上效果較好。本文分析的微短劇中，大陸製播的《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採用 jieba 斷詞，能對應工具本身的優勢。臺灣劇《穿越黑暗擁抱你》，原應使用擅長繁體文本的 CKIP 斷詞系統，然而 CKIP 基於大型 AI 模型 BERT，並依賴神經網路

²⁵ 吳欣儒等。《華語文能力基準應用參考指引》。臺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2023。

²⁶ 李永山;李家寧;黃俊閔;黃世育。〈應用文本分析於輿論聲量分析之研究〉。《資訊電子學刊》第

10 卷 1 期(2022)：頁 88。DOI：10.30253/JIE.202207_10(1).0004

引擎，使用上需先下載模型權重檔。相較之下，可以 python 語言直接在 colab 執行任務的 jieba，使用上簡便許多。由於《穿越黑暗擁抱你》字幕本身僅 11,905 字，可以人工比對彌補 jieba 處理繁體文本的缺點，故仍採用 jieba 做基礎斷詞清理，並依據 Chatgpt 5 提供的程式碼，計算出微短劇各別的高頻詞。經筆者判斷，排除人名、地名之後，選擇雙字詞為分析對象。

計算高頻詞之外，為補充劇情發展的關鍵詞彙，本研究採用 TF-IDF (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做逆向詞頻呈現。TF-IDF 是一種用於資訊檢索與文字探勘常用的加權技術，用來評估對文件集合或詞庫中，某詞彙對此文件的重要程度。

TF-IDF 包含兩個部分：詞頻 (term frequency, TF) 與逆向文件頻率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IDF)。詞頻指一個詞彙在某一文本出現的頻率，出現的次數越多，其重要性越高；逆向文件頻率則是指一個詞彙出現在許多文件的頻率，當某個詞彙在文件集合或詞庫中出現的頻率增加，其重要性即降低。TF-IDF 傾向於過濾掉常見的詞彙，保留重要的詞彙。²⁷

因此，在語言學應用中，TF-IDF 常被用於萃取網路大量資訊中的「主題詞」、「情節詞」或「語體專屬詞」，以補足單純詞頻分析的不足。例如楊登堯以此方法分析臉書資訊²⁸，李永山等人以此提取選舉相關之輿情。²⁹與網路資訊相較，單部微短劇的字幕體量甚小，在 TF-IDF 的應用上，確實會造成「高權重但無語義代表性」的「關鍵詞」。經筆者比對後，在語意代表性較低的詞彙如「哈哈」、「哪裡」、「這麼」之外，TF-IDF 所呈現出來的分段主題詞仍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分析文本不多的情況下，仍予以採用。

教材設計上，高頻詞呈現了華語口語中密集出現的主詞、代名詞、連詞，對於劇情的理解幫助不大，故本文於高頻詞分析之外，另外以 TF-IDF 呈現出分段劇情核心詞彙（以下簡稱「分段主題詞」），以有效評估學習者的理解程度。

肆、研究分析與討論

²⁷ 〈應用文本分析於輿論聲量分析之研究〉。

²⁸ 楊登堯：《利用臉書資訊探討網路新聞的吸引力及極性分析》，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指導教授：侯文娟。

²⁹ 〈應用文本分析於輿論聲量分析之研究〉。

一、詞彙分析：

經由上述研究方法，分別得到兩部微短劇的「高頻詞表」及「分段主題詞」(TF-IDF)，以下先就高頻詞作分析，並提出對應的教學策略。在雙字詞的部分，微短劇《穿越黑暗擁抱你》中，排除人名與公司名，出現頻率超過 15 次以上的雙字詞共有 29 個。其中 20 個可對應到 TBCL 之詞語分級，另 9 個為組合詞，在難度對應上，宜以語法點分級呈現。以下依詞頻為序，將單純高頻詞及組合高頻詞分表列出，並各別對應詞語及語法分級：

表一：《穿越黑暗擁抱你》高頻雙字詞列表

編號	詞語	出現次數	詞語分級
1	我們	56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2	什麼	53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3	怎麼	41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4	這麼	30	基礎第二級核心詞
5	知道	26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6	可以	26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7	公司	24	基礎第二級職業
8	你們	21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9	事情	19	基礎第二級核心詞
10	這樣	19	基礎第三級核心詞
11	集團	18	進階第五級職業
12	那麼	18	基礎第二級核心詞
13	時候	17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14	這裡	16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15	現在	16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16	時間	16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17	專案	15	精熟第六級
18	自己	15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19	真的	15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20	已經	15	基礎第二級核心詞

表二 《穿越黑暗擁抱你》高頻雙字組合詞列表

編號	詞語	出現次數	語法點分級
----	----	------	-------

1	不要	35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2	不是	32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3	這個	29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4	就是	26	進階第四*級
5	一個	25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6	還有	18	基礎第三*級
7	女人	16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8	還是	15	基礎第二*級、第三級、進階第五級
9	想要	15	基礎第二級

表一顯示，《穿越黑暗擁抱你》詞彙難度集中於「基礎第一級核心詞」，如「我們」「什麼」「怎麼」「不」「是」「可以」等，約占全表七成，顯示劇本語言高度口語化，貼近日常對話語域。第二至第三級詞如「這麼」「那麼」「事情」「這樣」等則構成中級層次，兼具描述與語氣功能；進階詞如「集團」「專案」則屬職場或專業語域，數量有限，反映劇情雖含職場設定，但主體仍為人際與情感互動。整體難度落在 CEFR 等級 A1 至 A2 之間（CEFR 對應表，採用國家教育研究院發佈之「華語文能力基準應用參考指引」），適合初級學習者的聽說訓練。

表二的高頻組合詞中，佔比最高且構成口語對話基礎結構的是「基礎第一級」核心詞，包含表達否定與指稱的「不要」、「不是」、「這個」及「一個」，而「女人」一詞則是由兩個基礎第一級核心詞所組成。進入「基礎第二級至第三級」的範疇後，組合詞開始涉及更複雜的意願表達或語句連接，例如屬於第二級的「想要」，以及難度跨度較廣、涵蓋第二、三級甚至進階第五級的「還是」，此外「還有」則被歸類為基礎第三*級。最後，具有強調或轉折功能的「就是」在難度上相對較高，屬於「進階第四級」的語法點。整體而言，這九個詞彙包含部分中高階的連接詞與語氣詞，較表一的高頻詞稍難，教師可參考學生程度，在適宜的環節各別介紹語法。

與正式編定的華語教材如《當代中文課程》比較，微短劇以高頻代名詞及連接詞為主，句式則多為「不要」、「不是」、「這個」、「想要」等口語結構，強調情境互動，與正式教材話題明確、規範句式的特點不同。《穿越黑暗擁抱你》的詞彙分布也更接近於自然語料，與正式教材偏向書面與任務導向的語料特色不同。筆者認為，微短劇中出現頻繁的代詞、疑問詞與情感副詞（如「真的」、「還是」、「已經」），可補充正規

教材中口語真實度不足的弱點。將《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劇中的高頻詞也依據詞語與組合詞列表，兩相對照，會發現與表一、表二的詞彙重複度極高，難度的分布也相當一致：

表三：《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高頻雙字詞列表

編號	詞語	出現次數	詞語分級
1	什麼	71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2	怎麼	46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3	我們	46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4	你們	43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5	知道	41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6	喜歡	31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7	現在	30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8	一下	28	基礎第二級核心詞
9	沒有	27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10	但是	26	基礎第二級核心詞
11	今天	25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12	一起	23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13	可能	22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14	這麼	21	基礎第二級核心詞
15	世界	20	基礎第二級核心詞
16	好像	17	基礎第二級核心詞
17	所以	17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18	自己	16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19	沒事（沒關係）	16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20	老師	15	基礎第一級教育學習

表四：《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高頻雙字組合詞列表

編號	詞語	出現次數	語法點分級
1	不+是	47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2	這+個	47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3	就是	42	進階第四*級
4	一+個	34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5	那+個	33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
6	回去	22	基礎第二*級
7	不+會	19	基礎第一級核心詞+基礎第一*級 核心詞
8	的話	19	基礎第三級
9	還是	18	基礎第二*級、第三級、進階第五 級
10	看到 (到動 作完 成)	15	基礎第三級
11	還有	15	基礎第三*級

比較表一與表三，《穿越黑暗擁抱你》與《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在詞彙組成與語法分布上呈現高度一致性。兩劇的高頻詞核心皆由「什麼」、「怎麼」、「不是」、「這個」、「我們」、「知道」、「可以」、「自己」等功能性詞構成，顯示語料以人際互動為主，屬於典型的口語溝通語域。若以《華語文能力基準》為參照，表一與表三多集中於基礎第一級核心詞（約占七成以上），再輔以少量第二、第三級詞與極少數進階詞（如「專案」「集團」「世界」等）。由詞頻結構可知，微短劇語言以日常對話為主體，缺乏書面化、文學性或典故式的詞語，語料難度整體落於 A1 至 A2 之間，適合初級華語學習者作為真實語料的輸入素材。

表四《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的組合詞也展現初級口語特質，集中於「基礎第一級核心詞」，例如「不是」、「這個」、「一個」與「那個」等。進入中階難度後，則出現了涉及動作完成的「看到」、表達假設關係的「的話」，以及具備聯繫功能的「還有」與「回去」，與表二的分布呈現相當一致。

兩劇之間詞彙重疊度達八成以上，反映了微短劇文本在語言結構上存在明顯的共通機制。首先，敘事方式相似。無論是職場情感劇《穿越黑暗擁抱你》或校園奇幻劇《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劇情皆以對話推動，台詞須在極短時間內交代情節、表達情緒，導致大量使用代詞、疑問詞及情態詞來維持語流。例如兩劇皆頻繁出現「不是」、「還是」、「就是」等語法結構，這些片語兼具確認、轉折與語氣強調的功能，屬於高頻口語句型。其次，語域特徵相近。兩劇皆設定於現代都市語境，避免方言與古語，詞彙貼近青年世代的語感，具有高度的共時性。第三是高頻詞極度靈活，理解上需要語境的支

持，如「怎麼＋（動詞）」、「不會吧」、「的話」、「一下」等反覆出現，反映了劇本創作依循日常的語用邏輯，對於初學者而言，理解相對困難。總而言之，微短劇篇幅短、剪接快、對白密集，角色情緒轉折須靠語氣詞與高頻詞維繫，這是兩部作品無論在高頻詞、詞彙難度都高度相似的主要因素。

從教學觀點看，這種語料組合缺乏教材化的設計原則，詞彙與句型分布不具遞進結構，初級學習者若直接接觸，極易因生詞、語速與情緒轉折而無法掌握語意，在教學現場的功能性較弱。其次，劇中大量使用語氣詞、省略句與非標準語，如「不會吧」、「幹嘛啊」、「就這樣啊」。這些結構簡單的短句，對母語者不具難度，但對外語學習者而言，需要額外的語境解釋，掌握語意的難度也許不亞於結構複雜的長句。尤其微短劇的劇情吸引力高，學生容易將注意力集中於情節而非語言，若缺乏教師引導，學習焦點可能流於娛樂消費而非語言習得。

因此，就高頻詞組合來看，微短劇的高頻詞彙雖然難度不高，但最合宜的進入時機，並非語言學習初期。在學習者已具備基本詞彙量，並且有語法概念，能進行基礎溝通之後（約 A2 至 B1），微短劇輔助的學習成效會較好。此時以微短劇提供學生自然的語音、語調與語氣輸入，可以強化語感與語用能力。若在課前提示高頻詞及語法重點，課中再搭配聽辨、角色模仿或劇情討論等活動，學生更能因理解劇情，而掌握真實的語用。如此，微短劇便能在正式教材的基礎上發揮延伸功能，兼顧真實性與可教性，成為培養語感、語用及文化理解的重要中介。

二、分段主題詞分析：

理解微短劇需要高度的語用及語境掌握能力，高頻詞固然組合固定、難度不高，但對於理解整體劇情而言，實屬不足。即便作為補充教材，也不容易在注意力原則下，針對學生的程度產生學習效果。若將微短劇依據劇情分段，並以 TF-IDF 方法（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做逆向詞頻呈現，便能從分段主題關鍵詞，重新檢視學生在理解上的困難與可能性。

在初步跑出 TF-IDF 權重排行後，筆者進一步結合實際的觀劇經驗，進行人工篩選。篩選的結果，希望能保留具備「場景核心意義」的詞彙，如《穿越黑暗擁抱你》的「專案」、「公司」、「董事」，以及與人物關係或情感轉折相關的「敘事功能」詞彙，例如《穿越黑暗擁抱你》的「一起」、「放開」等詞。人名（如《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中「周強」、「鍾笑笑」；《穿越黑暗擁抱你》中「天行」、「林曉晴」）與特定場景名稱（如《穿越黑暗擁抱你》中公司名「北辰」、「鼎盛」），因為這些專有名詞雖權重極高，卻無助於學習者理解語言本身的難度或語法結構。

下表呈現二劇分為 14~15 個段落，進行 TF-IDF 分析及人工篩選後，各段落權重最高之主題詞前三名：

表五：《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及《穿越黑暗擁抱你》分段主題詞列表

段落	《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	《穿越黑暗擁抱你》
第一段	什麼、高中、不是	專案、這裡、渾水
第二段	厲害、知道、不要	之前、公司、醫院
第三段	燈塔、食堂、那個	這麼、剛好、杯子
第四段	叔叔、再見、哈哈	一起、哪裡、現金流
第五段	暴力、孩子、我們	放開、包包、改天
第六段	房間、危險、迷倒	董事、身邊、這樣
第七段	進去、前進、考進	外資、董事、全部
第八段	絕對、奶奶、什麼	男人、身材、大事
第九段	小弟、補償、本人	怎麼、要是、女人
第十段	百依百順、油條、只有	而已、資金、資料
第十一段	生日快樂、什麼、怎麼樣	記錄、這幅畫、還有
第十二段	穿越、喜歡、世界	老大、失去、姐姐
第十三段	摸摸、一個、發生	這件、伯母、婚禮
第十四段	煩惱、所有、很多	孩子、所有、要不然
第十五段	一切、離別、一些	

在兩部微短劇的分段主題詞中，部分詞彙如「什麼」、「怎麼樣」、「這麼」、「要不然」等，與全劇高頻詞重合。這種重合並非分析誤差，而是語料本身特性的反映。微短劇多以日常對話構成劇情主軸，人物語言自然帶有口語性與即時反應性，因此語用功能詞、疑問詞及語氣詞的使用頻率極高。「什麼」用於提問、反詰、或作語助詞填補語氣；「怎麼樣」、「這麼」則在表達驚訝、比較或情感強化時出現；「要不然」則常見於建議與推進情節的轉折句中。這些詞雖非劇情核心意象，但因出現穩定，跨段落廣泛分布，故在逆向呈現分析時，仍容易在權重程度脫穎而出。由於所佔比不高，筆者未加以排除，以完整呈現短劇的口語真實性。

若進一步檢視表中各段前三高權重詞，可以發現部分詞彙屬於語義特定、使用範圍窄的低頻詞，如「渾水」、「現金流」、「暴力」、「補償」、「百依百順」、「離別」、「董事」、「外資」等。這些詞通常不出現在初級或中級教材中，但在劇情語境中扮演關鍵角色。例如《穿越黑暗擁抱你》中「專案」、「董事」、「外資」、「現金流」等屬於商業領域詞彙，反映該劇情節涉及企業管理與職場人際，是大陸職場劇常見語域；

相對地，《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中則出現「高中」、「補課」、「老師」、「孩子」、「奶奶」、「生日快樂」等家庭或校園語境詞，呈現青春題材的生活化特徵。這些低頻詞雖在一般教材中不屬高頻，但卻是理解劇情不可或缺的關鍵詞。例如「百依百順」雖為四字成語，但表達性格關係與人物態度，是辨識人物性格的線索；「渾水」在口語中多作比喻，意指「涉入複雜或不明的事件」，在劇情中往往預示衝突。「現金流」、「外資」、「專案」則屬專業詞，反映角色職場身份差異。由此可見，TF-IDF 能凸顯特定段落中具代表性的低頻詞，對於華語學習者而言，這類詞能增強對劇情推進的理解。即便本身的溝通能力尚不足以掌握運用，但預先在補充單元接觸，未來在課堂或生活情境中熟習的速度就會更快。

分段主題詞分析，也顯示了微短劇語料的幾個特徵。首先，詞彙的「分佈集中性」高於一般教材。由於劇本長度有限且劇情緊湊，每段通常圍繞單一情境或事件展開，導致特定語義場域中的詞會反覆出現。例如《穿越黑暗擁抱你》第六、七、十段中，與企業層級相關的詞「董事」；與股權相關的「資金」、「外資」重覆出現，即反映該情節集中在公司決策的討論。這種高語義集中性使 TF-IDF 能迅速標示「場景核心詞」，成為劇情理解與段落主題的指標。然而，有限的關鍵主題詞重覆出現，對於學習效果的推進意義便不顯著，是單元設計時需要考量的要素之一。其次，微短劇詞彙呈現「口語與專業語混用」的雙層特性。與課本或新聞語料不同，劇本語言既有大量口語語助詞（例如「這麼」、「還有」、「要不然」），又夾雜職場、情感或家庭等語域的專業詞。這說明微短劇語料能同時反映真實口語互動與社會文化語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分段主題詞也顯示了微短劇詞彙的「敘事功能導向」：擔負推進劇情功能的詞彙（如「放開」、「改天」、「離別」），或與角色情感衝突相關的詞彙（如「暴力」「危險」「失去」），皆非抽象概念詞。代表微短劇語言與角色行動、情感場景緊密連結，相對於結構式教材而言，在訓練學習者情境口說能力上，應當具有優勢。從另一方面來看，對應情境的口語呈現，也較缺乏教學的延伸性，不若結構教材能系統呈現，深化學習效果。

綜合 TF-IDF 與全劇詞頻表的結果，教師在教學設計上可採分層策略。首先，對於「什麼」、「怎麼樣」、「還有」等高頻功能詞，可透過語用任務讓學生練習在不同語氣中的使用差異，例如反問、轉折或情感填補，培養口語自然度。其次，對於 TF-IDF 顯示的低頻但語義關鍵詞，宜在課前進行「詞彙導入活動」，以圖片、片段對話或角色設定協助學生預測詞義，避免生詞阻礙理解。再者，可根據兩劇不同的語域特色設計主題式任務：如《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可安排「校園回憶」討論，《穿越黑暗擁抱你》則可延伸至「職場決策」或「人際協商」情境。這種從詞頻與權重雙重視角出發的教學設計，能兼顧真實語料的自然性，與學習需求的可控性，讓學生在劇情的娛樂效果之外，同時

加深、加廣詞彙的應用理解。最後，建議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兩岸用語差異（如「包包／背包」、「放開／別碰」等），增進跨區域語言意識。

三、兩岸用語差異：

比較兩劇的高頻詞表，由於詞彙重合度極高，（如「什麼」、「怎麼」、「不是」、「可以」、「我們」等）約有八成以上，可見華語核心詞彙在兩岸的差異不大。差異性展現於語氣習慣、特定用語及句末助詞三項。劇本為適應閱聽大眾，語言多採取「跨區域可理解」的通用語域，只是在語氣習慣上，母語者仍可感受到一定的不同。例如臺灣語言習慣常見「這裡」、「這樣」、「真的嗎」等語氣詞，予人溫和而帶有保留的感受；大陸則較常出現「怎麼回事」、「真的假的」、「沒事兒」，語氣較為直接，節奏也較為明快。

至於涉及生活文化與情緒語氣的特定用語，差異就較為顯著。例如「外送（臺灣）／外賣（中國）」、「男友（臺灣）／對象（中國）」、「便當（臺灣）／飯盒（中國）」、「捷運（臺灣）／地鐵（中國）」、「小吃攤」等等。這些詞彙的差異，多數可以依據上下文判斷正確意涵。只是對初級的學習者而言，若未加說明，仍易造成理解障礙。

此外，兩岸的句末語助詞也有差異。臺灣口語多用「啊」、「吧」、「喔」，而大陸劇中常以「呀」、「唄」、「呢」標示語氣。句末助詞雖然在語法結構上較簡單，但是字面語意模糊，需仰賴語境以詮釋其意涵，因此第二語學習者往往難以掌握其用法與分別。³⁰兩岸句末助詞在語音、語意上的差異，除非學習者特別提出疑問，宜在進階教學單元帶入。

整體而言，兩岸微短劇語法、語氣雖然相似，但語氣習慣、特定用語及句末助詞仍有一定差異。在臺灣進行華語教學，引入兩岸用語差異，應採分階段策略。初級階段（A1–A2）以建立通用語為主，不宜強調地域差異，以免增加認知負荷。學生具備基本語法與詞彙量後（約 B1 階段），可開始逐步介紹常見差異詞。筆者認為此時的教學重點，應非詞彙對照，而是「語用場域」的辨識。可以透過微短劇片段的對比，讓學生觀察同一語意在兩岸表達方式的差異，加深學生對語言地區變體的理解。在這樣的教學單元中，教師本人也必須注意避免陷入政治敏感議題。另一方面，教師也可適時提醒學生：網路環境中接觸的大量大陸用語（如「傻 B」、「U 盤」、「軟件」），並非皆適用於臺灣社會，在生活中溝通應用時，應加以留意。

³⁰ 張玲瑛。〈現代漢語句末助詞「嗎、啊、吧、呢」的教學語法〉。《華語文教學研究》6 卷 2 期（2009）：99-127，DOI：10.6393/JCLT.200912.0099。

面對學習者在課室外透過影音平台（如 YouTube、Bilibili、Tiktok）習得詞彙的狀況，教師應適度解釋差異的成因，避免學生誤以為單一地區的用語即為「標準華語」。兩岸用語差異的教學價值不在於強調對錯，而在於讓學生理解語言背後的文化邏輯，培養跨文化理解與實際交際能力。當學生能靈活辨識並選擇適合語境的表達方式時，才真正具備「全球華語」的語用素養。

伍、微短劇之教學應用

一、教學定位與理論依據：

微短劇作為「真實語料」與「多媒體教材」兼具的素材，能在有限篇幅內，呈現具體情境與自然語流，符合任務導向教學（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TBLT）與真實語料教學（Authentic Materials Approach）的理念。高頻詞的分析顯示，兩岸微短劇常用詞彙與語法難度不高，貼近日常對話。加上篇幅短、語速適中、題材多元等特色，微短劇能在初中級（A2-B1）階段提供介於課本與真實口語之間的語料輸入。其主要教學功能可大約歸納為三項：

- （一）增強聽覺辨識與語氣理解能力；
- （二）透過角色與情境再現，提高語用意識；
- （三）作為跨文化比較的媒介，幫助學生理解兩岸用語與語感差異。

因此，在教學設計上應以「可理解輸入、語境推論、互動輸出」為原則，使學生透過情節，自然習得相關詞彙與語境應用。在課前階段，應以「可理解輸入」為教學目標，帶入與劇情推進相關的分段主題詞，並播放劇照或截圖，預先為內容勾勒輪廓。課中則以「語境推論」為主，在觀看影片片段之後，請學生完成聽力任務單（如找出人物情緒轉折、配對台詞與場景），並引導學生從語境中理解詞義與語氣。若有時間繼續課後階段，則可以「互動輸出」為標的，強化學生的口語聽說訓練，讓學生以小組方式改寫或續寫對話，模擬劇情並口語演出，最後由教師與同儕給予語用與發音回饋。

二、教材選用與單元設計：

根據前面高頻詞與分段主題詞的分析，《穿越黑暗擁抱你》與《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整體難度落於 A2。詞彙則以第一級核心詞居多，適合具基礎溝通能力之學習者。因此在教材選段的考慮上，應以單一事件、或情感轉折的精彩段落為主。過長的劇情段落，不易保持學習者的注意力，包含太多專業詞（如「現金流」、「外資」）的片段，學習者也易因理解困難而失去興趣。如希望保留專業詞的教學，就必須做好課前「可理解輸入」的詞彙導入工作，以降低理解負荷。

如學生程度不高，字幕的輔助具有保持注意力的優勢，但也容易降低學習者理解詞彙、發展聽力的意願。先播放無字幕片段，進行學習活動後，再次播放附有字幕的片段，是可行的解決之道。這樣的教學設計單元，能有效呈現自然語流與情感轉折，輔助結構式教材相關部分的學習。前文已由統計方式表列微短劇的高頻詞與主題詞，並呈現大約的難度，作為教學的參考。量化的統計適用於快速錨定文本的詞語特徵，以掌握置入課堂的合適時機。然而，具體的教學環節，仍需由教師就微短劇的劇情、學生的興趣等因素量身打造。以下選取《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中開啟男女主角校園戀情的一段情節為例，設計教學單元。語法教學重點「V 著」語法點分級為基礎第二級，「V 在一起」則結合了基礎第二級語法「在」及基礎第一級詞語「一起」，各見於表三及表五。

該段情節背景，是穿越回十七歲的女主角鍾笑笑，發現只要跟男主角許漾在一起，便能穩定時空的隨機置換，達成正常生活。於是特地將座位換到男主角旁。情節涵蓋三幕，分幕對白如下：

第一幕：笑笑坐在教室中思考，聽到同學的對話。

笑笑內心：煩死了！沒有許漾就沒辦法正常生活！但是我也沒辦法每時每刻都黏著他呀！

同學 A：王婷肯定是在談戀愛。

同學 B：你怎麼知道？

同學 A：天天黏在一起，不管在哪，兩個人就跟連體嬰兒一樣。那除了談戀愛還能是什麼嗎？

笑笑：要是跟我談了戀愛，他不就得天天黏著我？

第二幕：笑笑試著向許漾表白，並在換座位時設法坐到許漾身邊的位置。

笑笑：我喜歡你，你要不要跟我談戀愛？

許漾：鍾笑笑，腦子進水了，就趕緊倒出來。明天見。

老師：這次換座位，採用抽籤的方式，大家抽到哪坐哪。當然也可以私下調整。

笑笑內心：拜託，拜託！讓我跟許漾坐同桌吧！實在不行，後座也行，給我一個套近乎的機會。

笑笑：哎，郭哥，我跟你換位置吧？啊？你看我的，後排靠窗、上課睡覺、下課玩手機的絕佳位置！你不想要嗎？

郭哥：但是我……

笑笑：你跟我換，下午春遊，我幫你拿行李！

第三幕：春遊

笑笑：哎呀！就為了跟你坐同桌，我學習都沒這麼努力過！多多關照！

郭哥：哈哈哈哈！鍾笑笑真的很強悍的！哈哈哈！

鍾笑笑：放哪？

郭哥：啊？！啊！放那邊！你幫我把東西放過去就行！哎，給你們看看，哈哈
哈！有意思吧！

同學 A：你拍得挺好啊！

許漾：你沒必要為了跟我坐一起而做這些。

笑笑：哎！有必要！而且我是為了我自己！

郭哥：今天我請啊，隨便吃！哈哈！哎！鍾笑笑，把東西搬過來！

笑笑：來了！

許漾：鍾笑笑，老師說跟同桌一組，你到處跑，如果出了事情，我是要負責
的。

許漾：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對郭哥）

許漾：你不用跟著我。

笑笑：那怎麼行？你都說了你要對我負責，我必須寸步不離地跟著你。

同學 A：哪有人跟在男生後面，走一步跟一步，也不注意點影響。這要是我，
我媽得把我罵死，臉皮可真厚。

許漾：你沒聽到他們剛說的嗎？

笑笑：聽到啦，這人要活得開心呢，第一步就是要忽略別人的看法，等你到了
我這個年紀就明白了。

許漾：你才比我大三個月。

笑笑：呦～這麼關注我啊！？

許漾：剛剛你讓我幫你拿身份證。

同學 B：有人暈倒了！

笑笑：許漾，我知道我現在說的話很離譜，但是從現在開始，你一定不要離開
我。

在課前預先導入的詞彙選定為：戀愛、喜歡、換、座位、拿、行李。語法部分則預先提示「V 著」及「V 在一起」。由於劇情並不困難，即便無法理解全部語彙，仍能推測其進展。加上微短劇播放是輔助正式課程的教學單元，導入詞彙數量不宜太多，同時以板書或字卡展示，以不增加詞彙學習的負擔、方便同學理解劇情為目標。語法則是操練的重點，可於補語教學時配合課程導入。以《當代中文課程》為例，可於第二冊第五

～六課進行放置動詞及「V 著」語法教學時，一併補充「V（黏、坐）在一起」的應用句型。

播放微短劇時，首次採無字幕播放，預先概覽劇情，同時也能提高好奇心，為正式的字幕播放熱身。第二次以後，則輔助字幕播放，在關鍵詞彙及語法出現時，暫停播放，加以解說。最後，回歸到正式教材的語法教學，補充「坐在一起」、「黏在一起」，或進階的「跟 S 坐/黏在一起」，反覆口語問答操練。教學流程表如下：

表六：《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單元示範教學流程表

節次分段	主要內容與教學設計	時間長度
一、課前熱身與詞彙導入	<p>◎教師介紹或複習語法（如：誰坐在一起？誰黏在一起？）。</p> <p>◎透過字卡/板書/圖片介紹和唸讀 6 個詞彙：戀愛、喜歡、換、座位、拿、行李。</p>	10 分鐘
二、微短劇觀看與理解	<p>◎無字幕播放片段，讓學生推測「發生了什麼事」，概覽劇情。</p> <p>◎輔助字幕播放，針對關鍵詞彙（黏在一起、戀愛、換座位等）和語法（V 著、V 在一起）出現處暫停。教師在不干擾劇情的前提下，提示語法結構和情境用法。</p>	10 分鐘
三、語法操練與應用	<p>◎操練「坐在一起」、「黏在一起」的句型，並補充「跟 S 坐/黏在一起」。</p> <p>◎利用劇中人物和情境設計問答（如：鍾笑笑為什麼要坐在一起？你希望跟誰坐在一起？），引導學生進行反覆口語練習，連結自身經驗。</p>	10 分鐘

這樣的單元，可依課程時數及學生程度靈活搭配，不必拘泥於固定流程，讓學生從理解到模仿，再到創作，逐步體驗語言的真實運作。在觀影與角色模擬後，如時間允許，教師也可引導學生比較劇中與臺灣用語不同之處，思考文化的差異。這樣的活動設計，能讓微短劇在視聽素材之外，更能連結生活與思想文化，啟發學生思考語言背後的意義。

陸、結論

本研究以兩岸微短劇---臺灣的《穿越黑暗擁抱你》與中國大陸的《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作為題材，分析其詞彙難度，並設計教案。結果顯示，微短劇確實具有教材開發的潛力，能在真實語用和語感訓練上，補充結構式教材的不足。

兩部微短劇語料的高頻詞一致性極高，集中於《華語文能力基準》的「基礎第一級核心詞」，顯見劇本語言以日常對話為主的特性。微短劇中大量出現的代詞、疑問詞、情態詞和語氣詞（如「什麼」、「怎麼」、「還是」、「就是」），正是自然口語的標誌。

低難度的高頻詞，尚不足以理解劇情。透過 TF-IDF 分段主題詞分析，能進一步提取出關乎劇情進展的關鍵詞，如「現金流」、「董事」、「百依百順」、「離別」等等。這些詞彙常常超過 A2 程度，考慮學習者的理解負擔，不宜作為教學的重點。在設計教學單元時，應以「可理解輸入」的原則預先導入，輔助劇情理解，達到較佳的學習效果。兩岸語用習慣不同，對於初中階的學習者而言，並非教學重點。但在文化素養的教學角度上，教師仍可適時引導學生留意差異，避免將單一地區用語視為「標準華語」。

在教學應用方面，本文以《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片段為例，設計教學流程。作為正式課程的補充單元，配合劇情、重點操練與結構教材相關的語法，能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如劇情中女主角為避免時空置換造成的混亂，必須與男主角「黏在一起」、「跟他坐在一起」，透過五分鐘長度的短影片，可以在不造成理解負擔的情況下，讓學習者加深印象，並產生口語練習的興趣。

微短劇是具有高度的娛樂性的真實語料，快節奏的分段情節，適合作為簡短的教學單元，輔助結構式教材的內容學習。它能让學習者在課本提供的單一語境外，接觸到當代青年人真實的語言樣貌和流行文化。若能建置語料庫，深入分析微短劇口語特徵，開發學習任務單，將可令華語教材更具實用性。

參考文獻

一、書籍

吳欣儒等。《華語文能力基準應用參考指引》。臺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2023。

二、學位論文

楊登堯。《利用臉書資訊探討網路新聞的吸引度及極性分析》。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指導教授：侯文娟。

三、期刊

王季香。〈看似平常最奇絕－真實材料在華語語法學的教學應用〉。《應華學報》卷(11)，(2012)：62-80，DOI: 10.6391/JAC.201206.0062

王韋傑。〈看電視學華語－以電視劇為教材的教學設計〉。《臺大華語文教學研究》1(期)，(2013)：225-247，DOI：
10.6664/NTUTCSL.201308_(1).0008

李永山、李家寧、黃俊閔、黃世育。〈應用文本分析於輿論聲量分析之研究〉。《資訊電子學刊》10(1)，(2022)：85-99，DOI：
10.30253/JIE.202207_10(1).0004

陳亮光。〈運用直觀式 Scratch 軟體輔助對外華語文創意教材與教學設計〉。《國民教育》52(1)，(2011)：71-81，DOI：<https://doi-org.libers.fgu.edu.tw:8443/10.6476/JNE.201110.0071>

陳雅芳。〈臺灣華語電視廣告雙關語分析及教學應用〉。《華語學刊》(31)，(2021)：44-61

張玲瑛。〈現代漢語句末助詞「嗎、啊、吧、呢」的教學語法〉。《華語文教學研究》6(2)，(2009)：99-127，DOI：10.6393/JCLT.200912.0099

梁慧敏。〈華語網路教學發展述評〉。《華文學刊》卷十四，第一期(2016)：33-44。

連育仁。〈華語教材行動互動系統發展與教師科技接受度研究〉。《華文學刊》122 期 (2018)：32-45。

彭妮絲。〈內容導向教學融合數據驅動學習模式應用於商務華語師資培育研究〉。《臺灣華語教學研究》23 期，(2021)：43-72，DOI：
10.29748/TJCSL.202112_(23).0002 43

劉士娟。〈《多媒體華語教學》書評〉。《華語文教學研究》11(1),(2014)，151-154，DOI：[https://doi.org/10.6393/JCLT.201403_11\(1\).0006](https://doi.org/10.6393/JCLT.201403_11(1).0006)

蔡旻螢。〈文化內容改編之跨域 IP 發展模式〉。《臺灣經濟研究月刊》，46 卷 6 期 (2023)：22-30，DOI：<https://doi->

org.libers.fgu.edu.tw:8443/10.29656/TERM.202306_46(6).0004

董晨宇，熊芳。〈微短劇敘事：平臺願景、內容演化與風格形塑〉。《編輯之友》
第 5 期 (2025)：22-28，DOI：[https://doi-](https://doi-org.libers.fgu.edu.tw:8443/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5.5.003)
org.libers.fgu.edu.tw:8443/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5.5.003

羅曉榮，張小琴。〈微短劇《當歸》中“臺灣回歸”話題的多模態話語分析〉。《傳播前沿》5 卷 3 期 (2024)：19-28

鄭琇仁。〈應用華語文學教學系學生對多媒體運用於華語教學的觀感〉。《中原華語文學報》，第一卷，(2008)：173-184，DOI：
<http://dx.doi.org/10.30107/CYJTCSL.200804.0009>

四、網路

姜好。《我回到十七歲的理由》。Youtube。快手星芒短劇，2023 年 8 月 30 日。
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PLNUwGIkv8>

寇乃馨。《穿越黑暗擁抱你》。Youtube。米奧繁星，檢索日期：2025 年 11 月
11 日。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Ly1p52Bxz4>

鐵鼓小皮。〈《我回到十七岁的理由》收官播放破 4 亿，快手按下微短剧创新加速键〉。搜狐，檢索日期：2025 年 12 月 23 日。網址
https://www.sohu.com/a/722258384_116162

Lexical Analysis and Teaching Applications of Micro-Short Drama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Chih-Ping Yang³¹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wo cross-strait micro-short dramas—*Embrace You Through the Darkness* (Taiwan) and *The Reason I Returned to Seventeen* (China)—as its corpus. Using the Chinese subtitles from YouTube, the texts were segmented and cleaned with Jieba, then analyzed through a two-layered approach combining word frequency and TF-IDF to explore their lexical composition and assess their feasibility as supplementary teaching material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side from a small number of plot-specific words, whose difficulty exceeds Level 2–3, most high-frequency words in both dramas fall within the Level 1 core vocabulary of the *Taiwan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Standards*. However, these high-frequency words do not necessarily aid in comprehension of the storyline. Therefore, TF-IDF was employed to highlight key scene-related terms essential for plot development, and their difficulty levels were examined to determine suitable teaching methods.

In terms of lex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mainly in everyday expressions and tone markers, exerting limited impact on comprehension. Explaining selected common divergent terms and introducing cultural literacy are thus proposed as more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Grounded in the task-based teaching cycle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 contextual inference – interactive output,” this study further designs a classroom module integrating micro-short dramas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Keyword: Micro-short drama,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Spoken vocabulary,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³¹ History Department, Foguang University, ROC.

(Received 11/12, 2025; Revised 12/24, 2025; Accepted 12/24, 2026)

早期印刷史解謎— 英國十八世紀印刷商約翰·懷特現存木雕版與相關印刷品

宋美瑩³²

摘要

約翰·懷特（John White, 1689–1769）是十八世紀英格蘭北部極具代表性的出版商與印刷商，其事業以新堡（Newcastle-upon-Tyne）為中心，印製與發行內容涵蓋民謠傳單、通俗小書（chapbooks）及兒童讀物等類型。更具研究意義的是，懷特工坊所使用的大量原始印刷木刻版（printing woodblocks）至今仍保存於世，主要分藏於美國洛杉磯杭廷頓圖書館與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圖書館。本文旨在對這批極具歷史意義的物質遺產進行系統性研究，核心問題包括：這些木刻印版的真實性與流傳脈絡為何？它們在懷特的出版策略與視覺傳播中扮演了何種角色？懷特木刻版有何重要性？早期文獻中木雕版製作知識的缺口，為本研究重新檢視木雕版實物與其工藝角色提供重要切入點。本研究透過實地考察杭廷頓圖書館、大英圖書館與新堡市立圖書館，結合歷史考證與實物比對的方法，深入分析懷特印刷品與其對應木刻版之間的關聯。研究旨在凸顯實體文物（artefacts）於歷史學實證研究中的不可替代價值；特別是在數位虛擬資訊氾濫、真偽辨識日益困難的當下，物質性研究的實證意義更需被重新評估與重視。本文亦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多年期研究計畫的重要成果之一。

關鍵詞：約翰·懷特、新堡、印刷木刻版、民謠傳單、通俗小書

³² 佛光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民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收件，民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修改，民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接受）

壹、前言

約翰·懷特 (John White, 1689–1769) 是十八世紀英格蘭早期印刷史上極具代表性的出版商與印刷商，其事業以新堡 (Newcastle-upon-Tyne) 為中心，出版範圍涵蓋民謠傳單、通俗小書 (chapbooks) 與兒童讀物等多樣印刷品，可謂當時英格蘭東北地區出版業的典型代表。懷特以大量運用木刻版畫的印刷風格著稱，其在推動地方出版與普及閱讀文化上的貢獻，已在書籍史研究中獲得一定評價。然而，近年針對懷特及其出版網絡的專門研究卻相當罕見，原因主要在於年代久遠與文獻、實物資料的散佚與不足。

本研究的起點源自筆者於洛杉磯杭廷頓圖書館進行「阿姆斯壯印刷木刻版」(Armstrong Printing Woodblocks) 編目工作時的意外發現。該館藏共約四千件木刻印版，其核心部分經比對確認，正是十八世紀約翰·懷特工坊所使用的原始印刷版。這批木刻版入藏近百年卻長期未被研究，也未正式編入館藏目錄。筆者於 2006 年在館內進行其他版畫印版研究時，偶然注意到它們的存在，遂開啟長期的考證與追蹤。然而，這批長期缺乏記錄與研究的木刻印版，是否確為懷特工坊原版？其流傳脈絡與保存機制為何？又為何能在眾多早期印刷版中脫穎而出，成為收藏家與拍賣市場所重視的對象？為釐清這些問題，筆者歷時十餘年，結合歷史文獻比對、印刷實物分析與館藏檔案研究，逐步還原懷特木刻印版的使用與流傳脈絡，並透過與其傳人出版品的比對，重新確立懷特在十八世紀英格蘭出版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深入探討十八世紀早期英國重要印刷出版者約翰·懷特 (John White)，並自洛杉磯杭廷頓圖書館館藏中，辨識與考證其曾使用的木雕版，釐清相關版材的真偽與流傳情況。研究透過木雕版與懷特印刷品的對照分析，檢視其印刷品質與用色特徵，並從版面形式與內容出發，探討其出版品的視覺取向與經營策略；同時結合懷特與其事業相關人物、同期出版商，以及當代倫敦出版品之比較，進一步揭示其出版特色及其對後世印刷文化的影響。藉由這一個案，本文亦試圖重新理解十八世紀英國北方鄉鎮的出版活動與印刷業發展脈絡。

此外，本研究亦著重於早期印刷木雕版作為實體文物的研究價值，藉由分析其物質特性與製作痕跡，揭示其所蘊含的歷史實證，補充紙本出版品未能呈現的印刷工藝資訊，並為印刷史與歷史學研究提供具可驗證性的物證基礎。

本文之研究貢獻可歸納如下：

- (1) 針對杭廷頓圖書館典藏之印刷木雕版，建立較為完整之記錄與基礎資料整理。
- (2) 透過懷特印刷品與木雕版之對照分析，提出其使用關係與相關考證成果。
- (3) 比較懷特與其傳人的印刷品，觀察其相對優勢。

- (4) 以具體物證補充印刷史研究，提供可檢證之歷史實證。
- (5) 凸顯印刷木雕版作為歷史文物之研究價值與其在印刷史中的地位。
- (6) 補充既有印刷史文獻中對製作工藝與材料層面著墨不足之處。

二、文獻探討

英國印刷史的研究多集中於十九世紀，尤其是湯瑪斯·畢維克（Thomas Bewick, 1753–1828）等木雕版畫大師的作品，對約翰·懷特的研究相對較少。現有文獻中，Welford（1895）紀錄了懷特及其新堡地區的印刷業，而 Gardner（2008）則關注懷特家族的歷史背景，但兩者對懷特的印刷作品本身缺乏深入的分析。對於其印刷品的評價，多流於表面評論，缺乏系統的物證支持與實證分析。

筆者基於杭廷頓圖書館與大英圖書館的原始木雕版與印刷品，經過十餘年的研究與資料收集，已於數次研討會上發表過相關成果，並於 2025 年 7 月出版《重構轉瞬即逝的遺產：阿姆斯壯木刻版畫收藏品（1600-1910 年代）之歷史與材質分析》（Reconfiguring Ephemeral Heritage: A Historical And Material Analysis Of The Armstrong Woodblock Collection (1600-1910s)），著重在這套近四千塊木雕版的收藏史與材質歷史的演進。本研究則聚焦於其中約一百件約翰·懷特的木雕版與印刷品，旨在對其出版品進行溯源、辨識與詮釋，再進一步就木雕版本身的形制推測其製作方式。

關於木雕版的形式與製作方法，十九世紀之前並無相關文獻，形成技術空缺的現象，木版印刷的材質與技術手冊、百科全書皆止於雕刻、印刷的工具與方法，如法國十八世紀的百科全書 *Encyclopédie* (Diderot et al., 1751–1765) 中印刷相關行業的描繪。該書雖以系統性呈現手工技藝著稱，並收錄「木刻(*gravure en bois*)」、「印刷(*imprimerie*)」等條目及大量圖版，然其關注重心多集中於雕刻刀具、操作姿勢與印刷流程，木雕版在圖像中始終以已可直接使用的完成狀態出現，顯示木版本身的製作與使用前的處理並未被視為需要說明的工藝環節。

進一步觀察可知，與木版製作相關的材料處理技術，僅能零散見於「木工(*menuiserie*)」、「細木工(*ebenisterie*)」等其他工藝條目之中，涉及原木鋸解、木板整平與表面處理等一般性技術，卻未被明確連結至木刻或印刷實務。此一敘述結構反映十八世紀工藝知識的分工方式：木版作為圖像印刷的物質基礎，被視為既定前提而非研究對象，其材料性與勞動過程遂在文本與圖像中趨於隱沒。相較之下，十九世紀以後木刻技術手冊開始系統性討論木版材質與製作條件，正突顯早期文獻中木雕版製作知識的缺席，亦為本研究重新檢視木雕版實物與其工藝角色提供重要切入點。

相較於十八世紀 *Encyclopédie* 對木雕版製作的沉默，十九世紀英國木刻文獻雖逐漸意識到木版材質在圖像再現中的重要性，然其關注仍多止於使用層面，而非製作流程

本身。如 John Jackson 與 William A. Chatto 合著的 *A Treatise on Wood Engraving* (1839) 已明確區分側木與端木的使用，並強調黃楊木木口對細線雕刻的優勢，但相關討論主要集中於材料性質與刻版效果，並未系統說明木塊自原木鋸解、整形至可刻狀態的製作過程。其後如 Thomas Gilks 的 *The Art of Wood Engraving* (1866) 則進一步反映木刻工藝的專業分工化，木版被視為可直接取得的既成材料，製作工序幾乎完全未被觸及；至於 W. J. Linton 的 *The Masters of Wood-Engraving* (1889)，更將重心轉向版畫風格、作者與作品評述，使木版的物質生成在藝術史敘事中趨於隱沒。整體而言，十九世紀文獻雖補充了對木版材質與切面特性的理解，卻仍延續將木雕版本視為技術前提而非研究對象的書寫傳統，顯示木版製作知識在長時段中持續處於文本化與圖像化的邊緣。

綜合上述文獻可見，無論十八世紀的百科全書體系，或十九世紀英國木刻技術與藝術史著作，對木雕版的關注多止於其作為圖像再現媒介的功能與使用條件，而木版本身的製作過程、材料處理與使用則長期未被系統性書寫乃至理解。此文獻缺席使木雕版在歷史敘事中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技術前提，而非具有自身物質特性與工藝歷史的研究對象。基於此，本論文主張有必要回到保存至今的木雕版實物，透過其尺寸、切面、磨損與製作痕跡，補充文獻所未能揭示的工藝層面，並藉此重新理解木版印刷中被忽略的材料知識與勞動結構，作為重構早期印刷技術史的重要基礎。

三、研究方法

由於杭廷頓圖書館藏木雕版長期未經編目，且前收藏者阿姆斯壯 (James Tarbotton Armstrong) 所提供的簡略目錄不足以作為可信資料，筆者在無現有資料支持的情況下，採用了多種研究方法來進行資料的辨識與比對。研究的主要方法採移地研究實物觀察，整合散落各處的文物資料，做紮實精細的歷史溯源與考證工作。筆者走訪了大英圖書館、新堡市立圖書館、大英博物館等多個機構，並將這些機構的印刷品與杭廷頓圖書館的木雕版進行細緻的比對。研究重點放在木雕版與印刷品的特徵，如木版尺寸、材質印記、磨損痕跡，紙張的印刷墨色、質地與版面等，並從物證學角度考察早期印刷技術、排版與編輯方法。

此外，研究還採用了版面圖像比對與圖文主題閱讀法，通過分析懷特印刷品的設計趨向與內容特徵，對其出版策略進行了歸納，並將懷特的作品與當時新堡、倫敦等地區的出版品進行比較，探討當時出版界的競爭與相互影響的現象。

在辨識木雕版與印刷品之間的真實關聯時，研究首先從版面圖像的主題入手，然後對木雕版正面與印製版的尺寸進行比對，最終通過木雕版上的破損痕跡與印刷版的匹配來確認其真實性。這一過程排除了仿作的可能，因為仿製的木雕版無法精確複製原版的缺陷。基於這些辨識結果，本研究進一步探討了懷特出版品的主題、風格與特色，並分析了懷特與其傳承者之間的關係。

最後，研究還將探討早期印刷木雕版的收藏與價值問題，並在此過程中闡述其作為文物的歷史意義。

貳、約翰·懷特的印刷木雕版

一、約翰·懷特的家族事業

約翰·懷特（John White, 1689-1769）出身於印刷世家，其父親老約翰·懷特（John White Senior, 1680-1716）在英格蘭北部城市約克（York）創立了自己的印刷事業。父親曾於 1688 年光榮革命前夕為未來的威廉與瑪麗（William and Mary）雙王印製《告全國人民書》（*Treatise to the Nation*），並在詹姆士二世（James II）統治期間因反叛行為被囚禁於赫爾城堡（Hull Castle）。雙王即位後，老約翰·懷特被封為「國王的北方五郡印刷商」（"Their Majesties Printer for the Five Northern Counties"）（Gardner 2008）。

小約翰·懷特繼承了父親的事業，於 1708 年 19 歲時從約克搬至新堡（Newcastle-upon-Tyne），並營運了近 60 年的《新堡報》（*Newcastle Courant*）與《約克報》（*York Courant*）。其中，《新堡報》自 1720 年起成為英國東北部最具影響力的地方報紙，報導範圍涵蓋了諸如諾森伯蘭郡（Northumberland）、威斯特摩蘭郡（Westmorland）、坎伯蘭郡（Cumberland）等地，並沿著蘇格蘭邊界一直擴展至約克郡及蘭開郡等地。1719 年，懷特與家人（繼母 Grace 與侄子 Charles）創辦了《約克精神報》（*York Mercury*），進一步將報業勢力擴展至南部，成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印刷商之一。直到 1739 年，《新堡期刊》（*Newcastle Journal*）的出現，才打破了懷特獨占市場的局面。除報紙外，懷特的事業還涉及各類印刷品的出版，從昂貴的訂製書籍到廉價的傳單（broadside）、小書（chapbook）和小冊子（pamphlet）等，幾乎無所不包。

懷特的印刷事業在他去世後由其夥伴繼承轉手，傳人持續使用他所創立的木雕版印刷。即使這些木雕版因年久失修而不再被用於印刷，它們仍奇跡般地得以保留下來。本文將探討懷特的印刷品及木雕版如何在後世得到重視，並得以保存至今。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十九至二十世紀的藏書家、出版商及版畫愛好者的懷舊情感，以及由木雕大師湯瑪斯·畢維克（Thomas Bewick）所引領的木雕復興（Wood Engraving Revival）潮流。這不僅是商業木刻版畫的保存，更代表了手工木刻版畫從商業印刷轉變為藝術形式的歷史過程。

二、杭廷頓圖書館藏木雕版

本研究始於對美國加州杭廷頓圖書館所藏三千至四千件印刷木雕版的調查。這批木雕版最初由前任收藏家詹姆斯·塔博頓·阿姆斯壯（James Tarbotton Armstrong, 1848-

1933) 收集。阿姆斯壯原為來自英國的移民，在 1917 年將其收藏售予亨利·愛德華·杭廷頓 (Henry Edwards Huntington, 1850-1927)，在後者創辦的杭廷頓圖書館、藝術博物館及植物園中，命名為「阿姆斯壯木雕版系列」(Armstrong Woodblock Collection)。

根據現存的交易書信，阿姆斯壯與杭廷頓之間的木雕版交易顯示出一場典型的商業利益博弈。信中，阿姆斯壯表現出對交易的極度渴望，並在推銷這些木雕版時誇大其詞，這些行為無疑反映了其商業操作中的不誠實與過度誇張的傾向。這也解釋了為何儘管杭廷頓最終購得這些木雕版，但該館在百年來從未對其進行過正式編目。這些木雕版因此長期被擱置，直到近年才被重新關注。³³

阿姆斯壯曾編撰一份粗略的兩卷本目錄，該目錄的卷一首頁寫道：

「這些古樸奇特的原始木刻版，選用梨木、松木及其他木材，並以普通刀具雕刻而成。其風格特徵與『朱利安·伯納斯』(Julian Berners)、《下棋》(Ye Plays of ye Chesse) 等版畫作品相近，屬於同一時代的產物。這些木版可能曾在英國多個早期印刷工坊流傳，直到被新堡書商威廉·多德(William Dodd) 先生發現。這位聲望卓著的長者在其所編《新堡印刷品集》(四開本，僅印百冊) 中提到：這些木刻版出自『約翰·懷特印刷室——此人曾是新堡、約克、愛丁堡等北方四大城鎮的國王御用印刷商』。據稱，約翰·懷特於 1780 年從約克將這些木刻版帶回，然而，這些木版的年代遠早於他所屬的時代。這些獨特且極具古風的英格蘭木刻遺珍，將成為揭示書籍史新篇章的寶貴媒介。」³⁴

儘管阿姆斯壯的許多說法流於誇張與誤導，這段陳述卻意外地具有某些真實性。筆者當時雖持半信半疑的態度，但經過多年考證，最終確認杭廷頓圖書館所藏的阿姆斯壯木雕版中，約有一百多塊確實屬於約翰·懷特，這些木雕版構成了阿姆斯壯收藏的核心，並且主要出現在其目錄的前半部分。

這些木雕版最初於 1895 年通過蘇富比拍賣會進行拍賣。拍賣會目錄由印刷商及版畫愛好者艾德溫·皮爾森 (Edwin Pearson) 編寫³⁵。皮爾森是英國藏書界一位具有爭議的

³³ 杭廷頓圖書館藏木雕版的收藏史，詳見筆者研究 Sung(2025 July)。

³⁴ 收藏於杭廷頓圖書館的打字手稿：‘Ancient and quaint original blocks in pear-tree, deal and other woods, cut with a common knife, characteristic of and contemporary with the cuts of “Julian Berners[”], “Ye Plays of ye Chesse” etc., and have probably passed through many of the earliest printing offices in Great Britain, till they were discovered in the stock of the Newcastle bookseller, worthy old William Dodd, who leaves on record in his guinea volume of Impressions there from (“100 copies only printed” in 4to.) that the ancient relics came from “John White Printing Office, he being ye King’s Printer for the four great Northern Town, Newcastle (John White’s Decdt.) York, Edinburgh etc. John White brought them from York in 1780, but the blocks are of a much earlier time than when he lived./ Very rare and exceedingly quaint relics of old English wood-engraving. These blocks will be the means of discovering much (fresh) history about books.’

³⁵ *Catalogue of an extraordinary assemblage of many thousands of engraved wood-blocks : forming the most extensive collection ever brought together of the original engravings on box-wood by Thomas and John Bewick,*

人物，雖然他在推廣木雕版畫方面有其貢獻，但他卻將所有類似的作品，不論是否與畢維克相關，均歸為畢維克的創作。可以說，阿姆斯特壯是皮爾森這一思潮的繼承者。這種混亂的歸類導致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的英國印刷版畫史成為一團難以解開的迷霧，考證工作因此漫長且費時，至今仍有許多作品難以定論。

事實上，1895 年蘇富比拍賣會確實出售了約翰·懷特的部分木雕版，阿姆斯特壯得以搶購其中的一部分。這些木雕版擁有悠久的收藏歷史，可追溯至阿姆斯特壯之前的多位收藏家³⁶，包括約翰·懷特在約克的夥伴湯瑪斯·根特（Thomas Gent）、小約翰·懷特在新堡的夥伴湯瑪斯·聖（Thomas Saint, 1738-1788）、新堡印刷商安格斯家族（George Angus, Thomas Angus, Margret Angus）等，安格斯在 1774-1825 年間是畢維克的出版商。此外，還有被稱為「畢維克迷」的藏書家，包括艾德溫·皮爾森（Edwin Pearson）、艾默生·查恩利（Emerson Charnley）、威廉·多德（William Dodd）以及出版了《畢維克收藏家》（*The Bewick Collector*, 1866-68）、《畢維克的木版畫》（*Bewick's woodcuts*, 1870）的湯馬斯·雨果（Thomas Hugo）³⁷等。

這些收藏者大多是印刷商或出版商，他們曾將木雕版用於自己的出版品中。當前可知的懷特木雕版收藏地點包括杭廷頓圖書館（約有一百多塊）、大英博物館（五塊）、以及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圖書館（約有一百多塊）。其餘的木雕版已流落至私人收藏或無法確定去向。本文將聚焦於杭廷頓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所藏的木雕版與其印刷品進行分析。

其中，新堡出版商艾默生·查恩利的兒子，於 1858 年將父親生前收藏的 730 塊木刻版印製出版了《早期木刻版畫樣本集》（*Specimens of Early Wood Engraving*）。隨後，威廉·多德在查恩利版本的基礎上增補至 806 塊，並於 1862 年重新發行該樣本集。在這本樣本集中，多德在序言中提到這些木刻版畫「很可能最初是由新堡的約翰·懷特所彙

consisting of sets of blocks to Bewick's Select Fables, Newcastle, 1784 and 1820; Gay's Fables; Dance of Death; Tommy Tripp; Thornton's Herbal, and other important works; with some hundreds of old English toy book blocks, &c; ... also original and curious blocks by ... other contemporary artists, formerly in the Hugo Jupp, Pearson and other collections. Together with the original blocks, stereotype-plates, and publishing rights of Bewick's Select Fables. (Longmans' edition 1878.) Which will be sold by auction, by order of the trustees under a deed of gift, by Messrs Sotheby, Wilkinson & Hodge, ... 13, Wellington Street, Strand, W.C. on Friday, the 19th of April, 1895, and following day, ... Sotheby, Wilkinson and Hodge.

³⁶ 麥吉爾大學圖書館網站上有一篇關於館藏木雕版的文章，提供一張約翰·懷特木雕版的傳承圖，但因考證不足，錯漏甚多，僅供參考：見 Constantin (2013)。

³⁷ Thomas Hugo, *Bewick's woodcuts: impressions of upwards of two thousand wood-blocks, engraved, for the most part, by Thomas & John Bewick ... including illustrations of various kinds for books, pamphlets, and broadsides ... with an introduction,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blocks, and a list of the books and pamphlets illustrated* (London: L. Reeve & Co., 5, Henrietta Street, Covent Garden, 1870)，此書插圖可知雨果也有約翰·懷特的木雕版，附圖前幾頁重複印製多德《樣本集》裡多幅版畫，可能是雨果從多德購得。1895 年蘇富比拍賣目錄 Thomas Hugo 也是編者之一，其中包含他自己的收藏。

編」。這兩本樣本集成為筆者考證的根據。經過多年搜尋和比對，結果顯示，樣本集中的大多數木雕版確實出現在由約翰·懷特出版的紙本印刷品上。

筆者根據各時期的擁有者及印刷活動，推測約翰·懷特木雕版的傳承時間表如下：
表 1[圖 108, 109]

時間範圍	擁有者與印刷商	備註
1708-1769	約翰·懷特 (John White)	主要在新堡執業
1769-1788	托馬斯·聖 (Thomas Saint, 1738-1788)	懷特的夥伴
1788-1825	安格斯家族 (M. Angus & Son, G. Angus)	畢維克的出版商，使用懷特木雕版印刷
1825?-1858	艾默生·查恩利 (Emerson Charnley, 1781-1845)	重要的藏書家與出版商，畢維克的出版商
1858-1862	威廉·多德 (William Dodd)	增補並再版樣本集
1862?-1870	湯馬斯·雨果 (Thomas Hugo, 1820-1876)	《畢維克收藏家》的出版者，書中有懷特木版畫
1870?-1895	埃德溫·皮爾森 (Edwin Pearson)	版畫愛好者與推廣者，1895 年拍賣懷特木雕版
1895-1907	詹姆士·塔博頓·阿姆斯壯 (James Tarbotton Armstrong)	蒐集木雕版轉售給杭廷頓圖書館
1907 至今	亨利·愛德華·杭廷頓 (Henry Edward Huntington)	現藏於杭廷頓圖書館

由上表可見，懷特木雕版的收藏脈絡，與木版畫家湯瑪斯·畢維克 (Thomas Bewick) 在英國木刻史中的重要性具有高度關聯。由於畢維克出身新堡，收藏者在關注其藝術與技術背景的同時，亦逐步將研究與收藏範圍延伸至新堡早期印刷業，包含懷特所使用之木雕版。相關論述，筆者已於 Sung (2025)一文闡述，本文重點將回歸懷特作品本身。

以下將就約翰·懷特現存木雕版與筆者考證得知的印刷品做初步比對與分類，藉以瞭解懷特的出版主題，重點在於觀察木雕版的形制，由實體推斷得出文獻中缺乏的工藝資訊；同時也從紙本觀察懷特出版品的印刷特色。

參、約翰·懷特印刷品主題與對應木雕版

一、市井歌謠傳單 (Broadside Ballad) 與小書 (Chapbook)

約翰·懷特使用木刻版畫的印刷品，主要包括歌謠傳單和小書。這兩種印刷品形式在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的英國廣泛流通，是當時大眾文化、資訊傳播和娛樂的重要媒介。作為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們不僅有助於普及娛樂，還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各個層面。

歌謠傳單和小書通常由行走小販攜帶，穿行於鄉村小鎮並沿途叫賣。這些印刷品價格低廉，便於攜帶，內容包羅萬象，涵蓋從當時的熱點事件（如謀殺案、海難等）到新創作的歌曲、民間故事、傳說等。它們以大眾為主要受眾，尤其是平民百姓，並且常常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道德觀念及娛樂需求。

形式上，歌謠傳單通常是單面印刷的大型紙張，而小書則是小型、廉價且簡單裝訂的書籍。小書通常由數頁單張對折後釘在一起，名稱「chapbook」源自其販售者——巡迴小販（chapmen）。相比歌謠傳單，小書的內容更為多樣，除了傳統的民間故事、童話、騎士傳奇，還包括幽默故事、占星術、預言書、實用指南（如醫藥偏方）以及縮寫版的古典文學等。這些小書是當時許多普通民眾接觸到的唯一讀物，對平民文化的發展以及識字率的提高具有深遠影響。

關於歌謠傳單與小書，學界已有許多研究面向，包括歷史學、文學研究、圖書史、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等，學者將這些印刷品視為理解英國平民生活、識字文化以及資訊流通方式的寶貴史料。³⁸ 回顧文獻，歌謠傳單與小書的研究趨勢已從單純的文獻整理，轉向更全面的社會文化分析，本研究則選擇從較少人關注的材質問題切入。至於主題內容更深入的詮釋解讀，除已有文獻研究外，懷特出版品的專題深究則有待他日，非本論文

³⁸ Broadside 與 chapbook 的研究橫跨多個學術領域，早期的研究文獻主要致力於文獻的編目和收藏。如 Robert W. Malcolmson, *Life and Labour in England 1700-178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大量引用 broadside 民謠來重建 18 世紀的社會生活，特別是底層勞工的文化與心態。20 世紀中葉後，學者們開始深入探討這些印刷品的內容、生產與流通。Margaret Spufford, *Small Books and Pleasant Histories: Popular Fiction and its Readership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Methuen, 1981) 詳細分析 chapbook 的內容和其讀者群，闡明了 17 世紀識字文化在不同社會階層中的普及程度。她認為 chapbook 提供的娛樂和知識，遠比當時主流精英文化所認為的更為複雜和有意義。近代學術研究則更聚焦於 broadside 和 chapbook 的物質性、社會功能和文化影響。學者不再僅僅將它們視為「低俗」或「通俗」的讀物，而是將其視為理解社會動態的關鍵。David Vincent, *The Rise of Mass Literacy: Reading and Writing in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2000) 探討識字率的發展，並將 broadside 和 chapbook 視為大眾媒體興起的前身。Lesley A. Hall, *The Chapbook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History of an Unlikely Success* 從出版商和販賣者的角度，探討這些小型印刷品的商業模式和文化經濟。Tessa Watt, *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 1550-16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則深入研究了宗教改革時期，這些印刷品在傳播新教思想和塑造平民信仰方面的作用。近年來，學界對英國民謠傳單的研究，逐漸由書目與文本分析，擴展至圖文關係與通俗視覺文化的探討。Sheila O'Connell 於《*The Popular Print in England 1550-1850*》(1999) 中，系統性地梳理民謠傳單在通俗印刷文化中的圖像使用，指出木刻圖像在吸引讀者與形塑敘事理解上的關鍵功能。Fumerton 與 Guerrini 編《*Ballads and Broadside in Britain, 1500-1800*》(2010)，以及《*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2016 年專號〈*Living English Broadside Ballads, 1550-1750*〉，則進一步從跨學科角度探討民謠傳單的生產、流通與接受情境，強調圖文配置在社會溝通中的角色。延續此一研究脈絡，Kate Bates (2013) 聚焦十九世紀犯罪民謠傳單，透過大量樣本分析其道德敘事與社會功能，凸顯民謠傳單作為通俗文化媒介的歷史意義。整體而言，相關研究已充分揭示民謠傳單在文本、圖像與社會語境層面的重要性，然對其背後所倚賴之印刷版材與工藝條件，仍相對缺乏深入的物質層面探討。

討論範圍。

本文將探索約翰·懷特及其傳人在英格蘭北部新堡一帶出版的歌謠傳單與小書，特別是那些使用木刻版畫的作品。十八、十九世紀新堡是倫敦以外第二大民謠傳單的出版地區，因此懷特出版品有高度代表性(O'Connell, 1999)。根據查恩利和多德編著的《早期木刻版畫樣本集》(以下簡稱《樣本集》)與現存懷特出版品中的木刻版畫，懷特的插畫題材可概括為以下幾類：

- (1) 裝飾與象徵物：如書首和書末的裝飾、畫框、紋章等。
- (2) 人物形象：肖像、情侶、騎士、商人、運動員、旅人、神話或傳說人物、宗教人物等。
- (3) 故事類題材：歷史故事、寓言故事、愛情故事、聖經故事、民間傳說、傳奇故事，甚至魯賓遜漂流記、拇指湯姆等經典故事。
- (4) 生死主題：自殺、葬禮、臨終、棺木、處決、謀殺等。
- (5) 勞工圖像：如學徒、鞋匠等。
- (6) 船隻與旅行：包括海上航行、旅行冒險等題材。

這些題材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關注點，還展示了木刻版畫在通俗讀物中的獨特地位與功能。它們大致符合大英博物館版畫部門館員O'Connell所列英格蘭1550-1850年間的民間流行版畫常見主題：宗教與道德、愛國主義、犯罪與處決、自然奇觀與怪物、婚姻與女性、飲酒與友誼等(O'Connell, 1999)所需圖像。以下挑選幾件具代表性的現存木雕版與印刷品為例說明，敘述採目錄式寫法，意在為每件作品做詳實記錄。

(一) 裝飾與象徵物：章首裝飾圖(Headpieces)、章末裝飾圖(Tailpieces)、畫框、紋章等

章首與章末的裝飾圖案位於書籍章節的開始與結束處，通常位於每章的第一頁上端(章首)或最末一頁下方(章末)。這些圖案的主要功能是標示章節的開端與結束，並為書頁增添視覺美感。由於這些裝飾圖案不具特定的象徵意義，通常只是純粹的裝飾性元素，因此同一木雕版常被反覆使用，並出現在不同的書籍中，其使用頻率通常高於其他類型的木刻版。

這類裝飾圖案的形式多樣，包括人物、動物、植物等，並且沒有固定的規範。其目的是為了增強書籍的視覺吸引力，並在內容的呈現上帶來節奏感。

章首裝飾：頭像圖案

在《樣本集》頭幾頁，多德與查恩利收錄了若干書籍版面頂端的裝飾圖，其中首

幅插圖展示了一個圓形的圖框，中央為捲髮青年頭像，左右兩側分別繪有以「兩個朋友與熊」為主題的寓言故事。這類頭像圖案常見於歌謠傳單和小書的章首裝飾中，作為一種視覺引導。[圖1]

杭廷頓圖書館所藏的阿姆斯特壯木刻版第89號[圖2]，經過仔細分析木雕版與印製圖像的尺寸(紙張在濕度變化下會略微縮小)，並結合木版右邊緣與左下角的破損情況(反向印刷使得紙本顯示為左邊緣和右下角)，可證明該木刻版即為多德書中這幅插圖的印刷版。

該木刻版似乎由兩塊不同厚度與大小的木頭黏合而成，木版的上部較為寬闊，底部則較為狹窄。這種特徵可見於許多同時期製作的版畫用木版，推斷是為了適應印刷機的印台空間而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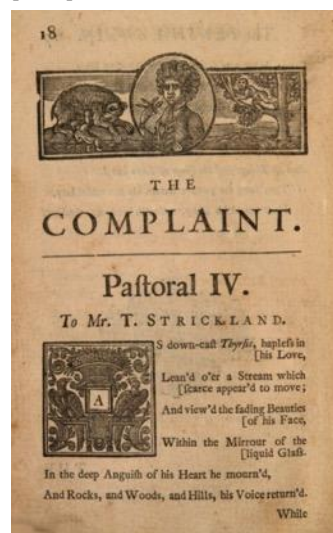
這幅木刻版圖案首次出現在艾薩克·湯普森 (Isaac Thompson) 所著《詩集：偶作數題》(*A Collection of Poems, Occasionally Writ on Several Subjects*) 一書中，該書由約翰·懷特於 1731 年在新堡出版。這一木刻版畫在該書中重複出現，分別位於第 18、35、93 及 99 頁。[圖 3]



[圖 1] Dodd 1:1



[圖 2] Armstrong woodblock 89, 31(26)×81×23 (5+18) mm



[圖 3] Isaac Thompson, *A collection of poems, occasionally writ on several subjects*, published in Newcastle upon Tyne by John White, 1731, p. 18.

(二) 人物：政治人物肖像、夫妻、騎士、商人、運動員、旅人、神話或傳說人物、宗教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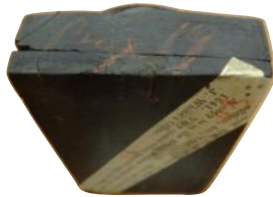
伊莉莎白女王頭像

在查恩利與多德編纂的《樣本集》標題頁上印有伊莉莎白一世女王的半身像[圖4]，這幅畫作展示了女王身著華服、頭戴王冠，手持權杖，肖像置於一個橢圓形的畫框中，並鐫刻有「ELIZABETH A REGINA」（伊莉莎白女王）的字樣。這幅版畫不僅出現在查恩利1858年版《樣本集》第59:8頁和多德1862年版第65:6頁，還出現在懷特出版的《最負盛名的伊莉莎白女王及其寵臣埃塞克斯伯爵傳：浪漫史詩》（*The History of the most renowned Queen Elizabeth, and her great favourite, the Earl of Essex. In two parts. A romance*, Newcastle: J. White, 1765）一書的標題頁中[圖8]。此外，這幅女王肖像還出現在較早的民謠傳單《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結合；亨利七世與愛德華四世之女聯姻》頁首（*The Union of the Red Rose and the White; by a Marriage between King Henry VII. and a Daughter of King Edward IV*, 1750年？）[圖7]。由於圖上附加文字，限制了這塊木雕版只能用於與伊莉莎白女王相關歷史故事或傳說的印刷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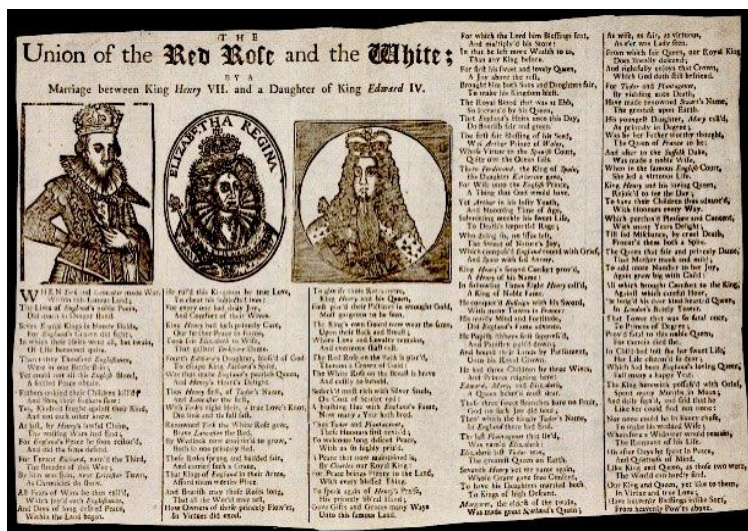
此圖原版為阿姆斯壯第80號木雕版，該木雕版是由兩塊不同厚度的木板合併而成[圖5, 6]，其中較薄的木片使用釘子固定在較厚的木板上，並且在背面斜貼有印刷標籤，標籤上記載了如下文字：「伊莉莎白女王古樸橢圓版畫，用於首版四開本。大英博物館藏有此版畫複本，用於1641年版本。極其古雅的遺物，首版複刻頁，出自J.懷特工作室。」這段文字推測是由阿姆斯壯所附。另外，木板底部以紅粉筆標註「第19頁」，這也顯示出該版畫作為印刷品的使用記錄。木板的邊框左側（即印刷品右側）幾乎被切除，而頂部中央「ELIZABETH」字母中的A、B、E、T處的斷裂痕跡，紙本與木版相符，進一步證實這塊木雕版是實際用於印刷的原版。



[圖 4]Dodd 65:6



[圖 5, 6] Armstrong woodblock 80, 82×57×23 mm



[圖 7] (左) Broadside Ballad: "THE / Union of the Red Rose and the White; / BY A / Marriage between King Henry VII. and a Daughter of King Edward IV." (1750?)(Huntington Library) EBBA 32506

[圖 8] (右) *The History of the most renowned Queen Elizabeth, and her great favourite, the Earl of Essex. In two parts. A romance*, Newcastle: J. White, 1765.

貴族青年

多德在《樣本集》第46頁的第1幅插圖[圖9]中，描繪了一位貴族青年站立於室內，姿勢端正，一手插腰，一手持杖，身穿十七世紀貴族服裝。由於這位青年並無特定身份或背景，因此這幅木刻版畫常被重複使用，並且出現在多部不同的歌謠傳單和小書中，其中包括以下兩篇民謠：

- 《薩福克奇蹟》（*The Suffolk Miracle*）[圖12]：故事講述一位年輕人在死後顯靈，顯現給他心愛的女子，並背著她行走四十英里，僅花了兩個小時。此後，他再也未現身，唯見其長眠於墓中。此歌謠由約翰·懷特於新堡出版。³⁹
- 《尊貴領主的殘酷》（*The Noble Lord's Cruelty*）[圖13]：這篇故事講述了一位美麗的淑女與一位彬彬有禮的騎士之間的真愛，被殘酷父親拆散的故事。該民謠也由約翰·懷特印刷並販售。⁴⁰

此圖是由阿姆斯特壯木刻版第31號所製作[圖10, 11]，該木刻版由兩塊厚度和大小不一的木片組合而成。刻有圖案的上方木片較薄，且右側有破損，這些破損反映在印刷紙本的左側框線上。下方的木塊較厚，且質地較粗糙，這種木材處理方式推測是為了用較佳材料雕刻圖像，佐以其他木材墊底的製版考量。

³⁹ <https://ebba.english.ucsb.edu/ballad/32464/image>

⁴⁰ <https://ebba.english.ucsb.edu/ballad/31118/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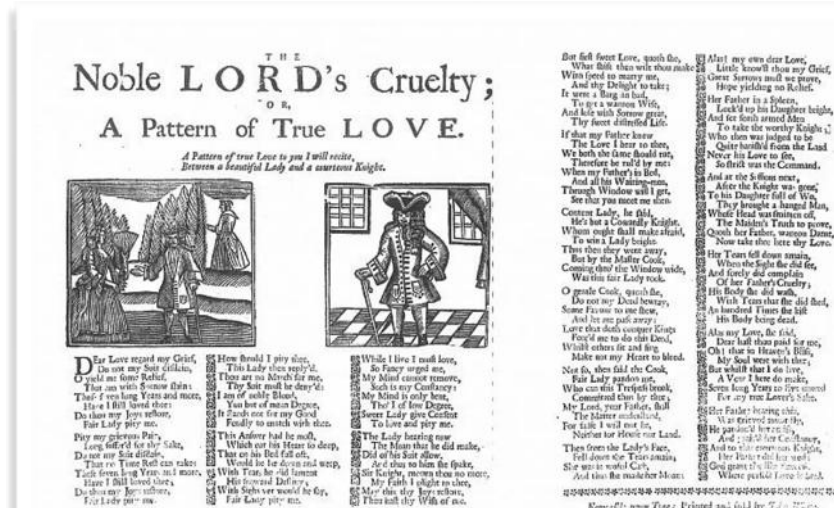
[圖 9]Dodd 46:1



[圖 10, 11] Armstrong Woodblock 31, 73×73×20 mm



[圖 12] The SUFFOLK MIRACLE; / OR, / The Relation of a young Man, who after his Death appeared to his / Sweet-heart, and carried her behind him Forty Miles, in two Hours Time, and / was never seen after, but in the Grave. Newcastle upon Tyne: Printed and Sold by JOHN WHITE. 1725-1769? (Huntington Library HEH 289741) EBBA 32464



[圖 13] THE / Noble LORD's Cruelty; / OR, / A Pattern of True LOVE. / A Pattern of true Love to you I will recite, / Between a beautiful Lady and a courteous Knight, Newcastle upon Tyne: Printed and sold by John White. 1725-1762? (British Library – Roxburghe C.20.f.9.426-427) EBBA 31118

夫妻

多德的《樣本集》第 61 頁展示了一幅雙人肖像[圖 14]，畫中是一對戀人，兩人置於圓形構圖內，並由一個方形畫框環繞。此插圖來自於阿姆斯壯木刻版塊 719 號[圖 15, 16]，現藏於杭廷頓圖書館。這塊木版非常特殊，它沿中線被水平剖開為兩片，並由兩小木片在背面固定，以保持完整。木版背面中央有一個圓形孔洞，孔洞的用途目前尚不清楚。

這塊木雕版由四部分拼湊而成，這使得木版具有可拆卸與重組的特性，這種設計可能是為了提高雕刻與印刷的效率，是機械時代之前的一種早期工法。在那個時代，這樣的工藝方式顯示了印刷行業在追求速度與效率方面的一些創新。

阿姆斯壯在其目錄中將這幅插圖命名為「頭頂有丘比特之淑女與紳士」與「奧蘭治的威廉與英格蘭的瑪麗」，顯示這塊木刻版既可以用於政治宣傳，也適用於婚姻與愛情主題的插畫。它不僅能夠描繪浪漫愛情故事，還能在雙王制時期作為政治象徵，表達對君主的敬意或支持。

筆者查證發現，這塊版畫曾用於新堡小書《宮廷侍從，或新式愛情》（*The Courtier, or A New School of Love*）[圖 17]以及《波妮佩姬的歌曲集》（*Bonny Peggy's Garland*，新堡，約 1760 年）[圖 18]的標題頁。這些書籍的內容或圍繞戀愛、婚姻或宮廷生活，這塊木刻版畫的使用恰如其分地配合了書中的主題。木版與紙本中央的橫向切割線，證明兩者的確切關係。



[圖 14] Dodd 61:2

[圖 15, 16] Armstrong woodblock 719, Huntington Library, 74×74×23 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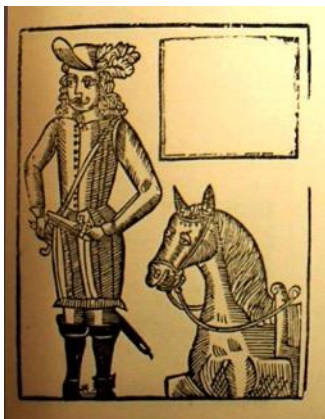
[圖 17] *The Courtier, or A new School of Love*, Newcastle [圖 18] *Bonny Peggy's Garland*

紳士肖像

在多德的《樣本集》第 8 頁左下角，展示了一幅描繪一位戴帽、持槍與劍的紳士佇立於馬旁的圖像[圖 19]。此木刻版現藏於大英博物館。該木版的左上角留有空白窗格，可供嵌入不同文字，這一設計讓它可以根據不同的印刷需求，靈活運用於各種作品中。[圖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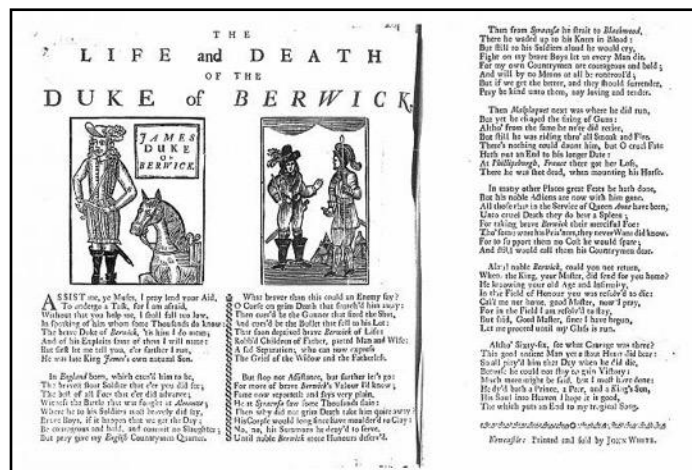
這幅木刻版曾出現在約翰·懷特的民謠傳單《貝里克公爵之生與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Duke of Berwick*）[圖 21]，以及安格斯母子出版的小書《英格蘭大盜詹姆斯·欣德船長的歡愉人生與瘋狂壯舉》（*The Merry Life and Mad Exploits of Capt. James Hind, the Great Robber of England*）[圖 22]的標題頁上。

這塊木刻版經歷了長時間的使用，並顯示出漸進式的損毀，不同版本的印刷品反映出木刻版的損壞情況。約翰·懷特版本的木刻框架保持完整，而在安格斯版本以及多德的《樣本集》中，版畫的右側已經出現斷裂。這種破損狀態在大英博物館藏的木雕版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證明了該木刻版在多次使用中逐漸老化。



[圖 19] Dodd 8:4

[圖 20] British Museum 2000,0723.10, 90×71 mm



[圖 21] (左)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Duke of Berwick*, Newcastle: Printed and sold by John White. EBBA 31056

[圖 22] (右) *The merry life and mad exploits of Capt. James Hind, the great robber of England.* (Newcastle: Printed by and for M. Angus & Son, in the Side [s.a.])

商人圖像

在多德的《樣本集》中的第 11 頁 (11:1)，我們可以看到一幅描繪商隊的圖像[圖 23]。這幅插圖來自於湯瑪斯·德洛尼 (Thomas Deloney) 所作的《雷丁托馬斯的故事》 (*The History of Thomas of Reading*)，一本發表於約 1600 年的英國早期小說，該書結合了歷史、傳奇與道德教訓，主要講述英國早期羊毛業興起的故事。約翰·懷特約 1711 年印製的版本標題頁使用了這張插畫[圖 26]。

《雷丁托馬斯的故事》講述的是托馬斯，一位來自雷丁一地的羊毛織布商人。他是一位富有且勤奮的中產階級商人，與幾位來自不同城市的布商共同組成一個忠誠且互助的兄弟會。這本書展示了英國早期工匠精神的興起及中產階級的崛起。托馬斯的故事中也充滿了悲劇，他因愛上一位美麗的女子而招致旅館老闆娘的忌妒，最終遭受謀害，成為一個悲劇性人物。

這幅商隊插圖，作為《雷丁托馬斯的故事》中的標題頁插圖，具有獨特的構圖。圖中主要人物是三名騎馬的商旅，畫面中心是主角托馬斯，他正騎在馬上，並以正面角度呈現。托馬斯的左右分別是兩位騎著黑白馬的商人，他們脫帽向托馬斯致敬。下方是環狀的道路，商隊列隊行走，運送著貨物，明確地表現出商隊的主題。

這幅圖的原始木刻版是由阿姆斯特壯的第 23 號木雕版印製[圖 24, 25]。木板背面附有一塊薄木片，目的是增高木板的厚度，顯示了早期的製作工藝。該木刻版的上下邊框已有明顯的缺損，顯示木刻版在長時間使用後的磨損。儘管如此，根據查恩利與多德的《樣本集》，這幅插圖的版本在十九世紀仍保持相對完整，可見木雕版在十九到二十世

紀期間有持續破損的狀況。這說明這些木刻版曾被反覆使用，並且在每次印刷後會出現破損，尤其是木板的邊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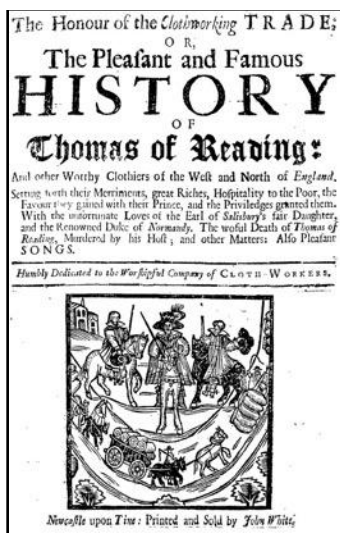
這幅描繪商隊的圖像不僅是一個商業故事的插圖，更是對當時中產階級興起的象徵。圖中的商人騎馬、行進於道路上的畫面，體現了當時社會中商業活動的普及和重要性。在藝術成就上，看似粗糙的圖像卻運用了經典圖像的對稱與前縮技法，不可小覷。



[圖 23] Dodd 11:1



[圖 24, 25] Armstrong woodblock 23, Huntington Library, 78×80×22 mm



[圖 26] Deloney, Thomas (1543?-1600), *The honour of the clothworking trade; or, the pleasant and famous history of Thomas of Reading*, Newcastle upon Tine: printed and sold by John White, [1715?].

旅人圖像

多德的《樣本集》第 10 頁 (10:4) 有一幅描繪旅人的圖像[圖 27]：畫面中，一位戴帽拄杖的男子站立於原野之上，身穿十七至十八世紀典型的旅行者裝束。這幅插圖的形象並沒有特定的身份背景，而是呈現了一位典型的旅行者或流浪者，這樣的圖像在當時的文化中是常見的。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旅行者、流浪者以及其象徵意義的關注。這些人物通常被視為跨越社會階層和地域的存在，無固定身份，象徵著流動、冒險和不確定性。

此圖的印製原版來自阿姆斯特壯的第 34 號木雕版[圖 28, 29, 30]，根據阿姆斯特壯的目錄記錄，圖中人物穿著十七世紀的服裝，這可能表明該圖是從老約翰·懷特工作室的圖像中繼承而來。木刻版的左側畫框已經被切斷，並且木版的背面右緣呈斜切狀，頂部與底部均顯示出多處裂紋，這些細節表明該木版已經經過多次使用，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歷了相當程度的損耗。

這幅圖不僅出現在多德的《樣本集》中，還見於約翰·懷特在新堡出版的多個出版品中。這些出版品包括歌謠傳單《人類的年歲與生命》（*The age and life of man*）[圖 31]以及小書《新歌曲集：包括無名之輩等》（*A Garland of New Songs, containing 1. Nobody, ...*）[圖 32]。由於這幅圖中的人物並無明確的身份設定，它可以適用於多種不同的文字內容，無論是關於「人類的生命週期」還是描述「無名小卒」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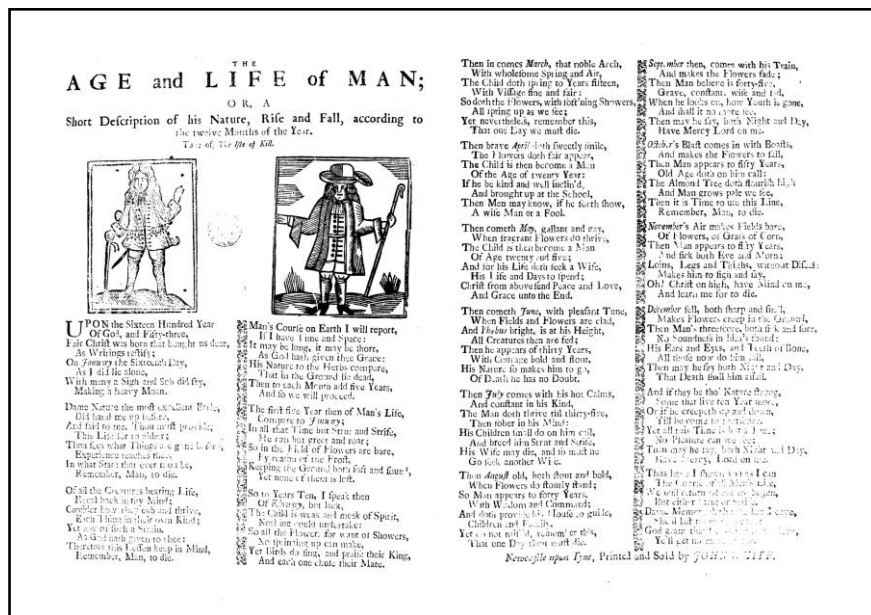
這些情境反映了當時木刻版在商業印刷中的靈活性和普遍性。沒有特定身份的旅人形象使得這幅圖可以被廣泛應用於多種文本和主題中，從道德故事到歌謠和社會描述。但正因如此，木刻版的頻繁使用也導致了顯著的損耗。



[圖 27] Dodd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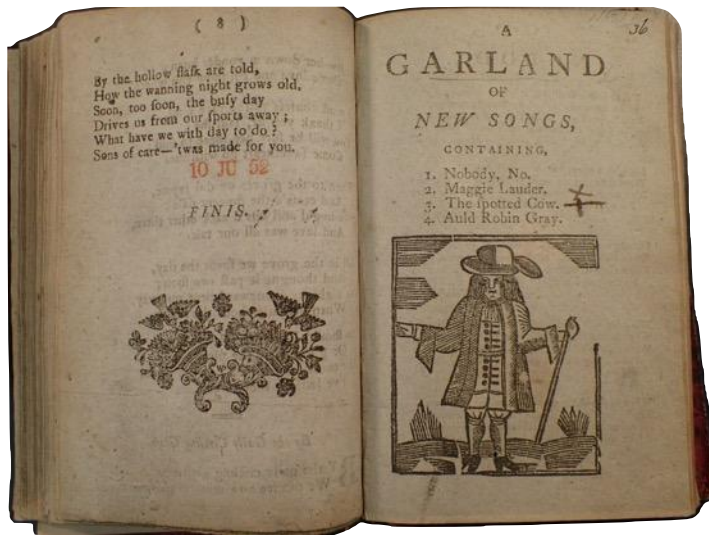
[圖 28, 29, 30] Armstrong woodblock 34, 68×58×22 mm



[圖 31]

The age and life of man; or, A short description of his nature,

rise and fall, according to the twelve months of the year; Newcastle upon Tyne, Printed and Sold by John White. (British Library L.R.31.b.19.(27))



[圖 32] *A Garland of New Songs, containing 1. Nobody, ...* Newcastle, 1790? (British Library 11621.a.3.(36.))

(三) 故事類題材：歷史故事、寓言故事、愛情故事、聖經故事、民間傳說、傳奇故事，
《魯賓遜漂流記》、拇指湯姆等經典故事。

歷史故事—埃莉諾王后 (Queen Eleanor)與珍·蕭爾(Jane Shore)

多德《樣本集》30:2 頁的插圖描繪了三名身著宮廷服飾的貴族人物，站立於三個拱門下[圖 33]。此圖的原版來自阿姆斯特壯第 158 號木雕版[圖 34, 35]，並與多德所印的版本相符。該木刻版的左、右框線均已斷裂，與紙本相符，證實為原版，也反映了其經歷多次使用和損壞。這幅圖出現在多個故事中，主要涉及兩位歷史人物：十三世紀的埃莉諾王后與十五世紀的珍·蕭爾。這兩位人物均在民間傳說中被戲劇化，且經過虛構化和道德化的處理。



[圖 33] Dodd 30:2



[圖 34, 35] Armstrong woodblock 158, 59×71×23 mm

埃莉諾王后—驕傲與懲罰的警示

埃莉諾王后的故事出現於約翰·懷特在新堡出版的民謠傳單《對英格蘭驕傲與邪惡的警示篇》(A Warning Piece to England against Pride and Wickedness) [圖 36]⁴¹中，該故事將埃莉諾王后描繪為一個因驕傲和邪惡而受上帝懲罰的反面教材。故事內容並非歷史事實，而是基於對王后形象的戲劇化塑造，目的在於警告英格蘭人民避免驕傲與惡行。

根據該民謠，埃莉諾王后因為其驕傲而受到神的審判，在查令十字(Charing Cross)地點被吞噬，沉入地下。隨後，她又在女王碼頭(Queenhith)處重生，這一事件被解釋為神蹟般的救贖。儘管此傳說與歷史無關，但它利用超自然的元素吸引民眾，並通過這一故事反映了當時社會對權力、道德和女性角色的看法。(Ashton, 1882)

埃莉諾王后是西班牙的卡斯蒂爾(Castile)王國出身，這一背景可能使她在當時的英格蘭社會中處於一種文化和民族的邊緣地位。民間的排外情緒可能促成了對她的貶低，並使她的形象遭污名化。此外，這一傳說可能也反映了十八世紀人們對當權者的批評，特別是那些與當時社會結構有所衝突的統治者。



[圖 36]

A Warning Piece to England against Pride and Wickedness: Being, The Fall of / Queen Eleanor, Wife to Edward the First, King of England, who for her Pride, and God's Judgments, sunk into the Ground / at Charing-Cross, and rose up with Life at Queen-hith. Newcastle upon Tyne: Printed and Sold by

JOHN WHITE.
(Huntington Library)
EBBA 32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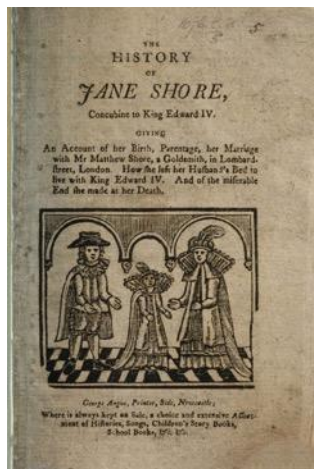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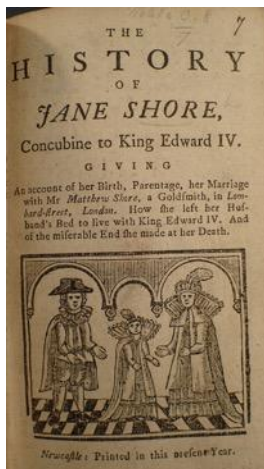
珍·蕭爾的故事—愛情與悲劇

這幅插圖重覆出現在約翰·懷特及其後繼者安格斯家族出版的民謠小書《珍·蕭爾傳：愛德華四世王妃之生平》中(《The History of Jane Shore, concubine to King Edward IV》)[圖 37, 38]。該書講述珍·蕭爾的出身與家庭背景，及其與倫敦金匠馬修·蕭爾的婚姻，並記錄了她如何離棄丈夫，投身於英格蘭國王愛德華四世的懷抱。故事中，她在王宮中享

⁴¹ <https://ebba.english.ucsb.edu/ballad/32510/image>

受奢華，然而，當愛德華四世去世後，理查三世即位將她視為道德敗壞的象徵。她被迫遊街懺悔，最終在寒冷與飢餓中死去，遺體被丟棄於倫敦貧民窟的臭水溝，這一地點後來被稱為「蕭爾溝」（Shoreditch）。

該故事雖廣為流傳，實則並非歷史事實。珍·蕭爾在史實中並未像傳說所言悲慘結局，而是再婚並安享晚年。民謠中的版本極可能是都鐸時期為醜化理查三世形象所創作的虛構故事，旨在抹黑其統治形象，並透過誇大其手段以達到道德警示的效果。(Ashton 1882, 393-95)



[圖 37] *The History of Jane Shore, concubine to King Edward IV*, Newcastle, 1785?

[圖 38] *The History of Jane Shore, concubine to King Edward IV*, Newcastle: George Angus

這幅木雕版圖像顯然與《珍·蕭爾傳》或《埃莉諾王后》故事的具體內容並不完全吻合。從這點可以推測，約翰·懷特在使用這些插畫裝飾印刷品時，常非根據故事內容量身定制插圖，而是經常回收並重複使用手頭已有的舊版畫。這些版畫主要考慮的是提供一個粗略的宮廷背景，而人物形象則留給讀者自由解釋。這種方式無需過多關注細節，重點在於為讀者提供視覺上吸引人的元素，以迎合當時普羅大眾對於娛樂性、簡單而直觀的內容需求。

此外，木雕版的損毀過程也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版畫使用狀況。從早期懷特出版的民謠傳單中可以看到，最初的木刻版畫外框完整，而隨著時間推移，特別是在 1785 年左右由懷特的繼承人湯瑪斯·聖所出版的小書中，版畫的左右下角開始顯現破損，直到安格斯家族繼續出版同主題的小書時，版畫的損壞情況更為嚴重，這一變化與查恩利和多德的《樣本集》紙本及木雕版現狀相符，顯示出版畫在長期使用中的磨損及時間的痕跡。

多德《樣本集》24:1 收錄的插畫同樣描繪了埃莉諾王后的故事[圖 39]。約翰·懷特將它用於其民謠傳單《埃莉諾王后的自白》（*Queen ELEANOR's Confession*）[圖 41]，該傳單講述了埃莉諾王后在臨終前因悔過而召來法國修士，但亨利二世國王懷疑後假扮

修士來聽她的告解。她在告解中揭露自己有私生子，並且曾毒死國王的情婦「美貌羅莎蒙」(Fair Rosamund)。(Fair Rosamund)。這一故事情節也成為另一張懷特出版的民謠《不幸的妾室；或，美貌的羅莎蒙的覆滅》(*The unfortunate concubine; or, Fair Rosamond's overthrow*)[圖 42]的主題，並搭配了相同的插畫。

這幅圖的印刷原版是阿姆斯壯第 50 號木雕版[圖 40, 41]，畫面中刻畫了王后命令妾室喝下毒酒的情節。該木版由兩塊木片疊合而成，上方的木塊較厚，下方附加了一塊薄木片。版畫的使用痕跡顯示出其高頻率的使用，木版的左側、右上角、頂部和右側均有裂痕，並且頂部曾以釘子修補過，但這些修補反而造成了新的裂痕。此外，頂框、底框和左框均有缺損，這些損壞情況反映了這塊木雕版的長期使用與頻繁的印刷需求，也顯示這個故事受歡迎的程度。



[圖 39] Dodd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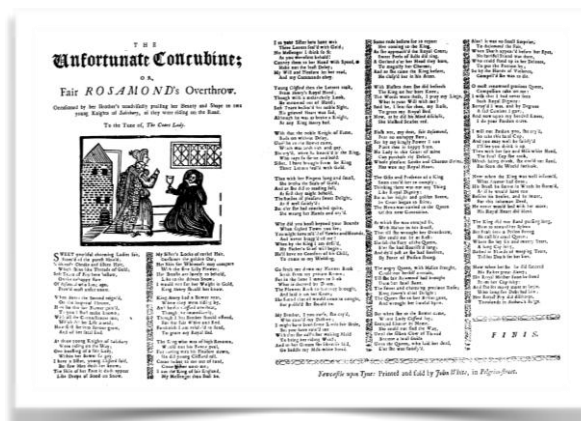


[圖 40, 41] Armstrong woodblock 50, 72×96×23 mm



[圖 42] (左) *Queen ELEANOR's Confession*,

Newcastle upon Tyne: printed and sold by John White. (British Library)



[圖 43] (右) *The unfortunate concubine; or, Fair Rosamond's overthrow*, Newcastle upon Tyne: printed and sold by John White, in Pilgrim Street. (British Library)

民間故事

在約翰·懷特出版的小書中，許多屬於英國民間流行的傳說故事被廣泛收錄，這些故事往往具有強烈的地方色彩和娛樂性，並且在當時的社會中口耳相傳，深受普通百姓的喜愛。這些故事多以口語化的形式流傳，並且往往伴隨插畫，用以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以下是其中一些經典的民間故事：

- 傑克與巨人 (Jack and the Giants)：這是一個描述年輕的傑克如何戰勝巨人的故事，包含勇氣與智慧的傳奇元素。
- 湯姆·特蘭姆的瘋狂惡作劇 (Tom Tram's Mad Pranks)：一個關於湯姆·特蘭姆和他瘋狂惡作劇的幽默故事，展示了英國民間對無厘頭幽默的熱愛。
- 魯濱遜漂流記 (Robinson Crusoe)：這個故事講述了主人公魯濱遜在荒島上的孤獨生活與生存奮鬥，雖源自丹尼爾·笛福的小說，但經常以民間流傳版本出現。
- 樹林中的兩個孩子 (Two Children in the Wood)：這是一個悲劇性的故事，講述了兩個孩子被親戚陷害後，最終在森林中死亡的故事，充滿了道德教訓。
- 傻西蒙的不幸事件 (Simple Simon's Misfortunes)：這個故事描述了一個憨厚的男孩西蒙，他在生活中總是陷入一連串的麻煩與不幸。
- 貝茨曼的悲劇 (Batesman's Tragedy)：一個關於失落與背叛的悲劇故事，描述貝茨曼的命運如何因家庭或愛情的悲劇而改變。
- 希普頓婆婆 (Mother Shipton)：這個故事圍繞著英國傳說中的女預言家希普頓婆婆，她預言未來並揭示許多關於命運與人類行為的智慧。

這些故事大多具有豐富的象徵意義，往往以英雄或反英雄的形象來傳達某些道德或社會價值，不僅是娛樂性質的文本，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由於這些故事充滿娛樂性和富有教育意義，它們在當時成為了非常受歡迎的閱讀材料，並且通過小書和民謠傳單的形式普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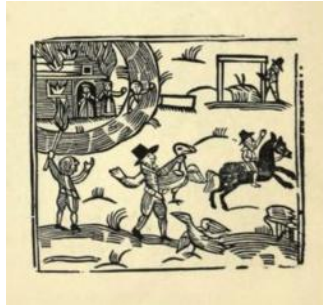
湯姆·崔姆的瘋狂惡作劇 (*Mad Pranks of Tom Tram*)

《湯姆·崔姆的瘋狂惡作劇》是約翰·懷特出版的一本充滿幽默和諷刺的民間故事，故事通過湯姆·崔姆這一角色展示了各種無厘頭的惡作劇和滑稽行為。

多德《樣本集》中的 41:4 插圖專門描繪了湯姆·崔姆的這些惡作劇[圖 44]，這幅插畫出現在上述懷特在新堡出版的小書標題頁[圖 47]。插圖生動展現了湯姆製造混亂的場景，從左側的放火燒屋，到右上角暗示他在糧倉或磨坊中偷吃或惡作劇，再到下方他抓著火雞的畫面，並描繪了其他人對湯姆的行為感到驚訝的場面。整體畫面充滿了動感，場面混亂且充滿歡樂的氛圍，顯示出湯姆崔姆的幽默本質與他挑戰社會規範的行為。

這幅插畫的印刷原版是阿姆斯特壯第 15 號木雕版[圖 45, 46]，這塊木板呈深色且已有些陳舊，背面固定著兩塊小木片，左上框架有明顯的破損，下方框架和背面則有裂痕，顯示出這塊木雕版經過多次使用。這些細節也揭示了懷特出版物的流行性和長期的市場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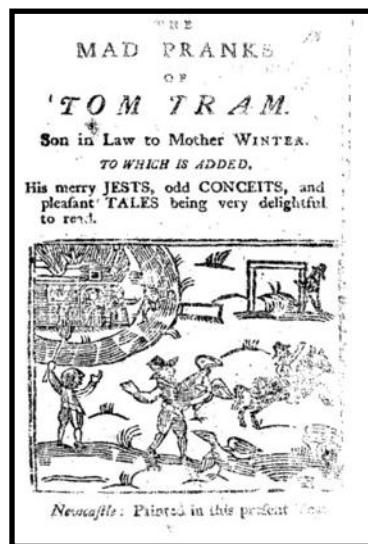
這個故事不僅是純粹的娛樂，也在某種程度上對社會秩序進行了隱晦的反思。湯姆·崔姆作為一個顛覆常規的角色，通過其瘋狂的惡作劇和詼諧的情節，對當時的道德、行為規範以及權威進行了戲謔與挑戰，這樣的故事風格反映了十八世紀民間文化中的幽默感與對權威的懷疑。



[圖 44] Dodd 41:4



[圖 45, 46] Armstrong woodblock 15, Huntington Library, 69×80×22 mm



[圖 47] The mad pranks of Tom Tram. Son in law to Mother Winter. To which is added, his merry jests, odd conceits, and pleasant tales being very delightful to read. Newcastle : printed in this present year, [1775?].

魯賓遜漂流記 (Robinson Crusoe)

在多德的《樣本集》第 13 與 14 頁[圖 48, 49]中，展示了新堡安格斯家族出版的丹尼爾·笛福著作《魯賓遜漂流記》（*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由 M. Angus & Son 出版，約 1800 年）的插圖[圖 50, 51]。



[圖 48, 49] Dodd13, 14

這些插圖的原版是阿姆斯特壯木雕版系列之一，其中五塊木雕版專門用於該書的插圖。編號為 161 的木雕版[圖 51]特別用於書籍的扉頁或卷首插圖[圖 52]。這塊木雕版具有顯著的損壞跡象，左側呈現一道大裂紋，橫跨木板的中央，右側則有兩道裂痕，其中一道裂痕位於底部。這些裂痕在安格斯（約 1800 年）和多德（1862 年）所印製的紙本版本中可見，且木雕版的狀況隨著時間的流逝已逐漸惡化，裂紋擴大，並且木板呈現彎曲。這些損壞反映了木雕版在長期使用過程中的磨損情況，且顯示出該插圖在各時期的重複印刷過程中遭遇的物理損傷。

阿姆斯特壯第 162 至 165 號木雕版[圖 53-56]的印刷作品分別出現在上述書中第 20、9、17 與 4 頁（其中第 162 號版印於多德《樣本集》56:1）。各插圖皆為近正方形，外框採雙層設計，尺寸大致一致。第 163 號版背面另貼有三片薄木板以增厚。

《魯賓遜漂流記》在十八世紀的英國至少出版了數百個版本，包括正規、改編及非官方版本，是當時最暢銷、重印次數最多的書籍之一。以兒童為主要讀者的改編小書更是數量繁多。新堡版本中的多數插畫，實為倫敦版本的翻刻版，反映了城鄉文化的傳播與呼應。



由左至右：[圖 50] Dodd13:1；[圖 51] Armstrong woodblock 161, Huntington Library, 130×78×21 mm；[圖 52]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M. Angus & Son, 1800?



[圖 53-56] Armstrong woodblocks 162, 163, 164, 165, 大致為 63 × 70 × 22 mm

拇指湯姆 (Tom Thumb)

拇指湯姆是十七世紀以來英國民間流傳的童話故事，描寫一名身形極小的男孩歷經各種奇異遭遇、磨難與英勇行為，兼具教育與娛樂功能，為兒童常讀之作。多德《樣本集》中有三張與此故事相關的插畫（25:3、25:4、49:7）[圖 57, 62, 64]，皆出自新堡安格斯母子印刷店所出版的小書《美麗的擠奶女工歌曲集》(*The Pretty Milk-maid's Garland, composed of several excellent New Songs, Newcastle*) [圖 60]及《新歌曲集》(*A Garland of New Songs, M. Angus & Son, Printers, Newcastle*) [圖 61]。其中，25:4 同時出現在兩種小書的標題頁，畫面描繪湯姆的母親正在擠牛奶，暗示故事中湯姆被吃草的牛吞入腹中的情節；25:3 刻畫湯姆在母親做飯時跌入湯碗的片段；49:7 則描繪湯姆被烏鴉叼走的場面。

這三幅插畫的印刷原版為阿姆斯特壯第 85、83 與 84 號木雕版[圖 58, 59, 63, 65]。版身老舊，由兩層木板黏合而成，表面可見多處崩裂與蟲蛀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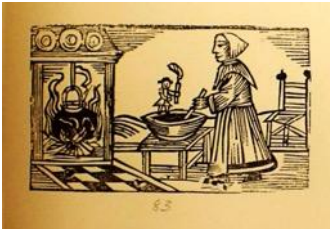
[圖 57] Dodd 25:4

[圖 58, 59] Armstrong woodblock 85, Huntington Library, 59×67×22 mm



[圖 60] (左) *The Pretty Milk-maid's Garland, composed of several excellent New Song...*, Newcastle.

[圖 61] (右) *A Garland of New Songs* (M. Angus & Son, Printers, Newcastle)



[圖 62] Dodd 25:3

[圖 63] Armstrong woodblock 83, Huntington Library, 43×74×22 mm



[圖 64] Dodd 49:7

[圖 65] Armstrong woodblock 84, Huntington Library, 43×73×20 mm

聖經多比傳民謠 (Ballad of Tobias)

多德《樣本集》21:1 [圖 66]為一張聖經敘事圖，描繪《多比傳》(*Book of Tobit*，或譯〈多俾亞傳〉)的故事。該故事出自天主教與東正教所採納的《舊約聖經》，但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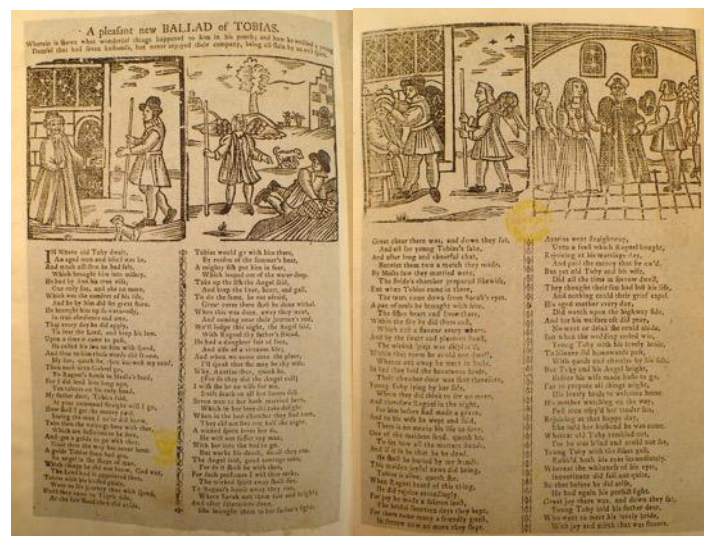
收入新教聖經，因此在英國新教政府統治下，衍生成為民間傳說版本。其內容講述一個被放逐至亞述的以色列家族父子的經歷。版畫場景呈現多比向父親辭行，準備外出為父討回公道，並在旅途中獲得天使的協助。畫中，多比頭戴帽、手執行杖，身旁隨行一犬，面對門前著長袍、蓄鬚的父親，正欲啟程告別。門上刻有「A Guy」字樣，可能為雕工署名，以有別於倫敦版本。

此圖由阿姆斯特壯第 18 號木雕版印製[圖 67, 68]。木板在印刷初期即有蟲蛀痕跡，於現存紙本與木雕版上清晰可見，顯示懷特使用的板材相當老舊，可能為其父老約翰·懷特（John White Senior）所遺留。木板上緣嵌有一枚三角形木片，以四枚釘子固定於主體，反映出懷特在製版時常以手邊邊角料拼湊再利用的習慣。目前木雕版的上緣與左側皆有裂痕，背面亦可見裂紋。

此木雕版即為新堡約翰·懷特出版之民謠傳單《多比歡樂小調》（*A Pleasant Ballad of Tobias*）[圖 69] 的印刷原版。該傳單依據十七世紀倫敦版本翻刻而成[圖 69]。雖新堡版本工藝不及都會精緻，然整體品質仍相當接近原作，反映出新堡印刷文化的優秀程度與倫敦相去不遠。



[圖 66] Dodd 21:1 [圖 67, 68] Armstrong woodblock 18, Huntington Library, 87×79×23 mm



[圖 69] A pleasant New BALLAD of TOBIAS: / Wherein is shewed what wonderful Things happen'd to him in his Youth; and how he wedded / young Damsel that had seven husbands, but never enjoyed their Company, being

all slain by an evil Spirit. Newcastle upon Tyne: Printed and Sold JOHN WHITE. 1725-1769 ? (British Library - Roxburghe C.20.f.9.514-515)



[圖 70]

倫敦較早版本

A pleasant new Ballad of Tobias: wherein is shewed the wonderfull things / which chanced to him in his youth; and how he wedded a young Damsell that had had / seven husbands and never enjoyed their company: who were / all slaine by a wicked spirit.

Printed at London for F. Coules dwelling in

the Old-Baily. 1624-1680 ?

(British Library - Roxburghe C.20.f.7.420-421) EBBA 30287

(四) 生死主題：死亡、謀殺、處決、自殺、葬禮、臨終、棺木

死亡

多德《樣本集》86–89頁所收的木刻版畫皆以「死亡」為主題。86:2 [圖71] 為一幅由骷髏化身的死神以箭刺穿男子胸膛的圖像，屬於「死亡之舞」的視覺傳統，象徵凡人終將一死的哲理。此圖出現於一張民謠傳單《午夜使者》(*The Midnight Messenger*) [圖74]，內容描述一位富翁在享盡榮華之時，忽然接獲死神降臨的警訊，悲痛悔恨，哀號不止，藉此警惕世人塵世榮耀終將歸於墳墓。圖像上方附有文字，標示人物身份為「死神」(Death)與「富翁」(The Rich Man)。此民謠約出版於1775年，印製者應為新堡的托馬斯·聖。

此圖的印刷原版為阿姆斯特壯第60號木雕版[圖72, 73]。該木板由兩塊厚度與形狀不一的木料釘合而成，上層薄木刻有圖案，置於較厚的基座木塊之上。基座質地粗糙，不宜雕刻，但上緣向外凸出，並額外鑿出三段延伸木條，形成類似祭壇畫的結構。此構造在印刷紙本上並不明顯，使該木雕版具備特殊的歷史價值。唯有同時觀察紙本與木雕版，方能理解這三段木條間的留白空間乃為嵌入文字版所設計，體現了工業革命前機器印

刷尚未普及時期，早期活字印刷的巧思與技術智慧。



[圖 71] Dodd 86:2



[圖 72, 73] Armstrong woodblock 60, 72 (63 圖像) ×65×22 (8+14) mm



[圖 74]

The Midnight Messenger; or, a sudden call from an earthly glory to the cold grave, in a dialogue between death and a rich man... (British Library)

謀殺

多德《樣本集》87:1[圖 75] 描繪一樁發生於森林中的謀殺案，這類駭人事件是民間通俗讀物中常見的題材。其印刷原版為阿姆斯特第 47 號木雕版[圖 76, 77]，版面可見嚴重破損與缺口，顯示其使用頻繁。

此圖出現在多種民謠傳單與小書中，包括一份未具名但應由約翰·懷特出版的民謠《不孝之子與殘暴之夫》(*The Disobedient Son and Cruel Husband*) [圖 78]，內容講述一名出身富裕的男子約翰·瓊斯因揮霍無度而家道中落，最終弑妻殺子，甚至親手吊死母親，並在自家門前伏法，其結局被視為對違逆親道與喪德之人的警示。

此外，該圖亦見於小書《德比郡悲劇》(*The Derbyshire Tragedy*) [圖 79]，故事以伊莉莎白·克拉克等人的悲慘遭遇為例，揭示背信棄義的男子如何導致他人與自身的滅亡，藉以警戒輕諾失信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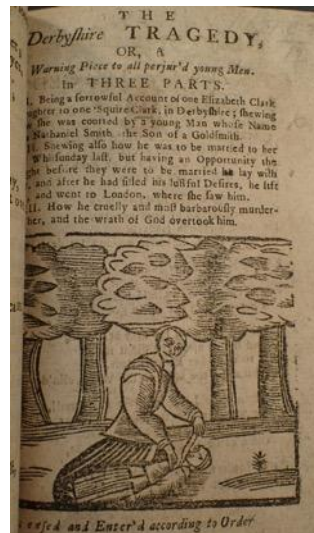
另一本收錄此圖的小書為《血腥園丁歌曲集》(*The Bloody Gardener's Garland*) [圖 80]，約 1800 年由安格斯母子印刷店出版，其中包括幾首警世歌曲，描寫一名園丁因愛生恨而釀成命案，並配以警世的情節與歌詞，延續民間歌謠警惕情慾與暴行的傳統。

該木雕版極為老舊，很可能屬於約翰·懷特最早期的印刷版之一，甚至可能傳承自其父老約翰·懷特在約克時期所製。版身由上下兩層木料黏合而成，上層薄木左右邊緣有大片缺損，且隨著印刷次數增多，損壞情況愈加明顯。木板現況脆弱，保存堪憂；筆者希望透過此處之文字與影像記錄，能為其殘存形貌留下一份文獻見證。



[圖 75] Dodd 87:1

[圖 76, 77] Armstrong woodblock 47, 80×69×22 mm



由左至右：

[圖 78] *The Disobedient Son and Cruel Husband*, EBBA 31485

[圖 79] *The Derbyshire Tragedy*

[圖 80] *The Bloody Gardener's Garland*

處決

若謀殺題材旨在以聳動情節吸引讀者的好奇心，那麼它往往也伴隨著教化與警示的意圖，藉以滿足庶民對「善惡有報」的心理期待，並呼應社會管理階層的道德訓誡。因此，相較於謀殺題材，處決場面的圖像在十八世紀民間出版物中更為常見。

多德《樣本集》87:2 [圖 81]描繪十八世紀以前典型的公眾市場行刑場景：絞刑台中央矗立，四周民眾圍觀，士兵手執武器維持秩序，周邊房舍的窗戶中亦有旁觀者注視行刑。使用此圖版的出版物除前述關於約翰·瓊斯的民謠《不孝之子與殘暴之夫》外，尚包括多種由新堡約翰·懷特出版的民謠傳單與小書。其一為《強生船長最後的絕筆》(*Captain Johnson's Last Farewell to the World*) [圖 84]，敘述強生船長因綁架女繼承人而在倫敦泰伯恩刑場被處決的事件，內容以其臨刑前的懺悔與告誡世人為主題。另一份為《惡市哀歌》(*The Lamentation of a Bad Market*) [圖 85]，藉由商業失敗與道德墮落的悲劇故事，警示貪婪與不義之報應。此外還有小書《威廉·史蒂文森的懺悔與臨終遺言》(*A Song, on the Confession and Dying Words of William Stevenson*) [圖 86]也使用此圖，故事記錄一名年輕商人因謀殺女子瑪麗·福登而在杜倫被絞死的事件，並以第一人稱口吻描述他行刑前夜的懺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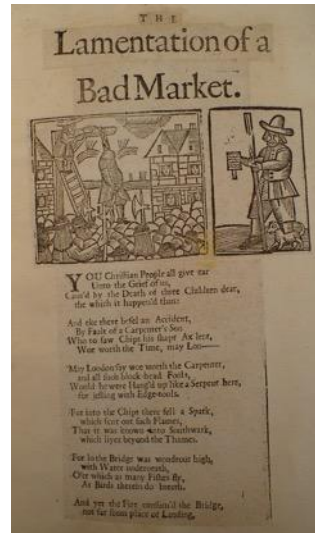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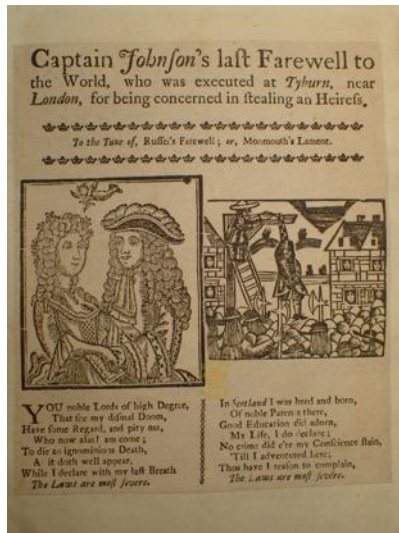
同一圖像後來亦被安格斯家族印刷店重製，用於兒童小書《給不聽話孩子的恐怖警告》(*A Dreadful Warning to Disobedient Children*) [圖 87]，以懲惡勸善的敘事形式教化孩童，延續木刻圖像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的道德教誨功能。

此圖的印刷原版為阿姆斯壯第 1685 號木雕版[圖 82, 83]。木板由上下兩層木料黏合而成，上層較薄，下層較厚，整體厚度約 18 公釐，略薄於一般木雕版的 22 公釐。木板右上角及背面底部附近可見裂痕，但整體保存狀況良好。阿姆斯壯對此版極為重視，特別為其與其他具代表性的木雕版製作了專屬精緻收藏盒，以資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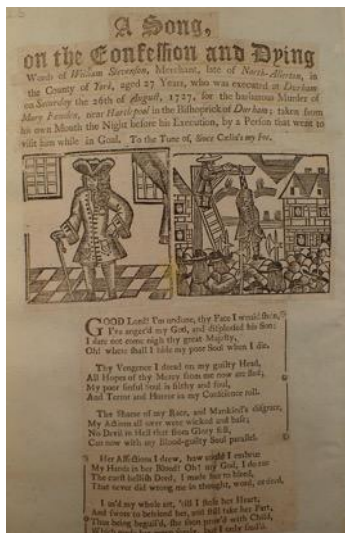
[圖 81] Dodd 87:2

[圖 82, 83] Armstrong woodblock 1685, 8×79×18 mm



[圖 84] (左) Captain Johnson's Last Farewell to / the World, who was executed at Tyburn, near / London for being concerned in stealing an Heiress. (British Library - Roxburghe C.20.f.9.786-787)

[圖 85] (右) The Lamentation of a Bad Market. (British Library)



[圖 86] (左) A Song, on the Confession and Dying / Words of William Stevenson, Merchant, late of North-Allerton, in the County of York, / aged 27 Years, who was executed at Durham on Saturday the 26th of August, 1727, for / the barbarous Murder of Mary Fawden, near Hartlepool in the Bishoprick of Durham; taken / from his own Mouth the Night before his Execution, by a Person that went to visit him while / in Goal.

[圖 87] (右) A Dreadful Warning to Disobedient Children

自殺

多德《樣本集》24:7[圖 88] 描繪一名年輕男子立於馬旁，舉劍準備自盡的場景。此圖見於新堡約翰·懷特出版的民謠傳單《貪婪老母；或，兩位忠貞戀人的慘烈覆滅》(*The Covetous Old Mother; or, The Terrible Overthrow of Two Loyal Lovers*) [圖 92]。內容講述一對深情戀人因男子之母貪慕財富、嫌貧棄義，將女子賣作海外奴隸，男子悲痛欲絕，最終以劍自刎，以死殉情。作品以哀婉筆調揭示貪婪與階級偏見所釀成的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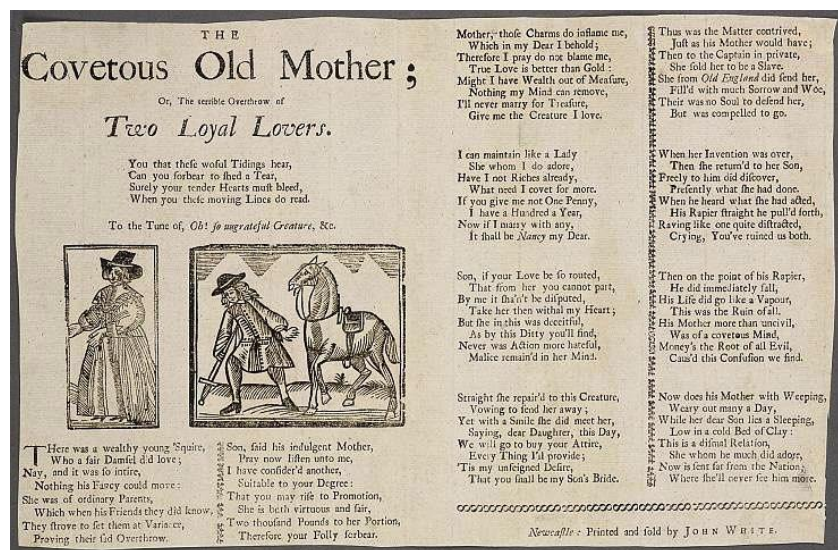
此圖的印刷原版為阿姆斯壯第 717 號木雕版[圖 89-91]。版身由上下兩塊厚薄不一的木材黏合而成，上薄下厚、上大下小，總厚度僅 15 公釐，較一般標準木雕版（約 22 公釐）為薄。背面原似另附一片加固木料，現已佚失。



[圖 88] Dodd 24:7



[圖 89-91] Armstrong woodblock 717, 73×88×15mm 正面、側面、反面



[圖 92]

THE / Covetous Old Mother; /
Or, The terrible Overthrow of /
Two Loyal Lovers. / You that
these woful Tidings hear, / Can
you forbear to shed a Tear, /
Surely your tender Hearts must
bleed, / When you these
moving Lines do read.
Newcastle: Printed and sold by

JOHN WHITE. (Huntington Library)⁴² EBBA 32491

⁴² Huntington Library Miscellaneous 289759 <http://ebba.english.ucsb.edu/ballad/32491/image>

臨終

阿姆斯特壯收藏的木雕版中，有一件特別有趣的「母子版」例子：一塊小木片嵌入較大的木版中央，印刷時可依故事內容更換不同的小木片。多德《樣本集》85:6 為其中之一[圖 93]，主題為「臨終床邊，天使與魔鬼爭奪靈魂」。此類場景常見於以「死亡警示」、「悔改」或「臨終訓誡」為題材的民謠傳單與教化性小書中，如“The Death-bed Repentance”或“A Dreadful Warning to All Sinners”。畫面描繪一名男子病臥床上，神父跪於床前，手持聖經為其祈禱；左上方（紙本右上角）有天使自空中飛降，嵌入的小方塊則刻出惡魔將男子拖往地獄的情景，顯示或許另有一版相對應的圖像，描繪靈魂被天使接引升天的版本。

此圖見於一張未具名、可能為十七世紀老約翰·懷特出版的民謠傳單《良心受創的哀鳴》(*The Cries of a Wounded Conscience*) [圖 96]⁴³。內容描述一位臨終的罪人悔悟過往放蕩與褻瀆之行，懇求上帝寬恕並警戒友人勿蹈其覆轍，強調臨終懺悔乃危險之舉。

此木雕版印刷原版保存於杭廷頓圖書館[圖 94, 95]，後來於版面上挖空嵌入小木片，應為後期增補設計。版身年代久遠但保存良好，阿姆斯特壯特別為之訂製木盒收藏，可見其珍視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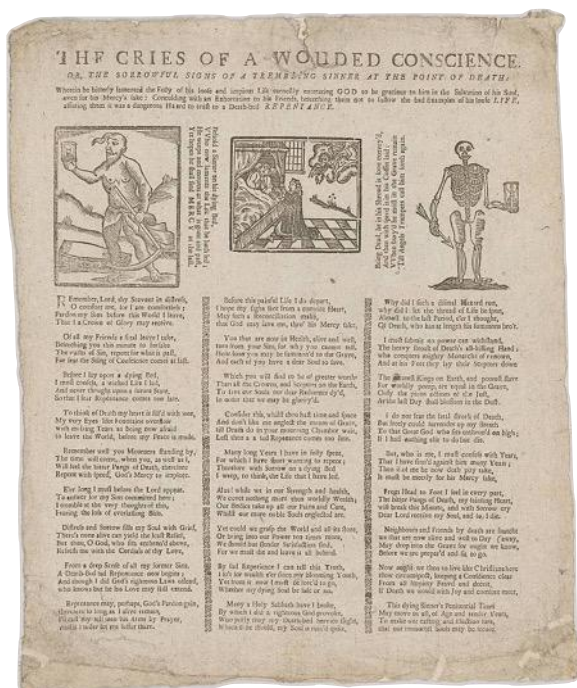


[圖 93] Dodd 85:6



[圖 94, 95] Armstrong woodblock 29, 69×78×22mm

⁴³ <https://ebba.english.ucsb.edu/ballad/37912/image>



[圖 96] THE CRIES OF A WOUDED CONSCIENCE. / OR, THE SORROWFUL SIGHS OF A TREMBLING SINNER AT THE POINT OF DEATH: / Wherein he bitterly lamented the Folly of his loose and impious Life earnestly entreating GOD to be gracious to him in the Salvation of his Soul, / even for his Mercy's sake: Conculding with an Exhortation to his Friends, beseeching them not to follow the bad Examples of his loose LIFE, / assuring them it was a dangerous Haard to trust to a Death-bed REPENTANCE. 1650-1750 (The Morgan Library & Museum) EBBA 37912



(細部放大)

(五) 勞工圖像

《勇敢的倫敦學徒》(History of the Valiant London Prentice)

多德《樣本集》7:3 所見為一幅取材自流行民間傳奇的插畫[圖97]。木刻圖像分為三段式構圖：上方左邊描繪比武大會，右邊是一名男子喚醒沉睡者，下方則為主角徒手將雙拳塞入兩頭獅子口中的場景。此圖原用於約翰·雪萊（John Shirley）所作《勇士傳奇：倫敦學徒》(The Famous History of the Valiant London Prentice) [圖100]，由新堡約翰·懷特於1711年印行。故事講述一位出身富裕的青年，選擇赴倫敦當學徒，嚮往冒險與行俠仗義。他歷經一連串英勇事蹟——懲治惡徒、扶助弱小、遠航歷險、斬除巨人與野獸、解救公主——最終以勇氣與美德贏得愛情與成功。這個故事將中世紀的騎士理想轉化為市民階層的勞動倫理，向年輕學徒傳達一種啟蒙訊息：平凡的出身亦能憑藉勇氣與勤勉，成就榮耀與幸福。

其印刷原版為阿姆斯特壯第 17 號木雕版[圖 98, 99]，版身色澤暗沉、木質陳舊。底部與背面可見三塊以小釘固定的補片，右側邊緣與補片處均出現明顯裂痕與裂縫。整體雖有磨損痕跡，仍保存了十八世紀早期民間木刻的質樸風貌。



[圖 97] Dodd 7:3



[圖 98, 99] Armstrong woodblock 17, Huntington Library, 73×114×23 mm



[圖 100] Title-page to John Shirley, *The Famous History of the Valiant London Prentice*, Newcastle: Printed and sold by J. White, 1711.

（六）船隻、旅行

多德《樣本集》56 頁收錄各種船隻圖案，這些圖像用途廣泛，凡故事內容涉及海外或旅行情節皆可使用。56:2 [圖 101]出現在多種出版物中，包括小書《布里斯托悲劇》(*The Bristol Tragedy*) [圖 103]，描述一個悲劇性家庭事件與旅行或冒險相關的經歷；《忠貞愛人歌曲集：三部曲》(*The Loyal Lover's Garland: in Three Parts, [A Ballad.]*)，講述戀人跨越距離與艱難完成愛情承諾的故事；以及《安森勳爵歌曲集》(*Lord Anson's Garland*) 標題頁，呈現與海洋探險與航海冒險相關的題材。此外，此圖亦見於新堡約翰·懷特印刷發行的民謠傳單《善良少女》(*The Kind-Hearted Damsel; or, Her Courtship to a Jolly Sailor*)，描述少女追求快樂水手的故事，展現海上生活與戀愛的結合。

該圖的印刷原版為阿姆斯特第 1065 號木雕版[圖 102]。版身雖有若干與紙本對應的裂痕，正面下半部船身中間曾有缺口，目前已以小木片修補。整體保存狀況良好，仍清楚呈現十八世紀民間木刻船隻圖像的細節與工藝特色。



由左至右：

[圖 101] Dodd 56:2

[圖 102] Armstrong woodblock 1065, 69×76×21 mm

[圖 103] *The Bristol Tragedy; or, the Cruel father. [A ballad.]*, Newcastle-upon-Tyne: Angus, 1785? (British Library 11606.aa.24.(59.))

肆、約翰·懷特的印刷策略與風格

一、約翰·懷特的出版策略與木刻版畫的物質性

基於以上所舉木雕版實例與證據，已可證明杭廷頓圖書館藏的阿姆斯特壯木雕版至少有部分確實為約翰·懷特使用的原版。據此並綜合前述對約翰·懷特出版品及其所用木刻版的觀察，可歸納出其獨特的出版策略與技術特徵。在版面呈現上，懷特十分重視視覺效果：印刷品往往排版整齊、美觀，字體與行距舒朗、墨色分明，並善於利用插圖吸引讀者注意力。這應該就是新堡之所以在傳單與小書市場上，能與倫敦分庭抗禮的原因。

在版畫的使用方面，懷特的印刷品呈現明顯的商業考量。許多木刻版被回收重複使用，導致圖文關係相對靈活；尤其是一些挖空鑲嵌式木版 (*plugged and inlaid blocks*)，顯示木版被視為可適用於多種文本的通用插圖資源。從物質技術層面觀察，懷特所用木雕版常由多塊小木塊黏合或釘合而成，此現象可能反映十八世紀初英國地方印刷業在木版製造技術上尚未完全成熟，呈現出機器制式與大量製造的工業時代來臨前，手工製作的簡易粗糙卻能審度變化的靈動工法。

這些木刻版的整體厚度大致保持在 22 公厘，明確證實當時木版製作需嚴格配合印刷機印台高度，以確保印刷流程的穩定與效率。由此可見，懷特出版品在兼顧商業利益與技術實用性的同時，也呈現出十八世紀地方印刷業對圖像與物質工藝的精細掌握。

這些資訊皆未見於歷史文獻當中，顯示了它們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也說明木雕版作為印刷史原始文物的研究價值與保存的必要性。

在出版策略上，懷特引進倫敦的流行話題，複製若干都會傳單，也增添許多新堡當地的新聞題材，如關於謀殺、犯罪案件的題材。Bates (2013) 認為地方性傳單透過反覆呈現犯罪、懲罰與悔罪敘事，強化了社群共享的道德價值，而非僅僅施加威嚇或紀律。她的論文引用許多新堡的傳單，將犯罪傳單定位為一種重要的通俗文化與社會史材料，強調其在理解英國底層社會道德心態、情感結構與刑罰文化中的關鍵價值。⁴⁴ 由此可見，懷特作為新堡地方的印刷商，雖然大半動機出於市場的商業考量，仍對反映地方社會與疏導民情有著相當的重要性。

二、懷特與其傳人的印刷風格

約翰·懷特及其在新堡的印刷傳承者，在印刷風格上呈現從樸實高效到追求藝術復興的演變。懷特早期的出版策略傾向模仿舊版，或復刻倫敦都會版本的暢銷內容，例如他所印製的《多比傳》民謠傳單與《魯賓遜漂流記》小書，旨在確保市場接受度。其版面風格以樸實舒朗、排版清晰見長，兼具可讀性與商業實用性。

承襲懷特事業的托馬斯·聖亦保持了這種清晰、整齊的印刷風格。然而，這種風格在後來的傳人中出現變化。安格斯家族雖然繼承了懷特遺留的大量珍貴木雕版，對保存與推廣這些歷史木版畫功不可沒，但其出版品的版面印刷水準未能完全延續懷特的優勢，在美觀度與清晰度上退步許多。

這種印刷風格的演變，一方面反映了十八世紀市場對內容而非版面品質的優先需求，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地方印刷作坊在傳承過程中，印刷技術與藝術審美標準可能存在波動。由此可見，懷特時期的印刷風格不僅兼具實用與觀賞價值，其傳承與變化亦反映出地方印刷業的經營策略與美學取向。

懷特當代相關印刷商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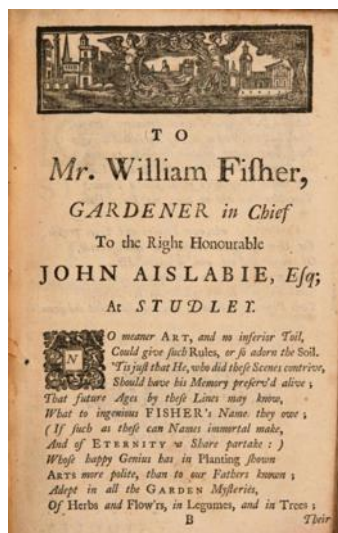
(一) 托馬斯·根特(Thomas Gent, 1693-1778)

根特為來自愛爾蘭的作家與印刷商，憑藉姻親關係承接老約翰·懷特在約克的印刷業。小約翰·懷特認為根特挪用了老懷特遺留的印刷器具，因此兩人在生意上形成競爭關係，關係不睦。

⁴⁴ Bates, 「大眾道德：犯罪與懲罰的社會意義，英國街頭傳單中的懲罰論述 1800-1850」(Morality for the masses: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discourse in British broadsides, 1800-1850) 討論的雖是十九世紀的傳單，仍可適用於十八世紀的同類主題。

根特所出版的書籍多以歷史書與地方誌為主，對地方史研究貢獻良多。其印刷版面典雅大氣，墨色分明、排版舒朗，可見老懷特風格的影子。然而，這種較為嚴謹與書籍化的風格並不迎合商業市場需求，最終因財務困難而歇業。（Gent 1832）

根特手中曾持有部分老懷特的木刻版畫，也自行刻版。雖然其出版品[圖 104]在圖文豐富性上不及小懷特，但在印刷品質上更顯精緻，並因曾在倫敦執業，對正式書籍的裝幀與版面講究格外嚴謹，呈現出十八世紀地方印刷業中對品質與工藝的追求。



[圖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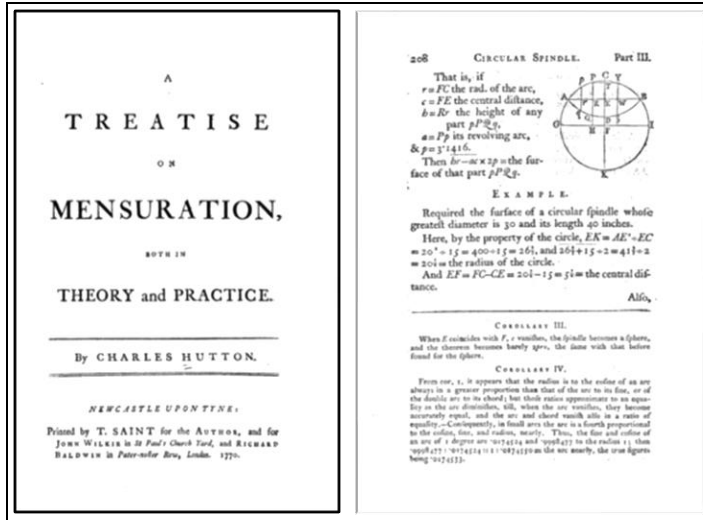
《里彭皇家城鎮的古今歷史...》*The Antient and Modern History of the Loyal Town of Rippon: ... Besides are Added, Travels Into Other Parts of Yorkshire ... Faithfully and Painfully Collected by Tho. Gent, ... printed, and sold at the Printing-Office [of T. Gent], over-against the Star in Stone-Gate; as also by T. Hammond, Likewise by E. Routh, Rippon; J. Ross, Knaresborough; G. Ferraby, Hull; A. Bettesworth and C. Hitch, London, 1733*

（二）托馬斯·聖(Thomas Saint, 1738-1788)

托馬斯·聖於 1761 至 1788 年間在新堡朝聖街（Pilgrim St.）執業，並曾與約翰·懷特合作。1761 至 1763 年間，他們的商號為「懷特公司」（J. White & Co.）；1763 至 1769 年（懷特過世前）為「J. White & Thomas Saint」；1769 至 1788 年則由托馬斯·聖單獨經營，商號為「T. Saint」。

托馬斯·聖印製出版了木雕大師畢維克早期作品，例如 1776 年版的《伊索寓言》。他的印刷風格承襲約翰·懷特，出版多種民間流行讀物，包括民謠、小書、年鑑、童書與教科書等。其版面設計以插圖為視覺重點，文字字體雖較小，但墨色清晰、版面舒朗且美觀。[圖 105]

1769 至 1788 年間，托馬斯·聖所出版的木雕版多數為約翰·懷特所遺留的傳承版。托馬斯·聖過世後，印刷店由霍爾與艾略特（Hall & Elliot）接手，延續其出版事業。然而，霍爾與艾略特的出版品並未使用懷特的木雕版，而以純文字印刷為主；這些木雕版很可能已轉售給新堡印刷商安格斯家族，繼續在地方出版流行讀物中發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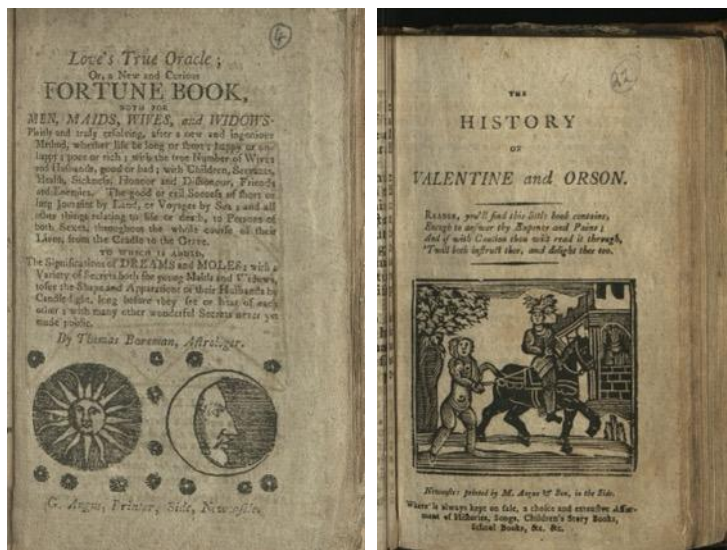


[圖 105] Charles Hutton, *A treatise on mensuration, bo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castle upon Tyne, printed by T. Saint for the author and for John Wilkie and Richard Baldwin, 1770

(三) 安格斯家族：托馬斯·安格斯(Thomas Angus)、瑪格麗特·安格斯(Margret Angus)、喬治·安格斯(George Ang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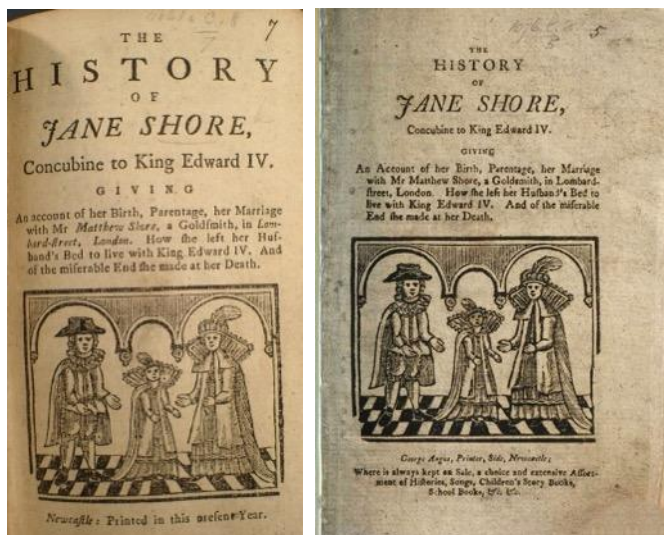
安格斯家族的印刷事業始於托馬斯·安格斯，他於 1774 年在新堡開設印刷店，主要出版小書。年輕的木刻師畢維克曾在 1774 至 1776 年間於其工作室當學徒。托馬斯於 1784 年過世，其遺孀瑪格麗特接手事業；1800 至 1808 年間，她與長子小托馬斯合作，商號改為「M. Angus & Son」。小托馬斯於 1808 年去世，次子喬治接手經營；瑪格麗特於 1812 年退休後，喬治將印刷店改稱「G. Angus」，直至 1825 年以破產收場。

安格斯家族的出版品中使用了不少約翰·懷特的木雕版畫，這些木版很可能是小托馬斯從繼承托馬斯·聖的印刷商霍爾與艾略特手中購得。觀察 1788 至 1825 年間的出版品可見，多數木雕版為懷特古版。雖然安格斯出版品中仍保留懷特與畢維克的木刻插圖，但印刷品質與紙質均不及約翰·懷特與托馬斯·聖時期：墨色不夠清晰，版面擁擠，紙質粗糙，這些因素均影響了出版品的視覺效果與整體精緻度。[圖 106, 107]



[圖 106, 107] *Love's True Oracle, or, a New and Curious Fortune Book, The History of Valentine and Orson*, Newcastle: Angus.

比較托馬斯·聖與安格斯出版的《珍·肖爾傳——愛德華四世之側妃》版本[圖 108, 109]，可觀察到安格斯的較晚版本中，所使用的木雕版顯現出更多破損痕跡。此外，安格斯版本的圖文排版顯得擁擠，紙張品質明顯較廉價，整體印刷效果與視覺精緻度遠不及托馬斯·聖的版本，兩者優劣立見。



[圖 108, 109] *The History of Jane Shore, Concubine to King Edward IV*, Thomas Saint(?), 1785? (British Library)(左)/ George Angus, 1790? (右)

三、懷特木刻版畫的藝術成就與敘事策略

對約翰·懷特通俗木刻版畫的分析顯示，其藝術成就超越了單純的功能性。懷特旗下雕工版畫的刀法質樸而有力，使圖像主題清晰明確、易於辨識，完全符合大眾傳播與閱讀需求。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版畫在構圖與視覺表達上展現出顯著的創新意識：例如阿姆斯特壯 23 號版中雷丁·托馬斯的圖像，使用了馬匹的前縮法（foreshortening）；而 15 號描繪湯姆·崔姆的故事，以及 158 號珍·肖爾的敘事圖，則運用了平面分割、時空並置與透視法（perspective，尤其在地板部分）的處理。這些例子表明，即使身處地方印刷工坊的邊緣，工匠們仍積極探索並挪用主流藝術的視覺元素。

此外，部分圖像（如 34 號版）的構圖策略刻意強調普世性而非特異性，使其可廣泛適用於多種文本情境——無論是騎士、夫妻、貴族，或一般旅人的故事皆可配合。這不僅出於商業效率的考量，也體現了圖像敘事普適化的成功策略，使單一視覺符號能在不同敘事語境中持續發揮作用。

四、木雕版的史料價值與技術史意涵

這些新堡木刻版畫不僅是視覺藝術的遺存，更具備重要的史料價值與技術史意涵。從物質層面觀之，木雕版本身的完損狀況、印刷痕跡以及紙本印記，皆可作為年代鑑定的重要依據。更深一層地，對木雕版的分析——尤其是其製版方式，如多塊木材的釘合或黏合結構——提供了理解十七至十八世紀英國地方印刷工坊技術發展的珍貴線索，反映了當時木版製作的工藝標準、工具運用以及專業化程度的過渡階段。比較阿姆斯特壯收藏的其他後期木雕版，這些早期作品雖顯得古舊粗糙，卻更具樸實的手工特色。

因此，這些實物不僅是圖像的載體，也是印刷史上技術實踐與演變的直接見證，呈現了地方印刷業在藝術表現與工藝製作之間的密切互動。

伍、結論：約翰·懷特出版品、木雕版的實證價值與其歷史意義

本文以十八世紀早期英國重要印刷出版者約翰·懷特（John White）為研究對象，透過其使用之印刷木雕版，重新檢視地方印刷活動、出版策略與實際生產之間的關係。藉由辨識與考證洛杉磯杭廷頓圖書館所藏木雕版，並與大英圖書館及新堡市立圖書館之相關印刷品進行對照，本文釐清部分木雕版與懷特出版活動之關聯，進一步說明其真實性與流傳情形。研究結果顯示，這些木雕版不僅能概略歸屬於某一時期或地區，更可透過實物比對與歷史考證，回溯至具體的印刷商及其出版網絡。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透過木雕版與印刷品的對照分析，檢視其印刷品質、用色特徵與版面安排，進而理解懷特如何實際運用這些版材進行印刷生產。研究發現，木雕版在懷特的出版活動中具有高度實用性，不僅可重複使用，也能因應不同文本內容進行調整，反映地方印刷工坊在成本與效率上的實際考量。此一結果有助於補充過往印刷史多

以文本或書目資料為主的研究取向，使出版策略得以從具體的製作與操作層面加以理解。

進一步從出版品的主題與版面形式來看，懷特的作品多以通俗敘事、時事與犯罪題材為主，顯示其出版取向與地方讀者需求之間的密切關聯。與同時期出版商及倫敦出版品的比較，懷特並非單純複製都會出版模式，而是依據地方市場條件與印刷資源，對既有題材與視覺形式進行取舍與調整。此一現象顯示，十八世紀英國北方鄉鎮的出版活動並非被動接受都會中心影響，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彈性與自主性。

從更整體的角度來看，本文藉由懷特的個案，補充了以倫敦為中心的印刷史敘事，呈現地方印刷商在通俗出版體系中的實際運作情形。懷特的出版活動不僅反映北英格蘭地方社會的閱讀需求，也為理解十八世紀地方印刷業的發展提供具體例證。

最後，本文特別強調印刷木雕版作為實體文物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由於早期印刷技術文獻對木雕版製作與使用的記載相對有限，相關工藝長期未受到充分重視。本研究透過對木雕版物質特性、製作痕跡與使用痕跡的分析，指出此類文物能補充紙本出版品無法呈現的資訊，並為印刷史研究提供可檢證的實證基礎。在當代數位影像大量流通、文物真偽辨識日益困難的情況下，回到實體木雕版本身，對於深化早期印刷工藝與出版活動的理解，仍具有不可取代的研究價值。

總結而言，本文透過約翰·懷特及其木雕版的研究，示範如何從具體文物出發，重新理解十八世紀地方出版活動與印刷生產的實際樣貌。此一研究不僅為博物館與圖書館典藏之印刷木雕版建立基礎記錄與考證成果，也為未來相關研究提供可延伸的研究方向與方法參考。

研究展望

本文以杭廷頓圖書館藏懷特木雕版為研究核心，初步勾勒其出版網絡與技術脈絡。未來若能進一步結合麥吉爾大學及其他收藏單位之資料⁴⁵，對木版來源、使用頻率與修補痕跡進行比對，將有助於更全面地重構十八世紀地方印刷工坊的運作模式與文化脈絡。

致謝：本文感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洛杉磯杭庭頓圖書館藏版畫木版之編目與研究」、「十八世紀英國印刷商約翰懷特研究」。

⁴⁵ 見 De Freitas (2020).

參考文獻

一、書籍

- Ashton, John. 1882. *Chapbook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Chatto & Windus; Skoob Books.
- Bates, Kate. 2013. *Morality for the Masses: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Discourse in British Broadsides, 1800–1850*. PhD diss., Keele University.
- Chatto, William Andrew, and John Jackson. 1839. *A Treatise on Wood Engraving,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London: Charles Knight & Co.
- Diderot, Denis, and 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51–1765.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Paris.
- Fumerton, Patricia, Anita Guerrini & Kris McAbee. 2010. *Ballads and Broadsides in Britain, 1500-1800*, Ashgate Publishing, Ltd.
- Fumerton, Patricia & M. E. Palmer (ed.). 2016. 'Living English Broadside Ballads, 1550-1750: Song, Art, Dance, Cultur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 79, No. 2.
- Gent, Thomas. 1832. *The Life of Mr. Thomas Gent, Printer, of York*. London: Thomas Thorpe.
- Gilks, Thomas. 1866. *The Art of Wood Engraving: A Practical Handbook*. London: Winsor & Newton.
- Hunt, Christopher John. 1975. *Book Trade in Northumberland and Durham to 1860*. Newcastle: Thornes Bookshop.
- Linton, William James. 1889. *The Masters of Wood-Engraving*. London: B. F. Stevens.
- O'Connell, Sheila. 1999. *The Popular Print in England*.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 Plomer, Henry Robert, et al. 1922. *A Dictionary of the Printers and Booksellers Who Were at Work in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from 1668 to 172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nner, Rachel, Kaley Kramer, and Adam James Smith, eds. 2022. *Print Culture, Agency, and Regionality in the Hand Press Period*.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 Tattersfield, Nigel. 2011. *Thomas Bewick: The Complete Illustrative Work*. 3 vols. London: Oak Knoll Press; The British Library.
- Tattersfield, Nigel. 2020. *Dealing in Deceit: Edwin Pearson of "The Bewick Repository" Bookshop, 1838–1901*. Newcastle upon Tyne: The Bewick Society.
- Welford, Richard. 1895. *Early Printing in Newcastle-upon-Tyne*. Newcastle-upon-Tyne: Cail.

二、書籍章節

- De Freitas, Leo John, 2020. "Newcastle Chapbooks, Broadsides, and Garlands: A Study of the Collection of Woodblocks in McGill University Library,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in *Printers, Pedlars, Sailors, Nuns: Aspects of Street Literature*, edited by David Atkinson and Steve Roud, London: The Ballad Partners.

Gardner, Victoria. 2008. "John Whit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nt Culture in the North East of England, 1711–1769." In *Book Trade Connections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edited by John Hinks and Catherine Armstrong, 71–92. New Castle, DE: Oak Knoll Press;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Welford, Richard. 1907. "Early Newcastle Typography: 1639–1800." *Archaeologia Aeliana: or Miscellaneous Tracts Relating to Antiquity*, 3rd ser., 3: 1–134.

三、編輯書籍

Meriton, John, ed., and Carlo Dumontet. 2010. *Small Books for the Common Man: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London; Newcastle: The British Library; Oak Knoll Press.

四、期刊

Sung, Mei-Ying. 2025. "Reconfiguring Ephemeral Heritage: A Historical and Material Analysis of The Armstrong Woodblock Collection (1600–1910s)." *Journal of Arts & Humanities Studies* 1 (3): 45–62.

五、網路

Constantin, Léa. 2013. "A Collection of Woodblocks." McGill University Library.

https://www.mcgill.ca/libraries/sites/libraries/files/2025-06/woodblock_collection-description-public_final.pdf

English Broadside Ballad Archive (EBBA). Early Modern Center, Departmen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https://ebba.english.ucsb.edu/>

Internet Archive.

<https://archive.org/>

Solving the Mysteries of Early Printing History-

-Surviving woodblocks and their print of the 18th-century British printer John White

Mei-Ying Sung ¹

Abstract

John White (1689–1769) was a highly representative publisher and printer in northern England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perating primarily from Newcastle-upon-Tyne. His enterprise encompassed the printing and distribution of broadsides, chapbooks, and children's books.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is the survival of a large number of original printing woodblocks from White's workshop, now primarily preserved at the Huntington Library (Los Angeles, USA) and McGill University Library (Canada). This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is substantial body of material heritage, addressing key questions such as: What is the provenance and authenticity of these woodblocks? What roles did they play in White's publishing strategy and visual culture? Why have later collectors shown such intense interest and value appreciation toward these woodblocks, which appear "crude" in craftsmanship?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conducted at the Huntington Library, the British Library, and Newcastle City Library, this study employs historical verific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terial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hite's printed work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woodblocks. It argues for the irreplaceable value of physical artefacts in empirical historical research—especially in an age dominated by digital information, where questions of authenticity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 This study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outcome of a multi-year research project fund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Keywords: John White, Newcastle-upon-Tyne, printing woodblock, broadside ballad, chapbook

¹ History Department, FoGuang University, Taiwan.

² No.160, Linwei Rd., Jiaosi, Yilan County 262307, Taiwan (R.O.C.).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maysung70@gmail.com

(Received 11/12, 2025; Revised 12/29, 2025; Accepted 12/30, 2026)

孔子之天道觀及密契經驗

郭悟振*

摘要

當代學者對孔子之天道觀，大致分為三類：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及德性之天。多數的學者認為孔子仍存有人格神主宰天的看法，然而從「天生德於予」、「知天命」、「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似乎與德性天有關；但是孔子並未對德性天近一步述說，其中原因可能是孔子將「仁」視為道德之主體性及創造性，踐仁便能默契天道，故孔子無須另設一形而上之「天」為道德之根源。

孔子雖不立宗教，但對人類抱有「終極關懷」，故應含有宗教情懷，有宗教情懷便可能會發生密契經驗，再從「知天命」、「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君子憂道不憂貧」、「從心所欲，不踰矩」，這些敘說所含有的知識深度及意志強度更可能與密契經驗有相關性。然而密契經驗是一種直覺的體悟，仍然須要理性的默認，判別與運用才有其價值性。

關鍵詞：天道、天命、仁、密契經驗、天人合一

壹、前言

孔子並無直接對「天道」加以論述，只是一位注重道德實踐者，孔子學說以「仁」為中心，強調以人為本，孟子繼承孔子之學，以「四心」（仁義禮智）為基礎提出「性善」之說，注重德性之存養、擴充，最終則能「知天」、「事天」，《孟子》全書的最後一篇《孟子·盡心章》是孟子哲學思想的總結與最高歸結，涵蓋了孟

* 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博士生

E-mail : guobig2000@yahoo.com.tw.

(民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收件，民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修改，民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接受)

子思想體系的心性論、天命觀及修養方法，其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⁴⁶ 依牟宗三先生的解釋大意为：充分的體現本心，就能知道德創造之真性，證知了真性，就知道天之所以為天，此天即為天道；故此天道即德性創造之天，由人的道德創造之真性而證實。⁴⁷ 孟子的天道觀已非常純熟，應該受到孔子天道觀的啟發，並做進一步闡釋，之後持續影響中國兩千多年。

殷商時期以「神本」為主，注重祭祀，事事占卜，周初時期漸漸出現「人本」思想，但祭祀與占卜依然盛行，孔子自稱殷之後，⁴⁸祭祀必然不少，曾讚嘆大禹能「致孝乎鬼神」（《論語·泰伯》），顯然孔子承認鬼神之存在，但又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及「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這種事人優先於事鬼，尊敬而不親近鬼神，僅承認鬼神之事，而無更多的想法，屬於「存而不論」的態度。「天」與「鬼神」俱是為超越性存在，然而「天」的層次更高於「鬼神」層次，孔子對鬼神存而不論，對天的觀點又如何呢？孔子提出以「仁」為中心的道德實踐，並敬鬼神而遠之，以「人本」為主，但孔子之天道觀與「踐仁」有何關係？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朱熹云：「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⁴⁹按朱熹所云孔子罕言性與天道，則踐仁與天道有何相關性？

從另一方面來說，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表達「道」作為人的「終極關懷」，含有宗教意涵，又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人應自覺主動的承擔起弘道的責任，同時君子擔憂的是否能行道，而不擔憂外在客觀的限制。孔子的道德實踐如果契合於「天」，所謂「踐仁以知天」，此「天」應相同於孟子所言之「知天」、「事天」之「天」，則此「天」實蘊含有神聖性、超越性與圓滿性；既有神聖性與超越性，即含有宗教情懷，故可能出現「密契經驗」（Mystical Experience），近代學者對孟子的密契經驗討論較為豐富且深入，對孔子之密契經驗則有不同之看法，

⁴⁶ （宋）朱熹。《四書集註》〈盡心上〉。新北：大方出版社，1974年，頁187。

孟子此句話將儒家內聖之學，清楚的表達出來，更無餘蘊，其天人合一的思想也盡在其中。

以下之《論語》、《孟子》皆根據「朱熹：《四書集註》」。新北：大方出版社，1974年。」



⁴⁷ 牟宗三。《圓善論》。台北：學生書局，1985年，頁132-133。

⁴⁸ 《禮記·檀弓上》：「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丘也，殷人也。」孔子自認是殷的後人，夢見自己奠於兩楹之間，不久即過世，這也說明孔子對殷禮，情有獨鍾。

⁴⁹ （宋）朱熹。《四書集註》〈公冶長〉。頁28。

如楊儒賓認為「不可得而知」屬不可知論，王欽賢則認為「以仁心密契天之神秘家型態的聖人」肯定孔子的密契經驗，謝君讚也認為「下學上達、踐仁知天的孔子仁教中應當能蘊涵著冥契主義的思想內容」。⁵⁰本文試從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及史泰司（W. T. Stance）所認為密契經驗的特性來討論孔子的密契經驗。

貳、殷周之際的「帝」與「天」

天，甲骨文作  或 ，在人之上有一條橫線或大的正方形，有些是用圓形來表示。在人之上，一方面可能表示為至高無上之義，如《說文·一部》：「天，顛也。至高無上。」⁵¹；一方面也可能表示捉摸不定，難以揣測之意，如《爾雅·釋天》：「穹蒼，蒼天也」⁵²是為此意。「帝」與「天」原來都有主宰者之意，「帝」是殷商的至上神，「天」是西周的至上神，到春秋戰國之時，民智大開，「天」慢慢滲入形而上學之思想，有形成「自然之天」，以道家為代表，亦有形成「德性之天」以儒家為代表。

殷商社會體系發展於原始社會解體不久之後，其宗教信仰依然承接至原始宗教傳統，明顯有上帝崇拜及祖先崇拜，根據殷墟甲骨文的刻辭記載，其祭祀對象有三類：帝、自然神及祖先。帝是至上神，力量及於上層宇宙。然而祭祀帝僅為君王才有的權利，人民無此權力，所以除了君王之外的人民而言，祭祀祖先更顯得重要，祖先對於個人福祉，生、老、病痛及諸事順逆有很大的關係。⁵³ 在殷墟甲骨文的卜辭裡有出現「帝」，是王者祭祀對象，但罕出現「天」，同時「天」也不是殷商祭祀的對象，亦無出現「天子」或「天命」等相關名詞；「天」、「天命」、「天子」是西周的用

⁵⁰ 如楊儒賓認為《孟子》中「上下與天地同流」、「萬物皆備於我」、「塞於天地之間」、「知其性，則知天矣」等，皆與密契經驗有關。但孔子是否有密契經驗，則云：「恐怕也是微妙玄通，不可得而知也。」詳見「楊儒賓：〈先秦儒家與冥契論述〉。《中國文化》35，2012年，頁12-29。王欽賢則以仁心密契於天道而言，詳見王欽賢：〈從密契主義觀點來看孔子之天道與仁道觀〉。《鵝湖月刊》31(11)，2006年，頁31。謝君讚雖有專論孔子的密契經驗，但較少論及因密契經驗而獲得心理之極大動力及精神上的喜悅及滿足，如孔顏之樂。詳見「謝君讚：〈檢證《論語》——論孔子思想中的冥契主義向度〉，《鵝湖學誌》61，2018年，頁46-89。」

⁵¹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世界書局，1989年，頁11。

⁵² （晉）郭璞注，（晉）邢昺疏。〈爾雅注疏下〉。《十三經注疏》。李學勤主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2001年，頁182。

⁵³ 黃銘崇。〈「殷周革命」新論——邁向「人文」的國家〉。《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黃銘崇主編。新北：聯經，2018年，頁312。

詞，西周自稱天受命於文王，以致文王之後代統治者都稱為「天子」⁵⁴，西周統治殷商後，刻意將「帝」與「天」並論，這有利於族群融合，也有利於統治。如《尚書·湯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⁵⁵將上帝、天命一起出現，表示周初之時「帝」與「天」並無多大差別，甚至等同。

無論是「帝」或「天」都有明顯的主宰之意，即含有人格神之「主宰天」，為最高之神，掌賞罰之事。《尚書·西伯戡黎》就記載西伯文王戰勝黎國後，祖伊非常害怕，奔告於紂，要紂奮發圖強，紂竟然說「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⁵⁶依然有恃無恐。及至西周滅殷後，一方面藉「天命」、「上帝」的無上命令收服殷商的遺民，如《詩經·大雅·文王》：「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⁵⁷另一方面又漸漸滲入人本思想，提出「天命靡常」的觀念，天命無常，並且和有德之士相配，「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鑑於殷，駿命不易」⁵⁸，說明有德性之士才能配有天命，想配有天命必須修德。「天命靡常」觀念，強調天命不再是永恆不變地眷顧某一部族（如殷商），而是會根據人間統治者（天子）的「德」行來決定其去留。顯然將天「德性化」的意味濃厚。於是天命不是高高在上永遠不變，有德之士自然能配有天命能自求多福，這是西周對天命思想的一大改革，不是「我生不有命在天」永遠得到庇佑。

周初之「天」原與殷商之「帝」相類，都有主宰之意，但漸有「德性化」之趨勢，而更進一步的是提出「德性創生之天」，如《詩經·大雅·蒸民》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⁵⁹，則明顯含有創生義；「烝」朱熹釋為「眾」，而「物」釋為「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⁶⁰，物各有法則，即美德也，天既生萬物，又生美德，人民執以為常，並喜歡此美德。此詩之「天」，實含「德性之天」，又其創生意涵非常濃厚，可視為「德性創生之天」，後為孟子所引用。這在「人格天」之下，另闢一條「德性創生之天」的蹊徑，並由此而萌芽，對後人影響很大。

⁵⁴ 黃銘崇。〈「殷周革命」新論——邁向「人文」的國家〉。《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黃銘崇主編。頁 330-331。

⁵⁵ 吳璵。《新譯尚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77 年，頁 53。

⁵⁶ 吳璵。《新譯尚書讀本》。頁 70。

⁵⁷ （宋）朱熹。《詩經集註》〈大雅·文王〉。台南：大孚書局，1979 年，頁 137。

⁵⁸ 同上，頁 138。

⁵⁹ （宋）朱熹。《詩經集註》〈大雅·蒸民〉。頁 167。

⁶⁰ （宋）朱熹。《詩經集註》〈大雅·文王〉。頁 167。

參、孔子對天的觀點

孔子真正言「天」之處不多，部分仍保有人格神「主宰天」之義，這種觀念延續自殷末周初，最明顯如：「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先進》）顏淵過世，孔子非常傷心說「天喪予」，這應是非經意而說，帶有濃厚傳統習慣而說，此表明孔子仍然帶有傳統主宰義之天的意涵，此天主宰生死賞罰之權；另外「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論語·雍也》）「天厭之」乃受天之棄絕，有懲罰義，此天亦應屬主宰義。就某方面來說孔子確實將「天」視為最高神明的「主宰天」，而孔子對主宰天的心態，非常類似對鬼神之心態，孔子對鬼神的心態是「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對鬼神的尊敬明顯表達於對禹的讚美，云「禹！吾聞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論語·泰伯》），而對天的崇敬明顯表達對堯的讚美，云「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孔子將禹與鬼神，堯與天相並連，說明其對鬼神的尊敬及對天之尊崇，然而，雖尊敬而不親近，故言「敬鬼神而遠之」。「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論語·述而》）「丘之禱久矣」應是反義詞，綜觀《論語》未見孔子勸人禱告祈福，自己亦未勤於祈福，所以「丘之禱久矣」應解釋為如果禱告有效，早就禱告了；與此相同是「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孔子將「天」與「奧竈」同言，明顯將此天視為更高位格之人格神，故此天應為主宰天，孔子對主宰天之心態是「無所禱」，「無所禱」與「丘之禱久」皆表達不以禱告而求天或鬼神之庇佑，此也合乎「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而以人本為主，所以孔子對天與鬼神皆持有「敬而遠之」的心態。有學者認為孔子之「天」是一個有位格與意志的最高神明的存在，此亦非虛言。⁶¹

然而孔子除了承認人格神之主宰天外，又提到有關德性天的觀念，最明顯記載於《論語·述而》「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生德於予」，強調吾之德由天而生，此天應是德性天，蓋主宰天未必與德性有關；天生德於予，則此天亦有創生意，故「天生德於予」實蘊含「德性創生之天」。這和紂王「我生不有命在天」不同，紂王之天是主宰天，主宰天主掌吉凶禍福與德性無明顯相關，祭天所以欲

⁶¹ 如張振東認為孔子的「天」絕不是一個空虛的青氣之「氣」，而是一個有位格與意志的最高神明存在。詳見張振東。〈孔子的天道觀與現代生活〉。《哲學與文化》15(1)，1988年，頁12。又如盧瑞鐘認為孔子是「傳承殷商以來的神性天觀念」。詳見盧瑞鐘。〈孔子的天道論與人性論新探——一個社會生物學的考察〉，《國家發展研究》，8(2)，2009年，頁121。

得到天之庇佑，故有恃無恐，孔子是以德配天故無懼，無懼是任憑「天命」安排都能處之泰然。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乃孔子自覺承繼文王之德，雖與「天生德於予」不同，但皆指孔子自身之德，有德者依德順天而行，無論「天之將喪斯文」或「天之未喪斯文」皆能泰然處之，當然無懼於匡人，故云「匡人其如予何」，類似「桓魋其如予何」，此天實隱含有德性天之意。

想對孔子天道觀進一步了解，則不應忽視對「天命」的看法。「天命」於周初原意為「上帝之命令」，但孔子不以此言之，孔子在自述時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為政》）其中「五十而知天命」中的「天命」並非「上帝之命令」，又與《中庸》的「天命之謂性」中的「天命」恐有不同，蓋當時孔子對形而上學之「天」尚未在意。所謂「知天命」，勞思光先生說：「俗說中以爲表示孔子崇信天命，實則大謬。此明言『知天命』。『知天命』者，即知客觀限制之領域是也。」⁶²最明顯的例子，如「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語·雍也》）此處之「命」，正可以用客觀限制之領域來解釋；於此勞思光先生提出「義」、「命」之分，「命」為客觀限制，「義」為道德自由心，即「自覺主宰」，是非善惡則需由自己負責，生命可貴處亦在此。⁶³然而如果只將「命」視為客觀限制之領域則可，但以用客觀限制之領域來解釋「天命」恐有扞格之處，客觀限制之領域正是人所不能操控，人不能自主之，如「賤貴窮通」正是客觀限制之領域，而孔子言：「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又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顯然孔子並不在意客觀限制之領域，而在意是否能行其道與義。如此將「天命」釋為客觀限制之領域，就很難解釋「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語·堯曰》）及「五十知天命」之說。於此，唐君毅有不同的解釋，其云：

天命為天之命令呼召，原為古義。此天原有人格神之義，而其呼召命令，亦必

⁶²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1980年，頁71-72。

⁶³ 勞思光云：「人只能在『義』處作主宰，故人可對是非善惡負責；人不能在『命』處作主宰，故成敗得失，實非人所能掌握者。由此，有智慧之聖哲，即必須明白此中分際或界限；一面知何處人能負責任，應負責任，另一面知人之存在之限制性；兩面俱明，則即是「知命」，即能『不憂不懼』。而『不知命』則孔子以為即不足為『君子』。此所謂『知命』，原非崇信天命神權之意；其理甚顯。」詳見勞思光。《中國哲學史》。頁75。

繼以人之回應。……孔子于天，雖不重其人格神之義，然于此命仍存舊義。其即義見命，即直接于人之知其義之所當然者之所在，見天之命令呼召之所在，故無義無命，而人對此天命之知之畏之俟之，即人對天命之直接的回應。此即成孔子之新說也。⁶⁴

吾人由孔子之鄭重言其知天命，在五十之年，並鄭重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及「畏天命」之言；則知孔子之知命，乃由其學問德性上之經一大轉折而得。此大轉折，蓋由於孔子之周遊天下，屢感道之不行，方悟道之行與不行，皆為其所當承擔順受，而由堪敬畏之天命以來者。此則大異於前之天命思想，亦不止於直下行心之所安之教者也。上述之疑難所自生，初皆原自不知孔子之天命思想，實乃根據於義命合一之旨，吾人先當求於此有所透入也。⁶⁵

唐先生認為孔子之「命」，仍有人格神之意，但不甚重視之；人雖處在不能自決的客觀限制境遇之「命」中，依然可行「義」，無論道能行之或不行，人皆能實踐「義」所當然，縱使當下之境遇不是我所能決定，但人依然可以保有自決行「義」的自由。此即「義」當然之所行，呼應天之命令呼召，義命共感而形成「義命合一」；「義命合一」之解釋似乎比「義命分立」為佳，「義」之所行，並非孤零零的存在，而能與「命」共感。美國學者郝大維（David L. Hall）、安樂哲（Roger T. Ames）亦類似唐先生的說法：

「天命」與「命」之間的關係或許可這樣表述：一個已獲得君子或聖人這樣高級整體性的人建立了某種與「天」的內在關係，這種關係使他通過理解力和影響來運用「天命」。一個人自控能力越弱，他將「命」視為無法抗拒的決定性條件的感覺就越強；一個人自控能力越強，他自覺到自己在決定外在條件時所起的主導作用就大。當世界尊重他的道德，他就為世界「言說」，即為他的「天」說話。這樣，從環境強加個人以意義還是個人主動為情境引入意義這兩個不同角度，體現了個體語境意義的不同。⁶⁶

郝、安認為「命」與「天命」，具有同一來源，但有不同之結果；自控能力弱者將受「命」擺布，自控能力強者，在「命」的情境中起主導的作用，而能為「天」言說，這種主動為情境引入意義，正是「天命」之義，而非不可抗拒之「命」。「當世界尊重他的道德」，說明其德行受到肯定，即能為「天」言說，此「天」應與德性有關，

⁶⁴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頁118-119。

⁶⁵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頁515。

⁶⁶ 郝大維（David L. Hall）、安樂哲（Roger T. Ames）著。《通過孔子而思》。何金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65-266。

相似於唐君毅「人對天命之直接的回應」。

肆、孔子之仁與天道之關係

「仁」是孔子的中心思想，但孔子對仁未下任何定義，孔子是踏實的道德實踐家，少談理論。但從孔子談仁，有從視人如己之同理心，有從不安之心說起，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又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似乎比「愛人」更進一步，勞思光先生認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仁之本意最明朗，仁者即視人如己，淨除私累之境界。⁶⁷而仁的表現是自覺性，非由外來的強迫性，也不假外求，所以《論語·述而》：「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語實蘊含「仁」人人皆有之，而且固有之，方能「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也是道德之主體性，「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牟宗三先生說：「儒家經典中代表主體的觀念比如孔子講仁，仁就是代表主體。仁也可以說是『理』、是『道』。」⁶⁸

「仁」是孔子的中心思想，所以《論語》談仁最多，孔子之仁學的天道關係在《論語·憲問》最具代表：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牟宗三先生認為：

孔子認為從下學可以上達，那就是說：只有努力踐仁，人便可遙契天道，即是使自己的生命，與天的生命相契接，所以孔子做出「知我者其天乎」的感嘆，「知我者其天」表示如果人能由踐仁而喻解天道的時候，天反過來亦喻解人，此時天人的生命互相感通，而致產生相當程度的互相了解。這樣的契接方式，可們可以名之為「默契」。⁶⁹

透過實踐仁，便可上達與天道相契合，人與天默而契之，故其德純者，一體皆是仁之朗現，則「知我者其天乎」，一體皆仁遙契於天，則天與人互為感應，由此引出後人

⁶⁷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頁 49。

⁶⁸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學生書局，1991 年，頁 79。

⁶⁹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北：學生書局，1978 年，頁 33。

所言「天人合一」之論述。⁷⁰「知我者其天乎」此天應以「德性天」而言，如前所述孔子對人格神之「主宰天」不甚在意。孔子以「仁」為中心思想，是以人本為主，「敬鬼神而遠之」、「不語怪力亂神」，由此重建當時禮壞樂崩的混亂社會，成為和諧、互助、有序的社會，以「仁」彰顯出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並與天相呼應。

若從「天生德於予」及「知我者其天乎」，實蘊含有人與天之間的「默契」；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一體皆是仁之朗現，心即仁，仁即心，此乃《詩經·周頌·維天之命》所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⁷¹其德之純也，故能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從心所欲」也是自由仁心之體現，也是生命終極之價值與意義，由此儒家開顯出「仁心」，而此「仁心」與天相契合，由此發展出《中庸》、《孟子》形而上的道德學說基礎。

孔子罕言性與天道，只重視道德之實踐，其中又以「仁」為主要行為依據點，曾經讚賞其最得意門生顏淵三月不違仁，他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論語·雍也》）可見孔子是以「仁」來評鑑其學生的修為情形，又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仁隨時隨處皆在，只想要踐仁，仁便至矣，說明「仁」必須「本有之」，具有絕對性及普遍性，孔子一生之精采所言「仁」，正於此有所據也。牟宗三先生云：

孔子建立仁這個內在的根以遙契天道，從此性與天道不致挂空或懸空地講論了。如果挂空地講，沒有內在的根，天道只有高高在上，永遠不可親切近人。因此，孔子的仁，實為天命、天道的印證。⁷²

綜上所述，孔子之天道觀，某部分依然順隨傳統人格神主宰天的看法，但對主宰天所採取的心態類似對鬼神的心態，即「敬而遠之」，尊崇之而不祈禱求福；然而又從「天生德於予」、「知天命」、「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與德性天有關；但是孔子並未對德性天進一步述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孔子將「仁」視為人人皆本有之，是道德之主體性及創造性，踐仁便能默契天道，若無仁道之實踐則此天道亦挂空而不真切，實踐仁道自能遙契天道。這也說明孔子無須另設一形而上之「天」為道德之根源。「下學上達」，踐仁以知天，天人相應，或言「天人合一」，是儒家的最終的理想。這種「合一」很可能來自一種直覺體悟，即一種密契經驗，將於下一節詳述。

⁷⁰ 「天人合一」之論最先是由宋儒張載所提出，張載《乾稱篇》云：「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詳見（清）黃宗羲編：《宋元學案》〈橫渠學案〉。台北：河洛圖書，1975年，頁84。

⁷¹ （宋）朱熹。《詩經集註》〈周頌·維天之命〉。頁175。

⁷²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頁30。

伍、密契經驗的特性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認為密契經驗有四個特性：(1)不可言說性(Ineffability)：它的内容無法以適當的語言來表達，只能直接經驗它，而無法將這樣的經驗傳授或傳達給別人；(2)知悟性(Noetic quality)：密契狀態是對於理智所無法探知之深刻真理的洞悟、洞見、啓示，雖然無法言傳，但充滿意義與重要性；以上兩種特性將被稱為密契主義的主要特性。下面兩種特性比較次要；(3)頃現性(Transiency)：密契狀態無法維持很久，除了極少的例子之外，它的極限是半小時，最多一兩個小時，之後就漸漸淡入日常生活的狀態；(4)被動性(Passivity)：當這種特別的意識來臨，密契主義者會覺得自己的意志好像中止一樣，而且有時候真切地覺得好像有個更高的力量將他握住。⁷³

詹姆斯說：「最簡單、最基本的密契經驗，似乎是對某個偶然掃過心頭的格言或公式其意義的徹悟之感。」⁷⁴這種最簡單、最基本的密契經驗幾乎人人皆有經驗過，那是一種突然靈光一閃的感覺，這種感覺不知從何而來，亦不知從何而去，理智的強力思索反而不得其解，是一種直覺的感受。這種覺受正合乎詹姆斯所言的四種特性。

然而較高層次的密契經驗常與深層的靈性或宗教性經驗有關，指的是個人與神聖、宇宙本體、終極實在等超越性存在的直接合一或親密接觸的經驗。這種經驗超越了理性、語言和日常經驗的層面，通常帶有強烈的心靈震撼與轉化性，被形容為無法完全用言語描述的深刻體悟。這種「密契經驗」與「通靈」、「心電感應」及「自動書寫」等有所不同，因為這些作用對心靈並無多大的幫助，亦無深刻的體悟。

較高層次的密契意識狀態與個人的宗教經驗息息有關，詹姆斯說：「個人的宗教經驗是以密契的意識狀態為其根基與中心。」⁷⁵沒有宗教精神的人，事實上是很難進入較高層次的密契經驗，縱使進入此境界，亦可能認為是自己的幻想；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其感受到的密契經驗亦有所不同，於此，僅討論孔子的密契經驗。

雖然密契經驗與宗教無關，但如果沒有宗教精神的人，很難有高層次的密契經驗，而孔子是儒家創始人，儒家屬於宗教嗎？此問題可能有不同看法，本文不做太多討論，僅提出美國學者休斯頓·史密斯（Huston Smith）的看法：

⁷³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宗教經驗之種種》。蔡怡佳、劉宏信譯。台北：立緒，2001年，頁458-459。

⁷⁴ 威廉·詹姆斯。《宗教經驗之種種》。蔡怡佳、劉宏信譯。頁460。

⁷⁵ 威廉·詹姆斯。《宗教經驗之種種》。蔡怡佳、劉宏信譯。頁457。

如果從最廣義來看，以宗教為環繞著一群人的終極關懷所編織成的一種生活方式，儒家顯然夠資格算是宗教。就算宗教是採取一個比較狹窄的意義，是指關懷人與其存在的超越基礎的結盟，儒家仍然是一種宗教，縱使它是一種緘默的宗教。⁷⁶

雖然孔子重視人本以實踐道德為主，但對人類有甚深的終極關懷，且依其自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而言，當實踐仁道可與天相呼應、相契接，最終我與天相默契或合一，此即是「人與其存在的超越基礎的結盟」，這種「天人合一」即含有宗教情懷，故史密士說儒家是「緘默的宗教」甚是合理。就現實而言，孔子雖無創立宗教，但含有宗教情懷，故亦可能發生高層次的密契經驗。

陸、孔子的密契經驗

由於密契經驗含有不可言說性，即無法被理智清楚的表達，而其知悟性是由直覺體悟而得知，非由理智思索得知，尤其是深層的密契經驗更是超越世間常理之外，而孔子以人道設教，「不語怪、力、亂、神」，故《論語》中幾乎沒有孔子對密契經驗的直接述說，只能間接論證孔子之密契經驗，雖然證據稍嫌薄弱，但亦能看出其跡象。

《論語·陽貨》云：「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句話有多種解釋，一、將天視為自然運作之天；然而孔子言天，未曾言「自然天」，故「自然天」非孔子想要表達之意；二、將天視為上帝（主宰天）的無為而治，⁷⁷孔子亦未嘗有「無為而治」的想法，故此亦非孔子想要表達之意；三、將天視為天理，朱熹云：「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現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⁷⁸朱熹所言「天理流行」，孔子雖有觸及德性天，但尚未多言，故此恐非孔子想要表達之意；四、懼學者以言語求道或以言說為功，故有此言。錢穆云：

⁷⁶ 休斯頓·史密士（Huston Smith）著。《人的宗教》。劉安雲譯。新北：立緒文化，2018年二版，頁246。

⁷⁷ 馮友蘭云：「有人認為，這可見孔丘所說的天就是自然，每年四季自然地運行，萬物自然的生長，不待上帝說話。其實，孔丘的這段話無非是說，上帝也可以『無為而治』。說不言就證明他能言而不言。」詳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72。

⁷⁸（宋）朱熹。《四書集註》〈陽貨〉。頁123。

為何孔子無端發欲無言之歎？或說：孔子懼學者徒以言語求道，故發此以警之。或說：孔子有見於道之非可以言說為功，不如默而存之，轉足以厚德而敦化。此兩義皆可通。⁷⁹

此說甚是，孔子重視道德實踐，非以言語求道或以言說為功，故以天自比。五、除錢先生所言之外，或許另有一解，即是孔子踐仁與天默契，實難表達其中之體驗，故欲無言，而以「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隱喻告知，無非說明踐仁至深處便可自然得知；當然這種可能性不大，但亦不能完全排除之。

以下則更有力說明孔子密契經驗之可能性，從詹姆斯除了提出密契經驗四種特性外，又說明何謂較高層次的密契狀態，他說：

但較高層次的密契狀態，指出了甚至是非密契者都會傾向的宗教情懷。它們訴說至高的理想、訴說廣大、訴說合一、訴說安全，也訴說平靜。它們提供我們「假設」，這些假設我們也許可以故意忽略，但身為思考者的我們卻無法將之推翻。它們使我們相信的超自然主義與樂觀主義，無論如何闡釋，畢竟是對生命意義最真實的領悟。⁸⁰

其中詹姆斯所說的「假設」，是於密契經驗中所體悟到的，如對「至高、廣大、合一」的體悟，這些體悟與較高層次密契經驗有關，是一種直覺的體悟。如果無密契經驗，僅以理性思考推論是難以得知，故無密契經驗者只能視這種體悟為「假設」，但亦不能因此推翻高層次的密契經驗。孔子的「知天命」及「知我者其天」，如前所述，人之仁心與天命或天道共感合一，此涉及天人合一，應該有密契經驗，如果沒有密契經驗，可能就詹姆斯所說只能視為「假設」，如此「知天命」、「知我者其天」只是一種理性推理思索而得，只是一種「假設」而已。故合理而言孔子於道德實踐中，應有發生「至高、廣大、合一」的密契經驗，並將此體悟含攝於仁道中，故提出「知天命」及「知我者其天」，是由真切體悟而得知。

詹姆斯又說：

當密契經驗充分發展時，對於得到此經驗的人，通常有而且也有理由成為絕對可靠的經驗。⁸¹

充分發展密契經驗的人，由最真切的體悟轉化成為「絕對可靠的經驗」，此絕對可靠的經驗通常會給自己的生命帶來極大的意義感，這種極大意義感是生命背後最有

⁷⁹ 錢穆。《論語新解》。台北：聯經出版，1979年，頁319。

⁸⁰ 同上，頁503。

⁸¹ 威廉·詹姆斯。《宗教經驗之種種》。蔡怡佳、劉宏信譯。頁498。

力的支撐力量，這是理性難以給予的，在此意義下，一切世間的困境及名利祿位將微不足道。如孔子自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矩」是不違仁，「從心所欲」是心識最大的自由與自在，「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是為仁心之完全表現，在儒家而言這是極致了。《朱子語類》云：「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⁸² 如果道德只是一種規範或教訓，或自覺應該如此做才合理，這種道德行為通常是勉強的、難以持久的，更難於「從心所欲」，因為如果從心所欲就被本能的欲望佔有，也就踰矩了，能「從心所欲，不踰矩」背後必有強力的精神支撐力量，如果沒有強力的精神支撐，遇到重大挫折時，通常很快就放棄自己的堅持與理想，如孔子云「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一生堅持道德實踐，不為本能之慾望迷惑，不為挫折所氣餒，如果沒有密契經驗很難有如此長久的動力與平和安樂。雖然道德實踐亦有可能來自長期內化之價值觀，但長期內化之價值觀亦須強大的動力支撐，深層的直覺體悟正可帶來此動力。孔子雖未明白說明與密契有關之論述，但間接從其言行得知與密契經驗有關，如孔子云「君子憂道不憂貧」、「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於貧困中顯得自得其樂，「不怨天，不尤人」，順隨而自在，這些都很可能與密契經驗有關。另外孔子曾讚嘆顏淵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孔子曾於貧困中自得其樂，故能體會顏淵於貧困中之樂。道德實踐僅靠理性支撐，久之難免會怨天尤人，故顏淵應該也有密契經驗，因為密契經驗能提供如詹姆斯說的「超自然主義與樂觀主義」。《朱子語類》云：

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為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照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⁸³

朱熹同意門人解釋孔顏之樂為「私意淨盡，天理照融」，此種境界應該只有密契經驗才能體會到，或者說此圓融境界很難以言語表達出來，但在日常生活中卻表現出長期的祥和平靜、安樂自在；此圓融境界亦帶有知悟性，即一種「與道合一」的深刻理解，是一種直覺性的體悟，此直覺性體悟即是一種密契經驗，故朱熹同意門人所說，又說：「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其意為將孔顏之樂，只說成「樂道」就太淺了，或者應該說對「道的體悟」重於「樂道」，對「道的體悟」就是一種密契經驗，若無密契體悟，就很難領受到「超自然主義與樂觀主義」，「樂道」很可能只是一時性而已，難以持久。

⁸² （宋）朱熹。《朱子全書》〈朱子語類·論語十一〉，頁 1067。

⁸³ （宋）朱熹。《朱子全書》〈朱子語類·論語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1129。

另外史泰司（W. T. Stance）說：

我只想指出：本質上，冥契主義（Mysticism）包含愛，它是一切善行的終極泉源，因此，不管人性的愚蠢、脆弱、邪惡怎麼污染冥契主義的理想性格，理論上講，它一定是傾向於善的。」⁸⁴

孔子有密契經驗，但不在意於密契主義，而是道德實踐者，目的是想建立道德價值及匡正當時的社會秩序，孔子一生踐仁，以仁為中心，雖未對仁下定義，然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朱熹註云：「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又引程頤云：「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⁸⁵ 簡言之忠恕就是深刻的同理心，忠恕就是仁的體現，深刻的同理心也是愛的表現，此愛不是溺愛或私愛，或有條件的愛，而是無條件、無私的愛，即忠恕之道。孔子終身踐仁，行忠恕之道，或許與密契經驗有關係。

綜上所述，我們無法直接證實孔子有密契經驗，只能間接說明孔子應有密契經驗。這須考慮孔子是人文主義者，非密契主義（Mysticism）者，又深層密契經驗是一種深刻的直覺體悟，通常超越常理之外，屬於非理性的部分，於「子不語怪、力、亂、神」下，孔子不說亦是合理。所謂密契主義者，通常指的是追求或實踐密契經驗的人，孔子不是密契主義者，故孔子不追求密契經驗，亦不談密契經驗，如果孔子有密契經驗的話，應該是在「踐仁」時不經意發生的。密契經驗有深有淺，淺的密契經驗如對格言或公式的體悟，幾乎人人皆有經驗過，較深層的密契經驗如對「至高、廣大、合一」的體悟，這些體悟都超乎理性的認知，只有少數人有經驗過。深層的密契經驗即是深刻的體悟，然而這些深刻的體悟終究須回歸於理性，為理性所默認、判斷與運用，如此這些深刻的體悟方可轉化為知識的深度與意志的強度。雖然如此亦無須刻意去追求深層的密契經驗，如詹姆斯所說的，密契經驗是被動性的，刻意追求反而求不到，猶如對靈感（亦屬淺層密契經驗）的追求反而沒有靈感，深層的密契經驗通常發生於帶有宗教情懷或對人類有終極關懷者的身上。

柒、《易傳·文言》之密契經驗與孔子的相關性

從《論語》來談孔子的密契經驗，總是要間接的推測方能略知一二，如果從《易

⁸⁴ 史泰司（W. T. Stance）。《冥契主義與哲學》。楊儒賓譯。台北：正中書局，1998年，頁466。冥契主義（Mysticism）即密契主義。密契經驗帶來平靜、愉悅感，沒有密契經驗的支撐，很難終身行善而無私欲，私欲靠理性的壓抑是很難維持長久的。

⁸⁵ （宋）朱熹。《四書集註》〈里仁〉。頁23。

傳》來談孔子的密契經驗，顯然更豁朗許多，最明顯的是《易傳·文言》的一段話：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處「大人」應是聖人，最理想的人格，牟宗三認為：「這是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聖人境界。」⁸⁶「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皆屬於德性之天，與天地日月之德性及光明合一；「四時合其序」，則與自然之天合一；「鬼神合其吉凶」，則與主宰之天合一；「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更說明了「天人合一」，己之所行，即天之所行；天之所行，即己之所行，此是儒家最高境界，此境界應來自深層密契經驗，現實經驗界幾乎不可能達到。史泰司（W. T. Stance）引聖·十字約翰說：

與神聖合一，人的意志因此全幅轉變，成為神的意志。此後，人的意志的任何動作就是神意的動作。⁸⁷

雖然基督教的「合一」與儒家的「合一」內容不同，但方式應是相類似。深層的「天人合一」應該不是推論而出，如果是經過理智推論而出，感受性應不會太強，對精神意識也不會太多變化；但「天人合一」如果是直覺的感受，亦即由密契經驗得之，則有身歷其境之感，天之意志即吾之意志，吾之意志即天之意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當然這種強烈的覺受還須由理性給予默認、判斷與運用，精神意識才會大幅轉化。

現在最大問題是《易傳·文言》是否為孔子所傳，雖然《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⁸⁸後世儒者仍起疑心，如歐陽修更公開反對《史記》所言，認為《易傳》非孔子所作，⁸⁹其後學者大都認同歐陽修所說。然而《論語·述而》：「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其中「五十」不能言五十歲，否則整句文義不通，蓋無須等五十歲才學《易》，若五十歲學《易》亦無須加我數年，朱熹云：「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

⁸⁶ 牟宗三主講，盧雪崑錄音整理。《周易哲學演講錄》。台北：聯經，2003年，頁45。

⁸⁷ 史泰司（W. T. Stance）。《冥契主義與哲學》。楊儒賓譯。頁298。

⁸⁸ （漢）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台北：大申書局，1977年，頁1937。

⁸⁹ （宋）歐陽修《易童子問》云：「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詳見《歐陽文忠集》〈易童子問卷第三〉）。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0年，頁1。

幾七十矣，五十誤無疑也。」⁹⁰朱熹之意是孔子周遊列國後，返國定居所言，此時孔子年齡已近七十，古人平均壽命不長，七十為古稀之年，故有此嘆。《論語集釋》引龔元玠《十三經克難》云：「先儒句讀未明，當五一讀，十一讀，言或五或十，以所加年言。」⁹¹所言在理；「五十」並不是指五十歲，而是「五年或十年」。這呼應了朱熹說的話，孔子喜讀《周易》時年歲已高，自知來日不多，如能再有五年或十年時間便能精通《周易》就不會犯「大過」。

1973年於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其中〈要〉篇是研究孔子與《周易》關係的重要文獻。該墓下葬於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要〉篇為抄寫之文，原文當在此之前。〈要〉篇其中一段云：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子贛曰：「夫（四五下）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繫。』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繙（四六上）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四六下）」⁹²

雖然此帛書出現於漢墓中，但應存在於先秦時代，據廖名春言：

考慮到秦始皇公元年前213年根據李斯所議制定了《挾書令》，此令直到漢惠帝四年（前91年）才得以廢除。考古發掘證明，迄今在《挾書令》施行時期以內的墓葬，所出書籍均未超出於該令的規定。所以，《要》篇的記載出自先秦，應該是可信的。⁹³

如果帛書〈要〉篇真的是出自先秦，也間接證實《史記·孔子世家》所言非虛，孔子晚年歸魯後喜《易》，反覆研讀，愛不釋手，「居則在席，行則在橐」，更是「韋編三絕」，所以說「假我數年，我於易則彬彬矣」，這與《論語·述而》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前後呼應，頗為可信。廖名春說：「《文言傳》的編者是孔子弟子後學，但其主要部份都是孔子之說。」⁹⁴甚是合理。孔子晚年藉《易》言天道時間甚短，又未廣佈流傳，子貢不甚了解，故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之感嘆，但還是少數弟子受其影響，對日後的《易傳》肯定有

⁹⁰（宋）朱熹。《四書集註》〈述而〉。頁45。

⁹¹程樹德。《四書集釋》。北京：北京國立華北編譯館，1943年，頁410。

⁹²本文是于豪亮根據帛書原文校注而來。帛書原文可參考：于豪亮：《馬王堆帛書《周易》釋文校注》。上海：上海世紀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頁185-186。

⁹³廖名春。《《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頁149。其中

⁹⁴廖名春。《《周易》經傳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14。

深遠的影響。⁹⁵總而言之，雖然無法直接證明〈文言〉為孔子所說，但其「合一」之觀點，應受孔子「知天命」、「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很深的影響，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而密契經驗亦可能發生其中。

捌、結論

孔子真正言「天」之處不多，部分仍保有人格神「主宰天」之義，而孔子對主宰天的心態，非常類似對鬼神之心態，保持「敬而遠之」，尊崇之而不祈禱求福，然而孔子亦說出「天生德於予」、「知天命」、「畏天命」、「知我者其天」實含有德性天的意涵，但孔子未再進一步述說，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孔子將「仁」視為人人皆本有之，為道德之主體性及創造性，踐仁便能默契天道，若無仁道之實踐則此天道亦挂空而不真切，實踐仁道自能遙契天道。這也說明孔子無須另設一形而上之「天」為道德之根源，故孔子之天道須「下學上達」，由踐仁而認知。

孔子的「憂道不憂貧」，對人類有普遍的終極關懷，而含有宗教情懷，其「知天命」、「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的觀點，是一種「人與其存在的超越基礎的結盟」，即「天人合一」，這種「合一」很可能來自一種直覺體悟，即一種密契經驗，但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深層的密契經驗通常超乎理性之外，一種非理性的存在，故《論語》中幾乎不見孔子言及與密契經驗有關，只能間接由其言行得知。

孔子不是密契主義者，故孔子不追求密契經驗，亦不談密契經驗，如果孔子有密契經驗的話，應該是在「踐仁」時不經意發生的。其「知天命」、「知我者其天」、「從心所欲，不踰矩」，「憂道不憂貧」、「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正表現出孔子知識的深度與意志的強度，如果沒有密契經驗的轉化，應該很難達成。因為深層的密契經驗即是深刻的體悟。然而這些深刻的體悟須回歸於理性，為理性所默認、判斷與運用，如此這些深刻的體悟便能轉化為知識的深度與意志的強度。

⁹⁵ 據《孔子家語·六本》所述，子夏曾跟孔子學《易》，而得孔子《易》傳者確實不多，子夏應該是其中之翹楚。《孔子家語》一直被認為是偽書，直至於 1973 年發掘的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推斷為中山懷王墓葬。懷王卒於西漢宣帝五鳳三年，即公元前 55 年。經整理後竹簡有八種，其中包括《儒家者言》及《論語》，其中《儒家者言》與今本《孔子家語》有關，應該《家語》的原型。由此可見《家語》和《論語》關係密切，所以《孔子家語》亦有一定的可信度。《隋書·經籍一》亦言：「昔宓戲氏始畫八卦，……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說明子夏傳《易》頗為可信。

參考文獻

一、書籍

- (漢)司馬遷。《史記》。台北：大申書局，1977年，頁1937。
-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世界書局，1989年。
- (宋)朱熹。《四書集註》。新北：大方出版社，1974年。
- (宋)朱熹。《詩經集註》。台南：大孚書局，1979年。
- (宋)朱熹。《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吳瑣。《新譯尚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77年。
- 牟宗三。《圓善論》。台北：學生書局，1985年。
-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學生書局，1991年。
-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北：學生書局，1978年。
- 牟宗三主講，盧雪崑錄音整理。《周易哲學演講錄》。台北：聯經，2003年。
-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1980年。
-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 錢穆。《論語新解》。台北：聯經出版，1979年。
- 廖名春。《《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
- 廖名春。《《周易》經傳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 于豪亮。《馬王堆帛書《周易》釋文校注》。上海：上海世紀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二、書籍中其一章節

- 黃銘崇。〈「殷周革命」新論——邁向「人文的」國家〉。《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黃銘崇主編。新北：聯經，2016年。
- (晉)郭璞注，(晉)邢昺疏。〈爾雅注疏下〉。《十三經注疏》。李學勤主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2001年。

三、翻譯書籍

-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宗教經驗之種種》。蔡怡佳、劉宏信譯。台北：立緒，2001年。
- 史泰司(W. T. Stance)。《冥契主義與哲學》。楊儒賓譯。台北：正中書局，1998年。

休斯頓·史密斯（Huston Smith）。《人的宗教》。劉安雲譯。新北：立緒文化，2018 年二版。

郝大維（David L. Hall）、安樂哲（Roger T. Ames）。《通過孔子而思》。何金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四、期刊

王欽賢。〈從密契主義觀點來看孔子之天道與仁道觀〉。《鵝湖月刊》31(11)，2006 年，頁 23-33。 <http://dx.doi.org/10.29652/LM.200605.0004>

謝君讚。〈檢證《論語》——論孔子思想中的冥契主義向度〉。《鵝湖學誌》61，2018 年，頁 46-92。

張振東。〈孔子的天道觀與現代生活〉。《哲學與文化》15(1)，1988 年，頁 10-15。
<http://dx.doi.org/10.7065/MRPC.198801.0010>

Confucius' View of the Dao of Heaven and His Mystical Experiences

Kuo Wu Chen*

Abstract

Contemporary scholars generally categorize Confucius's concept of the Dao of Heaven into three types: the Governing Heaven, the Naturalistic Heaven, and the Ethical Heaven. Most scholars maintain that Confucius still held the view of an anthropomorphic, governing deity. However, passages such as "Heaven produced the virtue that is in me," know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my studies lie below, but their penetration rises high; it is Heaven that knows me" appear to be related to the Ethical Heaven. Yet, Confucius did not further elaborate on this Ethical Heaven. The reason may be that Confucius regarded "Benevolence" (Ren) as the subjectivity and creativity of morality; by practicing Ren, one can wordlessly commune with the Dao of Heaven. Therefore, it was unnecessary for Confucius to establish a separate, metaphysical "Heaven" a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morality.

Although Confucius did not establish a formal religion, he harbored an "ultimate concern" for humanity; as such, his thought inherently contains a religious sentiment. This sentiment, in turn, allows for the possibility of mystical experience. Furthermore, judging from such discourses as "know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tudying what is below and reaching what is above—it is Heaven that knows me," "the exemplary person worries about the Way (Dao) rather than poverty," and "following the heart's desire without overstepping the bounds," the epistemic depth and volitional strength inherent in these realizations likely correlate with mystical experience. However, mystical experience remains a form of intuitive realization; it still requires rational endorsement, discernment, and application to realize its true value.

Keywords: Dao of Heaven, the Mandate of Heaven, Ren,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mystical experience.

* Doctorial Student at the Institute of Life and Death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Received 11/14, 2025; Revised 12/18, 2025; Accepted 12/29, 2026)

《佛光人文社會學報》第八期

主 編 / 黃智偉 教授

編輯委員 / 陳衍宏（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教授）

張世杰（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教授）

吳慧敏（佛光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鄭祖邦（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張瑋儀（佛光大學語文學系教授）

朱浩毅（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姚玉霜（佛光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教授）

執行編輯 / 許聖和（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封面題字 / 佛光大學創辦人星雲大師書法集字

出 版 者 / 佛光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院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 160 號雲起樓 318 室）

電 話 / 886-3-9871000 Ext 23001

E-mail / fgujhs@fgumail.fgu.edu.tw

網 址 / https://chss.fgu.edu.tw/zh_tw/news

出版日期 / 2026 年 1 月

I S S N / 申請中